5061/560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中國語文

SEP 11 1957

总第57期

3

1957

中国語文

1957年3月号(总第57期)目录

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

王　力

一

中国語文学的成績是輝煌的；至于語言学(語言科学)則还处在幼年时代。中国人知道有語言学这一門科学，大約只有五十多年。本来，就全世界来說，在各种科学当中，語言学也算是个年輕小伙子。但是，就中国的語言学来說，却又比欧洲的語言学落后了七八十年。

解放以前，只有極少数的人在那里搞語言学，一般人根本不去理会它。解放以后，有几件大事使中国語言学忽然兴旺起来了。这几件大事是：

1950年，斯大林發表了他的《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后来改称《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同年，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成立。

1951年，人民日报發表了《語法修辞講話》。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成立(1954年改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

1955年，召开三个会議：1)全国文字改革会議；2)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3)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

第一件大事显得語言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有重要地位的；其余几件大事显得我們的党是重視語言学的。

除了上述的几件大事之外，还有兩件对教育界来說也算是大的事情。第一件是1954年綜合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計划的修訂，修訂的結果，語言課和文学課分庭抗衤L起来了。第二件是1955年初級中学的汉語和文学分科。这些都是学習苏联的結果。

总起来說，解放以来，語言学的發展的原因有兩个：第一是学習苏联的結果，第二是党重視并支持語言学工作的結果。

語言学的發展，首先表現在我們的队伍的扩大。几年以来，少数民族語言調查的队伍壯大了，而且有了显著的成績，基本上做到了又多，又好，又快，又省。高等学校里也培养了一些語言学人才。但是，有些人还看不見中国語言学的發展的全面情况。举例来說，我們調查語言学人才，往往只曉得看看大学和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多少关于語言学方面的教师，但是我們忽略了俄語学院、外国語学校的教师，大学俄語系的教师，西方語文系和东方語文系的教师，中学里的教师，杂志編輯人員等等。特别値得指出的是搞俄語教学工作和俄語課本杂志編輯工作的同志們，由于他們学習苏联比較直接，所以普通語言学的修养較好；又由于他們重視比較教学法，所以他們重視汉語的研究。这是一支前途远大的生力軍；而我們一談語言学就往往只知道联系到中文系，輕易把他們忘了。其次是中学教师，我們对他們的力量估計不足，对他們的研究工作也帮助不够。他們比我們忙，但是他們当中有些人的刻苦鑽研并不比我們差。例如有一位中学教师寄一篇論文給我看，这篇論文就很有創見。据他叙述他研究語言学的經过，除了精讀中国語言学方面几部重要著作之外，还看了几本普通語言学的著作，又系統地閱讀了《反杜

* 这是作者在天津語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林論》、《自然辯証法》、《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等。我所联系到的中学敎师，像上面所述的那一位的还很多。此外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小学敎师写信和我辯論一个語法問題，很有見地。当然，小学的研究条件要比中学差些，但是小学的語文敎师在敎学实踐中可以提出許多問題，讓大家来研究、解决。

另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散布在各專科学院、各生产部門和軍队中。还有一些未說明身分的人們。我們可以把他們叫做業余的語言学爱好者。有一位同志写信給我說："这几年来，我自学了俄語、西班牙語和德語，复習了英語和法語这几种主要的印欧系語言，又自学了哲学、邏輯学、語言学和現代汉語語法"。有一位解放軍战士立下志願要把現代中国語言学的重要著作讀完。在这里我們不去討論关于研究方法的問題，只是說他們对于語言学的这种勁头是値得鼓励的。虽然直到現在为止，我們在学校里傳授語言学还有許多人不願意接受；但是在社会上却有不少的人爱好語言学，甚至表示願意"把一生貢献給祖国的語言科学"。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他們在暗中摸索、"無师自通"的情况下，还要坚持下去，我們除了欽佩之外，还应該帮助他們，支持他們。我們絕对不应該輕視業余的語言学爱好者，因为他們有可能由業余变为專家（已經有过一些这样的事实）；即使不变为專家，他們为語言学扩大影响，也是对語言学的前途有利的。

解放以来，語言学的定期刊物的数量虽然很少，質量却是不差的。比較难于令人滿意的是《中国語文》。从它的內容上很难看出它的对象是哪一种讀者，因此也就很难衡量它是否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我是这个刊物的編委之一，怎样把它編得好一些也是我的責任。）《語文学習》比較切合实际，它的主要对象是中学語文敎师，最近着重在交流語文敎学經驗，在語言敎育上能起直接的作用。《語文知識》是一种通俗讀物，在語言科学的普及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献。現在还缺少一种科学研究性質的刊物；大家正在盼望着語言研究所的《語言研究》出版，以滿足語言学工作者的需要。听說还有一兩种語言学期刊要出版，那也是値得欢迎的。其他不算語言学期刊而对語言学有貢献的，还有《俄文敎学》等。

最近五年来，中国語言学的进展是很快的，但幷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語言学的推广超过了人們思想認識的水平，沒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又由于年輕的中国語言学本身存在着許多缺点，以致我們在語言学的推广工作中遭遇着很大的阻力，具体表現在最近高等学校关于語言文学分家的問題上。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分家的問題，也不打算在这里詳細分析問題發生的各种客观因素；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語言学本身存在的問題必須逐步加以解决。在短短五年中，中国語言学能有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是可喜的。再过十年以后，如果中国語言学还停留在这个进程上，就不能再認为可喜的了。

二

中国語言学目前存在的問題很多。沒有經过群众的討論，很难把問題提得全面而正确。現在我所談的只是我一时想到的，沒有經过周密的考虑，全面固然談不上，連正确也很难自信。姑且說出来請同志們指敎。

（一）理論和实踐的統一問題

解放以来，經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習，我們沒有人否認理論和实踐的統一的重要性；但是，在語言科学的实踐上，我們幷沒有把这个問題解决得很好。从最坏的情况来說，簡直是"甲乙丙丁，开中藥鋪"；有些語法書以分类代替整个內容，而分类的本身也还缺乏邏輯性。經过了讀者的批判，这种粗制濫造的东西逐漸减少了。現在的新問題是：語言科学如何和語言敎

育密切結合的問題。就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說，一种科学如果不能指导生产实踐或阶級斗爭实踐，簡直就不成其为科学。就語言科学来說，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使語言能發揮它的最大作用，以服务于人类文化，服务于阶級斗爭。如果在語言教育中，只是对語言事实作了一些籠籠統統的叙述，和語言实踐联系得不密切，那么，語言教育的本身就不健全。最近兩年来，我們常常强調語言学的独立性，包括我个人在內，我們主張"現代汉語"在大学里不能代替"写作实習"，"汉語"一科在中学里不包括作文。这样，就整个科学体系来說，自然是說得过去的。但是，就語言教育来說，就留下一个很大的空白点。拿語法来說，我們的語言結構是比較簡單的，是不是在語言教育中它也和西洋語法占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不是可以适当地增加修辞方面的訓練？这似乎是値得考虑的。社会上要求一个中学畢業生文从字順，要求一个大学中文系的畢業生能写出一篇相当流暢的文章，我們不能說这种要求是过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如果研究語言科学的人放弃了語言教育的責任，这就只能使它一天天流于教条，流于繁瑣，而我們也只好"孤芳自賞"，"与世相忘"了。

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極端是狹隘的功利主义。有許多人喜欢追問語言科学的"实踐意义"；甚至死心塌地幹这一行的人在研究某一个專門問題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被人家問起这么一个問題，也不免惘然不知所答。語言科学的实踐意义在于找出語言的規律，从而指导我們的語言实踐，使語言能發揮最大的作用；同时，某些有关語言的政治措施（如文字改革）以及有关語言的技术革新（如"翻譯自动化"），也都用得着語言学的知識。但是，某些語言学的知識的确是和实踐的关系比較間接的。可以这样說，問題越專門，越令人覚得缺乏实踐意义。可能有人这样說：只要有了三分学問，已經可以解决实踐問題的十分之九。平常我們很少遭遇某一个难题是需要学問淵博的專家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們簡直不需要費很大的力气去培养研究生，也不需要孜孜矻矻再做什么科学研究。当然也有人会反駁說：不做科学研究就赶不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我覚得这样的答复还不是正面的答复。古人說得好："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値。一个医生一年到头可能沒有遇到一次奇难杂症，但是懂得医治奇难杂症的医生应該說是好医生。再說，問題的解决是整个的，在某些問題上，解决十分之九等于沒有解决，往往最后的解决会动搖甚至推翻那認为已經解决了的十分之九。我們只要肯定語言是値得研究的对象，那么，对于語言任何方面的深入了解，都是对語言科学有帮助的。拿語言教育来說，不能想像，沒有語言科学的理論指导而語言教育会进行得好的。

我們所謂理論，不但是指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理論，而且是指科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語言現象的一切知識，包括自己所發見的知識在內。这是我們必須付出辛勤劳动的代价才能取得的。如果为狹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語言学就不会再有發展的前途。

（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虛無主义的問題

自从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出版以后，中国語言学界中存在着教条主义。这并不是說解放前就沒有教条，我自己就搬过或偸偸地套用过許多洋教条。但是搬那些洋教条并不能像搬斯大林的教条那样名正言順。我們得承認，包括我个人在內，在过去五、六年中間，我們在語言学領域中，往往免不了要犯教条主义。特别是在教学工作中，唯有教条最方便，也最安全。应該指出，斯大林反对馬尔学派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他的功劳是不可以埋沒的，他的理論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問題在于："缺乏生动而全面的关于各种材料的具体的历史的研究，过分地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話，毫無批判地对待他的著作"（《語言学問題》1956年第4期社論）。

和教条主义性質相近的是主观主义。本来，馬尔学派的錯誤就在于脫离具体的材料，脫离正在进展中的語言事实的深入研究，不以語言現象及其發展的規律性的历史分析作为立論的根据。而我們中国語言学近年来也正是有不少这一类的論文和著作。作者們往往从原理出發，然后去寻找一些合用的材料来証明他們的原理。有些同志連找材料的耐心也沒有，只是在别人的討論中兜圈子，唯一的目的是要表示一些"創見"，而这些"創見"不是从具体材料来的，也不是从历史分析来的，而是从他們所想像的原理来的。我們反对馬尔学派，而实际上我們重犯了馬尔学派研究方法上的錯誤。这是应該糾正的。

另一方面，有些人曲解了充分占有材料和全面分析的研究方法，因而忽略了問題的主要方面。汉語的历史是那样長，方言是那样复杂，如果我們对于所研究的問題不分主次，我們就很容易在紛繁的材料中迷失了方向。任何語言規律的發現，任何概括語言事实的結論，都經不起吹毛求疵。举例来說，丁声树先生分析了上古汉語"弗""不"两字的分别，可說是証据确鑿的了，但是不能沒有例外，于是有人根据那些例外去反駁他。实际上，如果不区别通例和例外，研究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我們指出例外，追究例外的原因，那都是应該的，只是不应該讓例外把通例掩盖了。对汉語規范的問題也应該这样說。有些人根据某些权威作家的文章去批評《語法修辞講話》所指出的不合汉語規范的例子。《語法修辞講話》是否完全正确，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如果按通例来說这是一句不合規范的話，也就不必根据个别作家的特殊用語来反对語法的規范。对所有一切被概括出来的語言規律都表示怀疑，这就是語言学上的虛無主义。我們常常听說某人对于某种結論"能破不能立"。在某些情况下这不是能破不能立的問題，而是怀疑論派的思想方法的問題，这是不相信相对之中有絕对，而片面地强調極端相对性的問題。就拿"弗""不"的例子来說，丁声树先生所举的一大堆的材料都成了枉然；丁先生的結論被某些例外所"破"了，結果那些很明显的界限都成为偶然的現象，唯一的結論只能說是"沒有什么"。这和上面所說的主观主义是两个極端：一个是不知道重視材料，另一个是陷入了材料的重圍，找不出一条出路来。

（三）語言学各部門的發展問題

由于語言学在中国是一門年輕的科学，許多人都不知道語言学有些什么內容。这些人应該是包括拥护和反对两方面的人在內。有人說学習多种語言或多种方言就是語言学，这当然是很幼稚的說法，但是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对。有人說研究《說文解字》就是研究語言学，表面上看来，似乎比前一种說法强些；但是依我看来，也不过半斤和八兩的差别。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着重在方言調查，許多人以为方言調查代表了整个語言学。1951年《語法修辞講話》發表后，又有許多人以为語法代表了整个語言学。現在为了推广普通話，要調查方言，方言学又由冷而热起来了。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也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我們認为，为了完成迫切的任务而提出某些重点，多多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这是完全正确的。問題在于：要不要适当地發展其他各部門？

我个人認为：解放以来，大多数喜爱語言学的人都只想研究現代語法，而对于語法的研究，又往往喜欢在分类和归类的上头下功夫，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語言学的發展来說不是很有利的。就目前迫切的需要来說也不是这样。我們不反对人們研究語法，相反地，在語法方面我們还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只是希望語法以外的某些迫切的任务也要有人来完成。

首先应該强調的是普通語言学。可以这样說，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語言学各部門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語言学的恩賜。普通語言学通过直接和間接的道路来影响中国

語言学。但是如果我們不承認中国語言学的落后，我們就是沒有自知之明。而中国語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普通語言学的落后。这一个薄弱的部門如果不加強，中国語言学的發展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

其次应該强調的是詞彙学、語义学和詞典学。汉語規范化的工作，主要应該是放在詞典工作上面，而历史性的大詞典，它的作用还远远超出規范化工作之外。詞典是我們十二年远景規划中的"重头戏"，幷且是"硬性任务"。詞典的主要內容显然不是語音和語法，而是詞义。过去有人提过同义詞的研究，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而至今还沒有一部同义詞的詞典。在这一方面我們需要大量的人才，如果目前不着手培养，就要来不及了。

其次应該强調的是修辞学。上面說过，將来的語言教育，恐怕离不了修辞学。这里所謂修辞学，有人叫做文体学，有人叫做風格学。我个人認为，不管修辞学的定义怎么样，我們的語言教育中的修辞部分应該解决这样的兩个問題：第一是怎样說的話才是最合邏輯，最生动，最有力量的話？第二是怎样能利用不同的語言手段去最有效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关于第一个問題，应該研究历代作家的語言表达方法；关于第二个問題，照我看来，应該首先調查各个阶層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們的語言了解能力。我覚得第二个問題在目前特别显得严重。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不管写給哪一种讀者看（不管年龄、文化水平、职業等等），用的是千篇一律的語言，而且是不很高明的語言。这实际上是大大地降低了語言的交际功能。

最后应該强調的是实驗語音学。从最富于实踐意义的一方面来說，單是为了推广普通話，也就不能不搞語音实驗。大家知道，汉語方言相互間的差别主要是語音上的差别。現在虽然肯定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但是我們对于北京語音的知識是不够全面的。从高本汉、赵元任一直到現在流行的課本，关于北京語音的記录，人各一說，令人無所适从。現放着一位最可靠的老师——語音实驗仪器——而不去請教他，那就太可惜了。搞好了語音实驗，不但可以解决一些爭执的問題，而且可以解决一些沒有人研究过的問題。例如普通話的声調的变化，决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样簡單。应該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它的規律。此外，語音实驗还可以帮助調查少数民族語言和方言，这里不必細談了。

中国語言学的当前任务是不是只限于上面所說的几件呢？当然不是的。例如"翻譯自动化"就是迫切的任务之一。又如作家詞典（魯迅詞典等）也是值得鼓励的工作。在这里我們不可能一一列举，就只能揀比較重要的說一說。

（四）發揚优良傳統和赶上世界語言科学先进水平的問題

上面說到中国語文学有过輝煌的成就，这一个优良的傳統，到現在还有一些老前輩繼承下来。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說，老一套的語文学和新一套的語言学是脫节的。語文学的偉大成就在历史方面，特别是在上古汉語方面，而某些青年語言学工作者們对于老一套是望而生畏的。这样，在語言学的發展前途上就隐藏着一个危机。一方面，就西洋傳来的一套語言学来說，我們是那样落后；另一方面，对于我們祖先的优良傳統，我們又不願意繼承，我們拿什么去赶上世界語言科学的先进水平呢？能不能說过去的老一套已經完全过时了，沒有值得發揚光大的地方呢？我想不能这样說。我們的前輩从历史上研究語言幷沒有錯誤；可以这样說，假使西洋沒有語言的历史研究，也就沒有今天的普通語言学。他們的錯誤只在于不懂得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汉語的历史，而不在于他們研究了汉語的历史。相反地，假使我們要在語言科学領域中赶上世界的先进科学水平的話，对語言現象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进行历史的分析，这应該

被認为是最有希望的研究工作之一。

我們的前輩还有值得我們学習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他們为了一个字的語源所写的文章，所費的时間往往和現代人写半部書的时間相等。他們想好了一个問題还不輕易下笔，写好了一部書还不輕易刊行。他們的顛扑不破的考証，完全是充分占有材料的結果。我們可以这样說，缺乏这种朴学的精神，而想要赶上世界語言学的先进水平，那是很难的。高深的科学和怕麻煩的思想是不相容的，和“微言大义”也是不相容的。

前人研究的成果，在今天还是很有用处的。鄙弃前人的成績，以为那些是沒有“实践意义”的东西，那是絕对荒謬的。

三

天津語言学会成立了，这件事又一次証明了党对語言学工作的重視和支持。我想我們能有信心和决心来做好我們的語言学工作。

正如我們的国家將由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先进的工業国一样，中国的語言学也將逐漸摆脫落后的狀况而向前迈进。就語言学界本身来說，我們的队伍是空前壯大了；但是比起其他的科学部門来，仍然是小国寡民的情况。我們也不必为这个耽憂。沒有人立下过这样的一个定理：最少人研究的科学是最無用的科学。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类社会，就一定有語言的存在；只要有語言的存在，就一定有語言学，正如有生物存在就一定有生物学一样。

但是，要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質量和数量是应該并重的。我們一方面要提高我們的科学研究的質量，另一方面还要扩大我們的队伍。这就要靠各位同志多做一些科学普及的工作。

天津語言学会本身就是推动語言学工作的一个机構。希望多多进行科学活动。

我今天是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成立大会的。因为兴奋了，所以話多了。其中一定有許多不妥当的地方，甚至錯誤的地方。敬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

梁　吟

黎錦熙、刘世儒兩先生在《汉語介詞的新体系》一文（見本刊 1957 年 2 月号）中提到严复《英文汉詁》举作介詞的“白云在天”和“煢然在疚”兩个例子，認为“兩例中的在，在汉語就断然不能是介詞，仍要算动詞（在英文虽可是介詞，但又断然不能成句子）”。这句話下面有一个脚注：

> 最近《汉語課本》（第三册第 118 頁）把“这間屋子朝南”的“朝南”解作介詞結構作謂語，拘泥了朝字只算介詞，不再是动詞，机械地比附外国語，和严氏所說正同。（第 16 頁）

《汉語課本》認为在（还有到）“經常具有动詞的一般特点和介詞的特点”，因此算作“屬于兩类的詞”（第三册第 120 頁），这是和严氏所說不同的；但是对于朝字，的确是只算介詞不算动詞的。而且在句法的处理上也有一点区別：“他不在家”的謂語是动詞在；“这間屋子朝南”的謂語不是介詞朝，而是介詞結構朝南。

“介詞結構的基本用途是作狀語。有些介詞結構也可以作补語。只有少数介詞結構可以作定語和謂語”（第三册第 116—117 頁）。所謂“少数介詞結構可以作謂語”，这中間就包括朝南。为什么不把朝南看作动宾結構或动补結構，而当作例外来处理呢？那是为了照顧到动詞的語法特点之一：能够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問，如“他在不在？”——“在”或“不在”（第三册第 50 頁）。朝不具备这个語法特点，在問句和答句中都不能單独作謂語，因此只能說“这間屋子朝（南）不朝南？”——“朝南”或“不朝南”。要是兼屬动詞和介詞，那末动詞的这一語法特点中就有了例外。假使不想把詞法和句法割裂开来，兩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所取舍。

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之下，照顧哪一头比較妥当呢？我看还是讓少数介詞結構能作謂語妥当些。因为一般有兩个事物的动句，包括黎、刘兩先生所謂帶宾語或副附（名詞在副位）的兩种句子，一般都可以有三种平行的句式：“他不喝茶：茶他不喝：他茶也不喝”；“他不坐汽車：汽車他不坐：他汽車也不坐”。但是“这間屋子（不）朝南”的朝永远离不开南，所以不可能有黎、刘兩先生所謂“宾（或副）踞句首”和“宾（或副）提动前”的說法：“南这間屋子不朝”，“这間屋子南也不朝”。因此把这个朝看作动詞，不但在詞法上添出例外，就是句法上的例外也仍旧避免不了。

《汉語課本》从夹縫中作出这样的处理，我猜想編者是考慮过这些問題的。

再論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

——关于"汉字拼音化"

唐　蘭

«中国語文»1956年1月号用批判的形式發表了我的«論馬克思主义理論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同时，編者組織了十八位同志討論我的主張。照編者的說法是"希望通过这次討論，能够把某些对文字改革的不正确的看法澄清一下"。

对我个人来說，通过这次批判，得到很多益处，特別由于对自己的一孔之見的沾沾自喜因而在某些問題上看得不全面，应該受到严正的批判。但在科学眞理面前，尽管編者早就判决"汉字拼音化"的主張是不正确的，我却認为可以不服判决，申述一下自己的意見。我認为中国文字改革是关系到中国六亿人民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应該充分貫徹"百家爭鳴"的精神，讓一切不同意見都提出来，应該不害怕自由爭論。因为眞理愈辯愈明，如果是眞理，是禁得起爭辯的；經过热烈爭辯，讓大家心悅誠服，总比簡單地命令号召来得好些。相反地，如果本来不見得完全正确，由于害怕批評，以致沒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岂不將"鑄成一个大錯"。因此，我誠懇地建議«中国語文»編者在这样重大問題上"休休有容"，容許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見，不要忙于"澄清一下"，不要剛一开始，还沒有弄清楚，就忙于做出結論。要知道，經过一个时期眞正的自由討論以后总会得出比較正确的結論来的。

对于中国文字改革，是有很多不同意見的。有人根本反对任何改革，虽然近于保守，但他們所以反对改革的理由有很多可以供我們参考，如其我們能够糾正改革中的缺点，消除了他們的疑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也总会贊成改革的。有人虽也努力改革，实际上只限于改良，例如"减笔字"，"替用字"，"新形声字"之类，虽然不是根本性質的改革，但总都有一定的用处。在文字改革工作中也应該承認他們的优点，鼓励他們再前进一步。毛主席提出中国文字改革的方針，"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將是中国文字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改革，是根本性質的改革。走拼音方向和不走拼音方向是有原則上的分歧的。但同样走拼音方向，也还有不同意見，有人把汉字当做"扶不起的阿斗"，必須根据汉語，利用国际通用字母，另外建立新体系，創造新文字；而另一种意見，則是应該对汉字的优点和缺点作出正确的估計，發揮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从汉字本身逐漸發展为拼音文字。我認为前一种意見在目前是不現实的，因之，主張"汉字拼音化"，在現阶段里用一种綜合文字——在簡單汉字里加入一些汉字形式的拼音文字——通过这种形式使汉字逐漸过渡到完全的拼音文字。

必須指出，中国文字改革只要把意符或注音文字改变为拼音文字，就是質的变化；走这样方向，就是根本性質的改革。同走这样方向而有不同看法，不应該認为是原則上的分歧。这好像在曠野中迷途的时候，远处有一个高塔是需要走到的目标，有人主張从东过去，有人主張从西过去，各有各的理由，因而引起爭論；尽管事实上也許一条路好走，一条路不好走，或者簡直走不通；也許兩条路都好走，也許兩条路都不好走；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对着同一目标，沒有原則上的分歧。可是有些同志善于"深文周納"，把"汉字拼音化"的主張說成"反对汉字拼音化"，"反对文字改革"，"要提出阶級立場的問題"，这样"歪曲現实"的討論，显然無助于科学問題的解决。

如果平心靜气来討論問題，分歧点是很清楚的。我主張"汉字拼音化"，不变汉字体系，在汉字原有的基础上，利用它的固有形式，逐漸發展为拼音文字。有些同志主張"汉語拼音"，撇开汉字，根据汉語，从新創造拉丁化新文字。"汉字拼音化"把拼音文字作为簡字放在汉字里面去，一切条件都很現成，跟簡字一样，如果討論通过，見諸实行，只要刻好銅模鑄成鉛字，就可以在汉字內部出現了拼音文字。因之，随时可以使拼音文字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汉語拼音"則必須創造有利的新条件，做好推广普通話和汉語規范化工作。这些工作是性急不得的，十年八年未必能收大效。即使普通話已經推广，汉語已合乎規范，創造一个完整体系的新文字也不是輕而易举。創造出来，試行过后，也未必就适宜于推广。因之，另造新文字固然是有可能的，但問題还在于能否变为現实。

这样，我强調現在就用綜合文字，在汉字中間加入拼音文字，而指摘"汉語拼音"的主張在目前行不通，勉强推行而不讓汉字發展是有害处的。"汉語拼音"的主張者則批判我的主張，認为加上一千多个拼音字，不是他們所主張的文字改革。說我"把实現完全拼音的文字拖延到遙遙無期"，因而怀疑我"拥护拼音文字是否有誠意"，再进一步"臆断"我的"眞正目的，是要使汉字

不作根本的改革"。①

但怀疑只能是怀疑，臆断終究是臆断，我主張現在就使用拼音文字，总是事实。我主張在汉字里加入一千多个拼音字，如果做到，至少可以使每一个学習汉字的人縮減几个月的时間和精力，目前至少有几千万人在学習汉字，能够节省这么多的时間精力，对社会主义建設将有多大帮助！可是有些同志反对这样做，他們說这样不徹底，不完全，不是根本改革；他們習慣于"望梅止渴"，必須等待到体系完整的新文字創造出来以后，才能使用拼音文字。这对于当前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是不是有利呢？有一次座談会上我呼吁过，即使在汉字簡化过程里加进一兩个拼音簡字，也是新时代的一个标志，說明了汉字已經在走拼音方向了。这像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組一样，可以使人們看一看拼音化的好处。但是座談会的主席同志在結論里堅决拒絕这个意見，即使一个拼音字也不能加入。我眞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把汉字加上一道鉄箍，我更想不通如果在汉字里出現了拼音文字，大之对于社会主义建設，小之对于文字改革，究竟会有什么害处。当然，在汉字里加进了一千多拼音文字，还只是綜合文字，不能立刻变为完全的拼音文字，但事情总是要逐漸發展的，新加进去的一千多拼音文字，总是拼音文字，終究要为完全拼音开辟道路。假使認为現在不能立刻达到完全拼音，就危害了文字改革；假使眞像王力先生所說包括拼音文字在內的綜合文字，絕对不是拼音文字；那末，难道变工队、互助組妨害了农業合作化，人民民主專政就絕对不是無产阶級專政了嗎？誰都明白，有些一步登天思想，要合作，就必得是集体农庄，搞革命，就得立刻建成共产主义，是不現实的；但不現实的想法，往往阻塞了当前可以迅速前进的道路。

我們十分尊重某些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辛勤劳績，他們过去强調了汉字缺点的一面，認为汉字是糟粕，不堪改造，必須廢除，必須另搞一套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要替汉語創造完整系統的新文字，是一种很好的理想，我們希望他們努力实现这种理想。但是在目前，当人民大众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高潮中需要迅速使用拼音文字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先讓汉字实現"拼音化"呢？

还是在座談会上，同志們說"汉字拼音化"是在帆船上裝發动机，而"汉語拼音"是制造远洋巨輪；批評我的主張是把旧建筑翻修，白費手脚，而他們主張一下子就造百層大厦。这些比喻是很好的，但請不要为了設計家建筑家的杰作思想而忽略了人民大众当前的急迫需要！我們認为当新的万吨輪船、百層大厦連圖样还沒有画齐全，而小划子、茅草房，还是人民大众急迫需要的工具的时候，为什么不应該在帆船上裝發动机，为什么不应該把旧建筑改造一下呢？我不想把戴过的帽子照單璧还，說什么"反对拼音化"、"反对文字改革"；但事实上，并不是我在"把实現完全拼音的文字拖到遙遙無期"，事实上却是有些同志不允許人民大众迅速获得拼音文字。事实胜于雄辯，尽管現在人民把文字改革工作，認为只是專家們的事情；尽管大多数人还沒有看出問題的严重性；但历史学家將会記載着为什么在人民大众迫切需要，拼音文字有可能实現的时候，連一兩个最起碼的拼音文字迟迟不能出現。

我完全相信那些專家們的主观願望也是渴望着迅速实現拼音文字的，但为什么对于"汉字拼音化"的主張，要不惜用獅子搏兎之全力来"澄清一下"呢？这个主張竟触怒了專家們，以致王力先生認为"唐蘭先生的文章將引起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人們的共鳴"。不錯，我重复了一些人們說过千百次的眞理，中国方言复杂，同音字太多，文化遺产轉譯有困难，在目前抛开汉字推行另外創造的新文字將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这些話当然是逆耳的，我說得确实有过火的地方，"情緒鬧得很凶"，有些"危言聳听"，所以王力先生說我在支持"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人們"。但应該看看問題的实質。我主張在汉字里加入一千多个拼音文字，是可以实現的，实現后中国文字將起怎样的变化，对人民大众將有多少利益！这叫做"反对汉字拼音化"嗎？热心文字改革的專家們为什么不替人民大众的利益想一想呢？群众的意見，有时是逆耳的，專家們为什么不肯徹底思考一下对方的理由和自己的缺点呢？

如果大家都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努力走拼音方向，那末，我們的出發点是一致的。我們可以有爭論，不該鬧宗派。固然，"汉字拼音化"强調了民族形式，对于主張用国际通用字母的同志們来說是不会感覺到太舒服的。我們应該想一想，人民大众热爱自己的民族形式，总不是錯誤。一样可以發展拼音文字，为什么一定要用国际通用字母呢？走拼音方向，使用民族形式，人民大众不更乐于使用，發展起来不更容易嗎？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現在正在学習汉字，而有些同志却說只有使用 *A*、*B*、*C*、*D* 才是未来的民族形式，这是人民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嗎？

这里有兩种基本不同的看法：我們認为根本性質的改革，是由不是拼音的文字改变为拼音的文字。走拼音方向是应当堅决的，但是要有步驟地进行；拼音方向是世界各国文字所共同的，但文字形式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有它自己的历史条件的。"汉語拼音"論者的所謂根本改革，是要把汉字連根拔，必須根据汉語另外

---

① 章熊：《对唐蘭先生文字改革論的批判》，見《中国語文》1956年1月号。

創造体系完整的拼音文字，不是这样做就不徹底，不完全，并且也不能叫做拼音文字，因此，他們是徹底改革論者；不是文字的改革，而是换一种文字的改革。由于目的不同，論点当然不会一致。“汉語拼音”論者显然有一种顧虑，惟恐汉字里加入了拼音文字，汉字發展了，可以暫时适应社会的需要，一般群众就不再想把汉字改变为完全拼音的文字，文字改革就不徹底了。他們也承認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如果达到了完全拼音以后，跟用国际通用字母的拼音文字，实質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們不相信由綜合文字的形式可以过渡到完全拼音的文字，所以他們要叫喊，这將拖延文字的根本改革。其实只要懂得新生的东西必然战胜陈旧的东西这一規律，这种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生的嫩芽，虽然很微弱，很快就会开花結子；中国文字里如果出現了拼音文字，尽管只有一兩个字，这个風气一开，就会迅速發展起来。中国文字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它本来只有象形字、意符字，在殷商文字里有了注音字，就是形声字，但在那时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到了汉代，就几乎占全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了。在那个时代里，注音比意符进步，但由于这是自然發展，拖了一千多年，时間是十分長的；現在拼音文字比注音更进步了，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里，有組織有領导地进行文字改革，难道进步的文字反会不能發展嗎？不錯，“汉字拼音化，現在还要拖住汉字”，讓它孕育新文字，这正如土地改革分給农民三亩地一头牛，是一个辯証發展过程，不应該要求一下子全部土地国有化，搞国营农場，也不应該期望汉字立刻完全拼音，难道这是“不肯放手改革”嗎？当然由汉字發展出来的拼音文字跟另外創造的拼音文字，將来总有很多不同，有些同志会堅持另外創造体系完整的新文字比汉字發展成拼音文字更好，那末，他們尽可以另外去創造，兩不耽誤。尽管广大人民群众是热爱民族形式文字的，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既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拉丁化形式，中国也未尝不可以有兩种文字。如果甲文字确实比乙文字好，那末，也未尝不可以战胜乙文字。兩种文字并行是完全可行的，問題在于不要遏止汉字的进步和發展。如果只許“汉語拼音”，絕对不許“汉字拼音化”，不許汉字發展为拼音文字，不但对于当前的人民大众的急迫需要是不能配合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設是有阻碍的，就是仅仅对于为中国人民已經服务了几千年的汉字本身来說，也是十分不公平的。

我再鼓起热情来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全国人民大众由于要建設社会主义迫切需要进步的工具，需要拼音文字，迫使我不能不再呼吁一下。我恳切地希望一切文字改革工作者能和衷共济，团結在一起。在曠野中找到目标以后，不論主張从东去，从西去，都应該讓他們說明理由，并且不妨勘探一下，到底那一条路最合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通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也不止一条，大家平心靜气地来研究研究，总是有好处的。

由于这样目的，我不想在这里作过多的枝节的辯論，有些理論問題，是可以緩一下再討論的，但是为了避免誤解，对我的“汉字拼音化”的主張略作补充和修正还是有必要的。

“汉字拼音化”跟“汉語拼音”是截然不同的。“汉字拼音化”从字形上来看还是汉字，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經是拼音文字。所以称为“拼音化”就是要把汉字逐漸过渡到完全拼音文字。为了避免改革时有太多的阻力，使它能“潛移默化”，需要保持汉字的形式，并且在很長一个时期里还需要保持这种形式，但实質上它已逐漸走拼音方向，拼音部分的功用扩大發展，汉字部分的使用范圍相对地縮小，这样就逐漸轉化到完全拼音的文字。至于“汉語拼音”排斥汉字，直接从汉語創造拼音文字，当然不能叫做“汉字拼音”。①我过去为了强調“汉字拼音化”，过于反对“汉語拼音”是不必要的，但把我的反对“汉語拼音”硬說成是“反对汉字拼音化”的新奇說法实在使我“莫測高深”。

“汉字拼音化”的最后阶段將和“汉語拼音”一样，是完全拼音的文字，所不同的，只是“汉字拼音化”由量变到質变，由新質（拼音部分）的逐漸积累，旧質（汉字部分）的逐漸衰亡，最后飞躍为完全拼音的文字。这是由汉字的內部引起矛盾而發展出来的新文字。有些同志机械地認为“汉字拼音化”只是量变，不是質变，是錯誤的。“汉字拼音化”从开始拼音化起，就屬于拼音文字的体系，但也必須經过一个从量到質的發展过程才能成为完全的拼音文字。“汉語拼音”論者主張另創新文字跟汉字并行，逐漸推广新文字，縮減旧汉字，虽則也是由量变到質变，但必須用一种文字来战胜另一种文字。我主張“汉字拼音化”是汉字有良好的历史基础，容易行得通，当时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在別的新文字还沒有創造出来以前，不如先把汉字改造，先充分利用，到創造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兩种文字并行。我过去只强調“汉字拼音化”，反对兩种文字并行，这是原則性的錯誤的看法，是有片面性的。

“汉字拼音化”現在要保持汉字的基本形式而將来要發展到完全拼音的文字，这样的辯証發展过程，同

---

① 汉語拼音：汉字——簡化
汉語——拼音————拼音文字

汉字拼音化：汉字—|—簡化——簡字—|
—拼音化——拼音文字—|—綜合文字
——拼音文字

志們往往是不了解的。有些同志机械地認为既然是綜合文字，就絕对不能是拼音文字；有些同志認为既然要保持汉字的基本形式，就干脆不要改革，既然要發展到完全拼音，就不可能保持汉字的基本形式。他們認为“汉字拼音化”的提法是自相矛盾的。他們不懂得事物的發展是从矛盾产生的，汉字里加入了拼音文字以后，在汉字内部發生了兩种对立的要素，一种是脆弱的新生的力量，就是拼音的傾向，一种是傳統的强大的力量，就是汉字。兩种力量相互排斥，相互影响，最后得到解决，將是一种新的文字。汉字归根結底是要退休的，但在它退休以前要作很多的安排，不应該因为急于要改換文字而使六亿人民在文化生活上受到任何方面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經过較長时期的發展，一切現在所碰到的困难問題逐漸在实踐中得到解决后，才能保証順利地由汉字轉化为完全拼音的文字。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这样說，現在保持汉字基本形式就是为的將來發展为民族形式的但又完全拼音的中国新文字。我們說新文字应該从旧文字内部孕育出来，就是要从新旧矛盾对立里得到解决，决不像韋慤同志所理解的是單純地减少和增加。封建糟粕固然要剔除，但如果把汉字了解为只是封建糟粕，不能再从中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那就必然回复到“廢除汉字”的陈腐观点。

“汉字拼音化”在开始时是綜合文字的性質，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比例，是需要因时制宜，逐漸發展的。我从前說一兩千个簡單汉字加上一千多个拼音文字是为扫除文盲，暫时还只需要兩三千字程度的情况而說的。其实，在第一阶段里，尽可以先把一千多个复杂困难而又常用的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利用簡字的形式，一个拼音只代替一个汉字，以避免同音字的混淆。此外照旧使用汉字。經过四五年或六七年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可以逐漸扩大拼音文字的使用范圍。例如：有些复音詞可以改用拼音文字，但需要加上联写符号以避免与單音詞里面的同音字引起混淆；許多用音譯的外来名詞，科学名詞，也可以采用这个辦法；有一些同音字在日用实踐中能够不致混淆的，也可以改用拼音文字。就是这样，讓拼音文字的使用范圍日漸扩大，汉字的使用范圍日漸縮小，經过六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踐，逐漸学会如何更好地使用拼音文字。从汉字發展成为拼音文字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要从長期的不断地斗爭里逐漸成長起来的，要从斗爭中获得經驗积累起来并提高到理論，再来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凡是想一下子制定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徹底、完全、一劳永逸，都是不能实現的。

在綜合文字里的拼音文字只有一千多个，从表面上看，它的数目确是不多，但它們將起巨大的作用，所以說是“以拼音文字为主的綜合文字”。这种綜合文字的性質跟日本文字完全不同。日本的假名只代表音节，并非拼音；日本文字里的假名和汉字，無論在形式上，在性質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王力先生說“日本人用汉字加假名，并沒有人称日本文字为拼音文字”，可是假名不是拼音，加上汉字，怎么能有人想把它叫做拼音文字呢？我們只說在汉字里加入了拼音文字是綜合文字；只說这种綜合文字屬于拼音文字体系，將来可以發展为完全拼音的文字；只說利用綜合文字的形式可以使人民大众立刻就使用拼音文字；可是从来沒有过这样混乱的思想，会說“綜合文字能够算是拼音文字”。

“汉字拼音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形式上看来完全是汉字。至于拼音字母，只要它們能符合这个原則就都可以采用。我們所以暫时选擇了注音字母，那只是因为过去已經使用过，更方便一些；注音字母和拉丁字母也不妨并行。拼音簡字采用自左到右的拼写方法，是因为在汉字形式里用三拼音，横列比直列更自然一些，但是它总得保持方塊的形式。《中国語文》在發表我的文章时，用了过去注音字母的排法，和其他汉字不一致，这就有些像日本文字而不是“汉字拼音化”里的綜合文字了。

“汉字拼音化”形式上繼承汉字的傳統，但發展了拼音的一方面，把汉字的难学、难記、难写等缺点，尽可能地克服，而繼續保存着汉字的基本优点。在推广普通話、汉語規范化还沒有收到显著成效以前，它总还可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有些同志嫌这样改革不徹底，改得太少，但改得少总还比不改好；改得少，改革时的阻力也比較小一些。但就是改得这样少，有的同志还害怕高級知識分子不肯接受，怕改起来麻煩。当然，麻煩是会有一些的，我們的文字改革是几千年历史里从来未有的一件大事，要一点麻煩都沒有是不可能的。但这种麻煩不会比推广簡字多，高級知識分子的接受拼音簡字也將和接受一般簡字差不多。有些人过份夸大了推行拼音簡字的困难，用以反对“汉字拼音化”的实現，实际上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如果說在汉字里加入一些拼音簡字尙且不可能，而說可以把文字全部改換，这是可以想像的嗎？反对現在就使用拼音文字而要等待遙遙無期的“汉語拼音”，难道是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們应取的态度嗎？

新建一所房子总比改建一所旧房子困难得多。我們是六亿人民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我們的文字已經积累了几千年的历史經驗，保藏着極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抛弃这样的現成基础，另外再盖百層大厦以取而代之，虽不是完全不可能，然而談何容易。一刀兩断，舍其旧而新是謀，固然痛快，但总应該爱惜一下人力物力，爭取时間尽量在現在基础上充分發揮潛在的力量。現在，我們很高兴地已經听到这样的提法，汉字在过去

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

韋　慤

在本刊1956年1月号里，我們登載了唐蘭先生所写的《論馬克思主义理論和中国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以及其它有不同意見的文章。我們曾經一再表示，希望唐先生再写文章申述他的意見。現在我們很高兴，由于本刊的請求，唐先生終于写了一篇文章給我們了，他的文章已經在本期登出了，請讀者参閱。

在这篇文章里，唐先生表示出誠恳坦率的态度，我們非常欽佩。唐先生一再表示拥护文字改革，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为了文字改革能够順利地进行，我們不独要有共同的目标，还要有共同的認識和統一的步驟，才能携手前进，为早日完成我国文字的拼音化而奋斗。根据这种精神，我願意談一談文字改革的一些問題，供唐先生参考。

第一，文字改革的目的不是破坏現行汉字体系，而是逐步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現行汉字，作为通用文字。我們正在进行着的只是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制訂拼音方案和其它一系列有关的准备工作。

汉字簡化工作只是把若干汉字的笔画和汉字的数量加以精簡，并不是把現行汉字的表意体系加以破坏，使他变为拼音文字。我們是根据汉字簡化的內在規律来进行簡化的。这些內在規律就是簡体字的規律和行草書偏旁的簡化規律。我們精簡字数主要是精簡异体字，我們只在一般書报里，停止使用已有簡体字代替的繁体字。在印刷古書和引用古書詞句的时候，还可以用特定的繁体字。

曾經有人主張用系統化类推，把全部汉字加以簡化。另有人主張广泛地用同音代替的办法来精簡字数。我們不同意这些做法，因为这样做将使汉字的面貌改变，使已認識汉字的人們也变为文盲了。在修訂簡化字的过程中，我們經常遇到反对同音代替的人們。他們認为这样做將使汉字的意义混淆。由此可見把現行汉字加以很大的改变是窒碍难行的。

在各方面的生活里，我們不可以一天沒有通用文字。維持通用文字使新文字逐漸代替現行文字，是文字改革的正确途徑。因此，我們主張保持汉字体系，对汉字不作大的变更，并繼續使用汉字，讓汉字在推行拼音文字的过程中和拼音文字并存，等到拼音文字普遍推行后，才停止使用汉字作为通用文字。即使在拼音文字普遍推行后，已認得汉字的人們还可以一輩子使用汉字，并且还有人繼續学汉字。一句話說，我們是主張永远保存汉字的。

根据上述理由，我們不同意唐先生所主張的綜合文字，更不同意把汉字的完整体系加以破坏。汉字是我国很宝貴的遗产，应該永远保存下来。

第二，我們主張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語，是經过一番研究，才下这个决心的。我們曾經企圖用汉字笔画来創造字母，以便保持汉字的方塊形式。我們發現这样做要創造六十个左右的字母，使制訂拼音方案的工作复杂起来了。即使仿照注音字母的三拼法，也要用四十个字母。我們曾經拟訂了几个汉字笔画拼音方案，經过仔細考虑后，才加以否定的。

汉字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它的优点不能通过用汉字笔画做字母而保存下来。汉字的主要优点是用各种笔画構成多样化的字形来表达意义。用汉字笔画做字母来拼写汉語，使字形的变化和同音字的分化都受到限制，这就使汉字原有的优点丧失了。在拟訂汉字笔画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我們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保存汉字的优点就得保存汉字整个体系，而保存汉字整个体系就使文字难認、难写、难記和不便使用。这是我們所遇到的基本矛盾。我們选擇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語来解决这个矛盾。事实上，这是我国六十多年来文字改革經驗的总結。

我們用拉丁字母拟訂的拼音方案已經在报上發表过，并且經过广泛地征求各阶層人士的意見后，另行拟訂了若干修訂案。这些修訂案也經过座談討論，正在审訂中。等到审訂完畢后，再由审訂委員会报請国务院审核公布。

拼音方案公布后，我們准备用来做推广普通話的正音工具和制訂拼音文字的基础。摆在我們的面前，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唐蘭先生对文字改革有独特的意見，并且主張發展兩种拼音文字。我国文字本来是統一的，將来的拼音文字也应該是統一的。發展兩种文字是否妥当，还請唐先生考虑。

和現在都有一定的功績，它还可以長期存在，不用害怕取消等等。那末，讓我們再呼吁一次吧！汉字旣然可以存在，还可以为人民服务，那就应該容許它进一步改造，容許它發展为拼音文字。就汉字来說，要求进步，总不是什么原則的錯誤。改造它可能有些麻煩，但它在目前总还有很大的用处。"汉語拼音"論者也不必为改造汉字而感到不安，因为这对另外創造体系完整的新文字，不但不会有所妨碍，并且还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我們六亿人民的国家，不妨同时發展着兩种拼音文字。那末，讓我們一切文字改革工作者捐除成見，共同携手前进吧！我們在同一条战綫上，大家来争取早日完成中国文字改革，迅速走上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吧！

意义是不是划分汉語詞类的唯一标准?

——評傅子东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

仲　宣

汉語詞类問題，語言学者討論了很久，还沒有定論。《中国語文》1956年9月号至12月号發表了傅子东先生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傅先生在文中批判了各家区分詞类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見解——詞的概念、意义或性質是划分汉語詞类的唯一的标准。①我对于这篇文章提出下列几个問題。

一　詞的第一性第二性問題

傅子东先生認为詞的意义和功用有本質和現象的区别。詞的功用是詞的概念、意义或性質的表現，詞的性質是和詞的独立存在分不开的，性質出現在先，是第一性的，功用出現在后，是第二性的。因此，他得出結論：从詞在句子中的职务或詞与詞的各种結合关系来区分詞类的观点是唯心論的或屬于語法领域的功用論的；从詞本身形式的变化来区别詞类的观点，一部分是信仰主义的，一部分是功用論的；从詞义、形态、功能三者的有机联系来区别詞类的观点是主观唯心論的或二元論的；只有从詞的概念、意义或性質来区分詞类的观点才是唯物論的。詞的意义是第一性的，功用是第二性的，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論点，我們应該尽先討論。

我們能不能用哲学中关于第一性第二性的論断来說明詞的意义性質和詞的功用兩者的关系呢？据我看来，这是很成問題的。哲学中的基本問題——什么是第一性的，什么是第二性的——是意識的来源及客观存在与精神意識的关系問題。而詞的意义、性質和詞的功用（包括詞与詞的各种結合关系）兩者的关系并不是客观存在与精神意識那种关系。客观存在决定意識，客观存在改变，精神意識也要改变。詞的意义变了，它的功用可能变也可能不变。"白紙"的"白"和"白吃"的"白"是意义和功用都改变的例子；"推小車"的"推"和"推光头"的"推"是意义改变而功用不变（都是动詞）的例子。这是第一点。其次，如果說詞在未入句子結構之前就有意义，因此說意义是第一性的，功用是第二性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詞沒有意义（包括詞彙意义、語法意义）就不成为詞，同样，沒有任何功用的詞，也是不存在的。厚彼薄此，沒有必要。

語言是社会的現象，作为構成語言建筑材料的詞彙当然也是社会現象。詞的意义、性質和功用都是客观存在，同样地受社会的制約，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正因为詞的意义、性質和功用都是社会客观存在，語言学家才有可能研究用詞造句的規律，語法学才成为一門科学。

傅子东先生曾說："蜜蜂麕集着花园里，'蜜蜂'不能放在'着'或'里'之后，也不能放在'麕集'或'花园'后。"②为什么不能这样放呢？不是因为詞的意义和功用双重关系嗎？傅子东先生把詞的意义、性質和詞的功用割裂开来，忽視了它們內在的有机联系，因此，他片面地强調了意义在划分汉語詞类中的作用，而不重視詞的功用。他似乎只認为詞的意义、性質是独立于語言学家意識之外的客观存在，却不認为詞的功用也是独立于語言学家意識之外的客观存在。

如果不說詞的意义是第一性的，功用是第二性的，而采取另外的說法，例如說"以客观存在对詞和概念而論，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我想这才符合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詞的意义、性質决定它的功用和詞形的变化，这是傅子东先生以意义性質为第一性、功用为第二性的重要理由。其实，詞的意义性質固然可以影响詞的功用，但是在划分詞类的时候（尤其是划分汉語詞类），从詞的功用着眼也可以决定它的意义性質，使它的意义、性質更加明显，詞类更容易辨認。傅子东先生也曾說："任何詞的一定意义是从它跟句子的关系上才能明确地認識的。"（2頁）划分詞类不能完全撇开詞的功用而只考虑它的意义、性質，正如鑒定一个人不能离开他的行为而孤立地評論他的品質。人的行为必須在社会里表現，詞的功用必須在詞与詞的結合关系里表現。衡量一个人从他和别人的关系里去观察，并不能說这样做就会否定这个人的独立的存在；从詞与詞的結合关系中鑒定一个詞的詞性，当然也不能說这就否定了詞的独立存在。傅子东先生常以演員憑借化裝扮演剧

---

① 《詞类的区分和辨認》："一句話，詞的概念，意义或性質（它們是不断發展的）就是詞类区别的惟一的标准。"（《中国語文》1956年12月号42頁），"所以我們可以說意义是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汉語詞类区别的标准。"（同上44頁）

② 傅子东：《語法理論》113頁。这句話的"着"普通話应为"在"。以下仅举頁数，均系同書。

中人比喻詞憑借一定的位次形态表現出它的功能。我們也不妨用演員作比喻。假使一个演員从来沒扮演过某种脚色，怎样証明他有扮演某种脚色的性質、能力？同样的道理，假使一个詞（感歎詞除外）从来不放在結構里，它的性質不就很难捉摸嗎？主張从詞的功用划分詞类的人事实上也不能抛开詞的意义，从功用来分詞类，怎么能說这样就是否定詞的独立存在呢？但是傅子东先生却这样說："詞与詞的結合是詞本身的功用的表現，以詞的功用来区别詞类是否定詞的独立存在。"①这未免太武断了。詞是概念的語言外壳，它所表示的概念、意义、性質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誰想否定詞的独立存在也否定不了。

至于性質出現在先、功用出現在后的說法，我看也是不能成立的。詞的性質和功用同时产生，正如同思維和語言不能分別出先后出現的次序，詞的性質和功用也不能分別先后出現的次序。退一步說，即使詞的性質出現在先，功用出現在后，也不能說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因为前面說过兩者沒有物質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識的关系，仅仅根据事物現象出現的先后而决定哪是第一性的，哪是第二性的，就有把唯物論庸俗化的危險。

二　詞的位次形态問題

傅子东先生詞的位次形态說跟黎錦熙先生以句法的六大成分为标准的"詞位"說②貌异而心同。怎么說是貌异呢？"团結产生力量"的"团結"，他認为"在进入句子前是具有指一种抽象事物的名詞性質的，在进入句子后执行产生这个动作的动作者的职务，或表現出主詞或充当动作主体的功用"；"大家团結起来"的"团結"，他認为"在进入句子前是具有指事物的一种动作的动詞性質的，在进入句子后执行述說主体事物大家动作的职务，或表現出述詞或充当述說主体动作者的功用。"③黎先生則認为第一句的"团結"由于句法成分上客观的需要才轉变成抽象名詞。虽然黎先生也說："动、形轉成的抽象名詞，却不能說在汉語中不存在，因为这是說話者为表达他的思想，从他的头腦中出現的观念和詞性，語法上就該認为实体詞，并不是这些詞进入句子后才临时轉变的"④，但是他主張詞的性質和詞的作用在詞类上的統一⑤，把詞的功用当作区分詞类的次要标准。傅子东先生实际上是从結構关系中看出詞性的，不过他倒轉过来說人們在未說某个詞之前，这个詞就具备某种詞性罢了。这种說法，似巧而实拙，因为假定沒有"团結产生力量"这类句子，空說"团結"具有抽象名詞的性質，那連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怎么說是心同呢？他認为名詞（包括代詞）正常地憑借主位这个位次形态扮演主詞或宾詞，也可以憑借补位或偏位的位次形态兼执行补詞或偏位詞的职务，即执行跟形容詞所执行的同一的职务；有些名詞（或代詞）也可以憑借从位、述位的位次形态执行从位詞、述詞的职务，即执行跟副詞、动詞所执行的同一的职务。名詞执行跟形容詞、动詞、副詞所执行的同一的职务的时候，他不認为它們轉变成形容詞、动詞、副詞。例如"中国的人民"的"中国"还是名詞。"人其人"的第一个"人"給予"人"以"使…变成的意义"，即使那些（佛家之）人变成（儒家之）人；"豕人立而啼"的"人"的从位这个位次形态給予"人"以介詞"如"的意义，即豕如人立而啼。这兩个"人"都还是名詞。照他这样解釋，同屬述位这个位次形态的名詞必須随文立义才能說得通。"人其人"的"人"解釋为"使…变成的意义"，"火其書"⑥的"火"、"門其三門"⑦的第一个"門"、"士兵之"⑧的"兵"就不能用同样的解釋。随文立义，大概就是以意义为区别詞类标准者的妙用所在。

名詞兼位，他是那样的处理。至于动詞、形容詞、副詞的兼位呢？他并不同样处理，他只許动詞憑借述位这个位次形态扮演述詞；只許形容詞憑借补位这个位次形态扮演补詞，或憑借偏位这个位次形态扮演偏位詞；只許副詞憑借从位这个位次形态扮演从位詞。动詞形容詞执行主位宾位詞的职务时，他就認为已孳生成抽象名詞；副詞执行偏位詞的职务时，就認为已孳生成形容詞。例如"慢是好的，太慢是不好的"的"慢"是形容詞孳生的抽象名詞，"太"是副詞孳生的形容詞，"鳥高飞"的"高"是形容詞孳生的副詞，"不怕打击"的"打击"是动詞孳生的抽象名詞。

他的位次本职兼职說和黎先生所謂名詞代詞有七个位，兼职不变类，动詞形容詞兼职就得变类的說法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差別。不过黎先生看出照詞义定詞类和照詞在組織中的作用定詞类中間的矛盾，主观上想求其統一而不得，于是說："普通詞典只能看定單个詞的詞义的性質特征注明它的主要的詞类。它进入句子后所起的作用，既有一定的規律可以說明，就可以讓語法書去說；至于作为复詞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就

---

① 《中国語文》1956年10月号，28頁。

② 《汉語的詞类問題》，24頁。

③ 《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34頁。

④ 《語文学習》，1955年7月号，37頁。

⑤ 《中国語法中的"詞法"研討》，見《汉語的詞类問題》，22—26頁。

⑥ 韓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11。

⑦ 《左傳，襄公10年》。

⑧ 《左傳，定公10年》。

⑨ 見《汉語的詞类問題》25—26頁，并参考同書162—163頁。

应当把說明的任务交給專科性的語法詞典。"①这样也就是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来解决从詞义出發和"拿句法来控制詞类"的矛盾。傅子东先生則走另外一条路，他企圖拿他的位次形态的理論作为武器把詞典上的詞类和詞在組織中的詞类截然划开。因此他說："这个位次底理論自然也适用到拉丁語系底文法上，它可以攻破兩千年来沿襲的把字典上的詞类与組織中的詞类混淆为一的素朴形式論"。②他这种理論和上面黎先生的办法可以說是殊途而同归，还是不能解决詞类問題的矛盾。黎先生后来对于詞类标准的看法已有进一步的發展，他說："汉語詞类問題是必須把詞义、形态、功能三者联系起来，互相制約，才能解决的"③，而傅先生还保持旧說不变。

詞未进入組織以前所具有的独立性質，傅子东先生特别强調。他說："光荣作为一种抽象的事物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中国的光荣或中国之光荣，作为事物的一种性質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光荣队員或光荣之队員，作为动作的一种狀态反映在人們头腦中时，人們才会說出光荣地生或光荣而生。…光荣在进入詞群以前具备了三种不同的性質。"④我們并不否定傅子东先生这段話，但是要問："光荣"这个詞既然在沒有跟别的詞發生联系以前具有名詞、形容詞、副詞的性質，按照詞的性質区分詞类的原則，在詞典里就应当注明"光荣"有三种詞性，那末实际上从組織中看出来的詞类还不就是詞典中的詞类嗎？怎么能够把它們划开呢？

傅子东先生在这里又有个唯物論的解釋。他說："一般說来，詞的性質和詞的功用出現矛盾时，根据由量变进展到質变的法則，旧詞孳生出新詞，于是詞的性質和功用的矛盾消灭了，詞的性質和功用的統一出現了。"（89頁）他有这样的例証："'圈豹檻虎'（前汉書董仲舒傳），'圈'和'檻'都是名詞，在这里执行着跟动詞所执行的同一的职务，但'圈'已由量变發展到質变，卽由名詞'圈'孳生出动詞'圈'，如現在口語說'圈了几亩地'，'檻'还是名詞。这类名詞都是由于它所指的东西的作用的意义，孳生出动詞来的，这样孳生出的动詞数目很多。"（38頁）事物現象由量变到質变必須經过一定的演变过程，"飞鳥"的"飞"，傅先生說是由动詞孳生的形容詞⑤，不知道有什么証据証明"鳥飞"的动詞"飞"一定产生在前，而"飞鳥"的"飞"，是量变到質变产生的形容詞。照这样說法，詞典里就要憑空添出大量孳生的新詞条目，才能給每个詞标注出不同的詞性来。結果恐怕仍会应驗黎先生那句話："那么詞典中注明詞类，就成了个大包袱。"⑥

傅子东先生說："按不变的詞性分辨詞类，按独立于形态外的詞的功用区别詞品，这是唯心論者叶思丕森等語法理論的双軌；按發展的詞性分辨詞类，按依存于位次形态的詞的功用区别詞的职务或句的成分，这是我們唯物論者語法理論的双軌。"（118頁）实际上詞的位次論就是詞在組織中的功用論，和区分詞类的标准不是漠不相关而是息息相通的，不过他不肯承認罢了。

三　詞类标准一元論問題

在《詞类的区分和辨認》这篇文章里，傅子东先生既反对用詞的功用或广义的形态来划分汉語的詞类，又反对用多种标准来划分詞类，認为这是二元論的观点。現在从他的实踐看来，他并不能堅持他所謂一元論的立場。

首先我們看他怎样說明形容詞和副詞："凡詞指一种东西所包含的性态或对这种东西加以某种修飾或限制的就是形容詞"，"凡詞指动作所包含的狀态或对动作加以某种修飾或限制的就是副詞。"⑦这兩个詞类的說明，前半段都是就意义或性質說明，而后半段是就詞与詞的关系（卽詞的功能）說明的。再看他这样說明代詞："代詞代替名詞"，这样說明介詞："介紹名詞給动詞或其他詞类above指明它跟它們的关系"，这样說明連詞："联接句、語或詞"，那更是專从詞的功用着眼了。完全根据意义，就是說明詞类也是困难的。

其次，他反駁文煉、胡附兩先生的"腐爛"和"腐敗"、"腐化"詞性不同的說法时，有这样的話："'腐爛的肉，腐敗的肉，腐敗的东西'，腐化的东西，这証明腐爛像腐敗或腐化一样都是形容詞。"⑧他指摘人家用詞与詞的結合关系来区分詞类的时候，自己手里却在揮舞着同样的武器。可見对具体的詞發生詞类爭論的时候，詞义决定論者也只有借助于詞的功用以决胜負，顧不得理論与实踐脫节的矛盾了。

他批評俞敏先生兼用語法环境划分詞类时說："以語法环境划分詞类，正如以重疊式划分詞类，不能把指事物性狀的形容詞和指动作情况的副詞区别开，也不能把所謂虛詞归类起来。"⑨狭义的形态变化（重疊式）是俞敏先生区分汉語詞类的一个标准，語法环境（卽广

---

① 《汉語的詞类問題》，23頁。

② 傅子东：《傅氏白話文法》，2頁。

③ 《語文学習》，1955年7月号，40頁。

④ 《中国語文》1956年10月号，26頁。

⑤ 《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35頁。

⑥ 《汉語的詞类問題》，23頁。

⑦ 《中国語文》1956年12月号，42頁。下文代詞定义同見此頁。

⑧ 《中国語文》1956年10月号，29頁。

⑨ 《中国語文》1956年9月号，15頁。

义的形态）是他区分詞类的一个輔助手段，他并不單独使用一个标准。要說这兩种标准不能解决問題，同时也应該知道意义这个标准同样地不能把虛詞定出詞类来。

当然，誰也不能否認詞的意义、性質对于划分詞类有很大的作用。謝尔巴院士說："不看意义，就不能确定形态标志之为形态标志，因为不看意义，就不知道它們是否有意义，它們是否作为标志而存在，范疇本身是否存在。"①他并沒說可以完全不顧形态标志或不用其他标准划分詞类，他只是說："如果我們知道 какаду（白鸚鵡）是一种鳥的名称，那么我們就不必为弄清它是一个名詞而去找它的形态标志"。②但有些詞單憑意义就很难决定所屬的詞类，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得酌用其他的标准，上面所举"腐爛"这个詞就是一个例子。

表示同一个概念，有的語言用一个詞表示，有的語言用詞組或句子表示，即在同一个語言里表示一个概念也可以用一个詞、詞組或句子。同一类概念的詞在各种語言里所屬的詞类并不一致。如果詞的概念、意义、性質和詞类是一对一的关系，各种語言的詞类就应該相同，但事实上大体相近，內容有別，这說明語言有其共同性，也各有特殊性。現在把英、德、法、俄語中有关"餓"和"现在"兩类概念的詞列表如下：

概念	"餓"				"现在"		
語别 \ 詞类	名	动	形	副	名	形	副
英	hunger / hungriness	hunger	hungry	hungrily	now	present	now
德	Hunger	hungern	hungrig		jetzt （现代，近世）	jetzig / gegenwärtig	jetzt
法	faim	affamer	affamé			— / actuel	maintenant / actuellement
俄	голод	голодить	голодный	голодно		теперешний	теперь / сейчас

汉語里表示"餓"和"现在"兩类概念的詞沒有像德語俄語那样的詞形变化，單憑意义分詞类，各人的意見就会很紛歧，同时很难說服汉語無詞类論者。

区分詞类是为了分析語法現象的客观需要。如果單純从概念、意义、性質区分詞类，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分类法。«尔雅»自釋亲起至釋畜止共16种，是一种分类法，«釋名»自釋天起至釋丧制止共27种，是一种分类法，英国人 J. L. Roget 的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先分各种概念为一千类，再把英語的詞归入各类，又是一种分类法。傅子东先生把汉語的詞分成名詞、代詞、动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嘆詞、助詞，这就意味着他按照分析汉語語法的特点和需要而划分詞类，不是按照一般的概念范疇来划分詞类的。

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27节这样解釋詞类："在俄語里，詞分成若干类，以它們的基本意义，以每一类所特有的語法范疇，以造詞和造形的类型，互相区别。这样的类称为詞类。詞类也以它們在連續語言中所起的作用互相区别"。③馬季欽科的«俄語語法»第一冊中关于詞类划分原则这样說："(1)根据意义(意义特征)，(2)根据在句子中的作用及和其他單詞的联系(句法特征)，(3)根据詞形变化和構詞法。"④对于形态变化丰富的俄語，苏联語言学家尚且不能用一种标准划分詞类，用一种标准划分汉語的詞类更成問題。認为意义是划分汉語詞类的一个重要标准还可以，認为是唯一的标准就不切实际了。

末了我引用胡明揚先生的話結束本文："脫离語法特征而單純从意义着手是不正确的，但是單純从語法特征着手不顧及意义也是不正确的，并且把意义和語法特征結合起来就决不是什么唯心主义"。⑤

---

① Л. В. 謝尔巴：«論詞类»，刘涌泉譯，«中国語文»1956年5月号，42頁。

② 同上注。

③ 轉引呂叔湘«关于汉語詞类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見«汉語的詞类問題»，136頁

④ 轉引胡明揚«关于汉語的詞类問題»，見«教学与研究»，1956年6月号。

⑤ 同上注。

論“所以”的上古用法

——駁《說“所以”》

楊伯峻

《中国語文》1957年1月号刊載了刘冠群同志的《說“所以”》，文中首先便引用了我的《文言語法》的这段話：“‘所以’兩个字上古只有‘王之所以叱逐者，以楚国之众也’这种用法。这种‘所以’相当于口語的‘…的緣故’。若用在表示結果的分句，象現代口語一样，只是后起的現象。”并且反駁說：“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一下古代文献，就会發現楊先生的这种說法是与事实不符的。用在表示結果的分句，象現代口語一样的‘所以’，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見其例。”

我完全不能同意刘同志的这种反駁以及他所論述的一些論点。

首先得說明，《文言語法》是一本为适应一般讀者而写的論著，其中有若干为著者所初次提出的論点，为篇幅和体例所限，不能不只粗略地举出其結論，而不便加以深入而詳尽的論証；甚至举例，也竭力避免那些疑似之間以及艰深費解的句子。但其結論，都是經过專題研究而后写下的。关于“所以”的用法历史也是如此的。但是后来，我在《从汉語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①一文中有机会作了詳尽的論述。很明显，刘同志不曾見到这一篇論文。从那一篇論文中可以知道，把上古的“所以”的用法和今天的“所以”的用法視同一律的，不始于刘同志，黎錦熙先生早就有这一說法了。而这一說法，在我看来，不能說是正确的。而且刘同志又和黎先生有所不同。黎先生只对“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这种疑似之間的“所以”有所誤解，对其他“所以”的用法則理解得非常正确。② 而刘同志却不如此。因为他不太懂得上古的詞法和句法，把文言中一切“所以”的用法都講錯了，因之在他那篇文字中，对文言的“所以”的講解几乎一無是处。关于“所以”的上古一切用法以及其变迁史，我認为在我的《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如果看了那一篇文章，刘同志的一切論点都可以不攻自破，因之，在这里沒有重复述說一遍的必要。

簡單地說，“所以”是短語，其意义隨“以”字的不同意义而有所歧异。“以”字若当“用”講，則可解为“的方法”，如《墨子，公輸篇》的“吾知所以距子矣”（刘文例10），怎么能当“怎样”“为什么”講呢？这种用法和《孟子，滕文公》的“皆所以明人倫也”（刘文例12）并無不同，又怎可以区別为二呢？若用“以”字当“因”講，則可講为“的原因”“的道理”，如《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的“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刘文例7），怎么能說它是疑問代詞呢？刘同志的錯誤在于不懂得“所以”和謂語結構相結合便变它为名詞短語的句法功能这一規律，一棋失算，便滿盤皆輸了。

在刘同志的文章中，曾举了《战国策》一句做例証，那句是：“夫不听智过，亦所以亡也”。就从这一例句中正可以看出上古的“所以”不同于今日的“所以”，而刘同志竟誤解了。若把这句譯为現代汉語，应該是：“不接受智过的言語，也就是［智伯］被灭亡的緣故”。因为：（甲）在原句中，“夫”为提挈詞，便足以說明这是一句判断句；（乙）在原句中，“亦”为副詞，但用如連系性动詞③，等于今天的“也是”，也可以証明它是判断句；（丙）因之，“所以亡”只能看作名詞語，而語气詞“也”字是表示判断用的。我在《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中曾于“全面地考察古代文献”以后作过这样的結論：“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先秦古籍中，‘所以’只能看做短語，不能看做詞，更沒有把它作为表果連詞用的。因之，凡用‘所以’起头的判断句，一般都用‘也’字結束，这是上古汉語省却主語与系詞的判断句的一般句法。”刘同志一文中的若干例句很可以运用这一規律来解釋，而刘同志都講錯了。

正确地了解“所以”用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們能够正确地了解古代的句法和古書的內容，而且还有助于鑒別古書的眞伪。我曾运用它来鑒定《列子》，在这里無妨再举一例。《尙書》的孔安国的“傳”，絕不是西汉的孔安国的作品，淸代的学者已有定論。有人說它出自王肅之手。我对这一主張目前暫取保留态度。但是，它是魏晋人的作品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从作伪者运用“所以”兩字也可以看出。《益稷》（伪古文）的伪傳說：“言神人洽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乐，所以太平。”这个“所以”，才是今天的“所以”，然而可惜它又是一部伪書。

这一問題我以为頗为重要，因此对于一些錯誤的說法不惜一而再地表示自己的見解。

---

① 見《新建設》1956年7月号。

② 見黎錦熙《比較文法》，著者書店，北京，1933。

③ 參見楊伯峻《文言語法》，大众出版社，北京，1955，150頁，8•27。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節?(續完)

——一个初步的調查統計——

刘澤先

三

表里列举了各种不同声調的音节。可是，这并不等于說我是主張拼音文字里要完全标注声調的。相反地，我个人的实踐証明，拼音文字里只有很少的情况是需要标注声調的。这一点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表里面每一个音节所占的地位里，从左到右，头一格的是陰平的；第二格的是陽平的；第三格的是上声的；第四格的是去声的；第五格的是輕声的。在这篇文章里，这五声分别用 ¯ ˊ ˇ ˋ ° 来表示。

輕声是不同于陰、陽、上、去的另一种声調。尽管它是由重讀的陰、陽、上、去各調的音节变来的，但是它在北京話里已經成熟地發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声調了，有几乎和各重讀音調同样固定的調値，所以，我們应当承認它的地位。比方說，"夫·服·腐·父"本来分别是陰、陽、上、去声調的字，各不相同，但是在"大夫·衣服·豆腐·师父"里，它們都变成了完全同音的輕声字，而跟本来的念法不一样了。

認为輕声可以跟陰平混用，不加区分，那是不恰当的。念"哆哆嗦嗦(duo¯duo°suo¯suo¯)"就可以知道。輕声是短促的降調，所以說它跟去声比較接近，倒近乎情理，然而也只是比較接近而已。"西直門(Hi¯zh°menˊ)"的"直"或"豆腐腦兒(douˋfu°naurˇ)"的"腐"，北京人一向念輕声，但是这些輕声字偶然要加重念出来的时候，重重地念成去声那是地道的北京念法。只有在上声后面的輕声还比較接近陰平一些，例如"五十五(wuˇsh°wuˇ)"的"十"。

我們把北京話的声調分成五种，可以說是从音位学的观点出發的。因为这五种声調的区别跟詞义的区别是相呼应的。尽管实际語音里声調并不見得都咬得那么清楚，有时候落在某兩个声調中間，但是在咬得清楚的时候，它們总不外这五种。所以，从音位学的观点出發，我們可以說北京話里确有五种声調，同时也只有这五种不同的声調，沒有第六种。

声母、韵母完全相同的音节，如果用不同声調念出来，就常常代表不同的意思，这种例子很多，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比方說：

hia¯zi¯：人家会听成"瞎滋"(总是有人在那兒滋水的时候才說)。

hia¯ziˇ：人家会听成"虾子"(虾的卵子)。

hia¯z°：人家会听成"瞎子"。

hiaˊz°：人家会听成"匣子"。

hiaˋzˇ：人家会听成"下子"(产卵)。

hiaˋz°：人家会听成"下子"(多半說成"一下子、这下子、那下子、哪下子"等)。

但是請不要誤会，不同声調常常代表不同意思，是北京話实际上存在着的事实，这跟拼音文字里需要不需要标注声調、需要到什么程度完全是兩件事。因为拼音文字里不标注声調，人們常常也能判断声調。

輕声音节不像原音节那样容易統計。因为原音节有字典的字表作藍本，只要搜罗一些材

料来作增删的根据就行了。輕声音节必须从头調查起。一个字念不念輕声，多半只有当它組成詞儿并且处于詞尾或詞中的位置时，才能知道。这就得大量搜集詞儿才行。打开字表挨个儿想是不大容易想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我的材料一定有很多遺漏的地方。

还可惜的是，限于篇幅，这篇文章不能把帶輕声音节的整个的詞儿或例句介紹出来。

差不多任何上声字都有机会說在另外一个上声字的前面。在这种情形下，它要念成陽平。“北(beiˇ)”是上声字，但是在“北海(Beiˊhaiˇ)”里，它是陽平字。这陽平的音 beiˊ，应当也算是北京話里的一个音节，因为它是固定地存在着的。

这种由上声音节变来的陽平音节算是 E 类的，在表里用 E 来表示着，除非这陽平音节还有别的字作例子。

北京人喜欢用加重的重复来强調他的描写，这重复的音节常常念成陰平，并且常常儿化。例如:

快快地(kuaiˋkuai¯de°)跑。
烤得热热的(reˋre¯de°)。
打扮得闊闊儿的(kuoˋkuor¯de°)，
鷄蛋臥得嫩嫩的(nenˋnen¯de°)。
瞄得准准的(zhunˇzhun¯de°)再打。
挑一个澀澀的(seˋse¯de°)柿子給他。
燉得爛爛儿的(lanˋlar¯de°)。
把头髮抓得乱乱的(luanˋluan¯de°)，
略略地(lyeˋlye¯de°)加点儿鹽。
揉得軟軟儿的(ruanˇruar¯de°)。
漂漂亮亮儿的(piauˋpiau°liang¯liangr¯de°)。
急急忙忙的(giˊgi°mangˊmang¯de°)。

这些陰平的音节，在表里也都有它們的地位。

三个音节說在一起的时候，中間的音节如果是陽平的(不管本来是陽平的，还是从上声变成陽平的)，常常念成陰平声。例如，“共产党”可以念成 gungˋchanˊdangˇ，也常常念成 gungˋchan¯dangˇ。这种变調的性質，我还在繼續研究中，所以暫时还沒有列在表里。

我調查过許多人，他們在对小孩子說話的时候，有些單音詞儿常常重复起来，把第二个音节說成陰平(有时候儿化)。例如，

“手”說成“手手(shouˇshou¯)”;
“飞”說成“飞飞(fei¯fei¯)”;
“奶”說成“奶奶(naiˇnai¯)”;
“收”說成“收收(shou¯shou¯)”;
“餃子”說成“餃餃儿(giauˇgiaur¯)”;
“嘴”說成“嘴嘴(zuiˇzui¯)”。

这类变調的范圍很难确定，也很难調查，但是对音节的統計影响不大。

在叫人的时候，有几个称呼末尾的音节要改变一下声調：改成陰平、去声，或是接近于陰平、去声。例如:

“奶奶”: naiˇnai° ⟶ naiˇnai¯, naiˇnaiˋ
“姐姐”: gieˇgie° ⟶ gieˇgie¯, gieˇgieˋ
“妹妹”: meiˋmei° ⟶ meiˋmei¯, meiˋmeiˋ

有兩个这样的音节也列在表里了。

以上这些从别的声調的音节变来的音节，也都算是 E 类的。

四

我們承認北京話里儿化音节的存在和地位是一件事；我們提倡不提倡大家来說儿化音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把北京話里儿化音节的發音弄清楚是一件事；要求不要求大家都照北京音咬准是另外一件事。我們为北京話的儿化音节設計一套拼写方法，要拼音文字能够拼写北京話的儿化音节，这是一件事；要不要叫大家在拼音文字里拼写儿化音节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用汉語拼音字母 r 或注音字母儿来表示儿化。r 和儿只是一个記号，叫人們卷一下舌

头。r 和 ㄦ 并不是有一定音値的一个音素。从来源上說，ㄦ 化音是音节跟 ㄦ 拼合而發展出来的，可是从現在的發音上来說，ㄦ 化音并不是原来的音跟 ㄦ 相拼而成的。如果把"鼓"跟"ㄦ"相拼，結果并拼不出北京音的"鼓 ㄦ"来，反倒拼出"鬼 ㄦ"或"滚 ㄦ"的音来了。

r 和 ㄦ 是叫人們改变發音(卷一下舌头)的一种記号。ㄦ 化以后的音，显然跟原来的音并不相同，也不是兩个音的相加。所以，我們把 ㄦ 化音看成另外一类不同的音节是完全正确的。

北京話里有許多詞 ㄦ，ㄦ 化跟不 ㄦ 化意思上有很大的出入。例如：

一塊(jiˊkuaiˋ)——"塊"是計算單位。

一塊 ㄦ (jiˊkuarˋ)———同。

火星(huoˇhingˉ)——行星之一。

火星 ㄦ (huoˇhingrˉ)——星星之火。

爷們(jeˊmen˚)——成年男人或丈夫，不見得是复数。

爷們 ㄦ (jeˊmer˚)——指男人們，多半是長輩叫晚輩或晚輩叫長輩的时候用，"們"不一定指复数。

爷 ㄦ 們(jerˊmen˚)——指男人們，常合指長輩和晚輩，——自然是复数。

白面(baiˊmianˋ)——麦粉。

白面 ㄦ (baiˊmiarˋ)———般白色粉末 ㄦ，或指海洛因。

沒跑(meiˊpauˇ)——"跑"是动詞。

沒跑 ㄦ (meiˊpaurˇ)——沒有逃掉的可能。

要缺(jauˋkyeˉ)——將要缺少。

要缺 ㄦ (jauˋkyerˉ)——什么缺少要什么。

送信(sungˋhinˋ)——送信件。

送信 ㄦ (sungˋhierˋ)——傳遞消息。

肥瘦(feiˊshouˋ)——肥瘦程度。

肥瘦 ㄦ (feiˊshourˋ)——肥瘦程度；半肥半瘦的肉。

老將(lauˇgiangˋ)——老手 ㄦ，例如說"老將出馬，一个頂倆"。

老將 ㄦ (lauˇgiangrˋ)——象棋里的"將"和"帅"。

我跟他一样也不买——我們倆一样，我們都不买。

我跟他一样 ㄦ 也不买——我們倆一样 ㄦ 东西也不买。

这本書有一点 ㄦ 髒——"髒"是主要謂語。

这本書有一点 ㄦ 髒 ㄦ——"髒 ㄦ"是名詞。这种說法很明确地指出書上有一处或几处髒点子。

还有些音，由于 ㄦ 化或不 ㄦ 化，北京人听了会有不同的理解。

{juˊpiauˋ——郵票。
{juˊpiaurˋ——油票 ㄦ。

{hiauˇbianˋ——小便。
{hiauˇbiarˋ——小辮 ㄦ。

{daˇgia——打架。
{daˇgiarˋ——打价 ㄦ(还价 ㄦ)。

{jiˋgiauˇ——一脚。
{jiˋgiaurˇ——一角 ㄦ(四分之一)。

{maiˋbuˋ——卖布。
{maiˋburˋ——迈步 ㄦ。

北京話里哪些字必須 ㄦ 化，哪些字可以 ㄦ 化可以不 ㄦ 化，哪些字不 ㄦ 化，大致是有一定的習慣的。北京的習慣跟其它地区的習慣并不一致，而文章里的例子也未必跟实际語言一致，所以 ㄦ 化音节又得来一个实地調查才能确定。

ㄦ 化音节比原音节难調查得多。您不能拿一个字来問人家：这个字 ㄦ 化不 ㄦ 化。因为，有許多字总得在一定的詞 ㄦ 里才 ㄦ 化。比方，"实、五、八、酸、軟、爛、好、窄、常、海、缺、瘦、薄、卖、开、項、熟、近、远、瞎、橘、金、桂、迁、奎"这些字，就很难看出它們有沒有 ㄦ 化；只有拿像下面包含这些字的詞 ㄦ 去問人家，才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老老实实儿的　小五儿　臘八儿　甜酸儿　服软儿　破爛儿　叫好儿　寬窄儿　常常儿　刘海儿
要缺儿　肥瘦儿　薄薄儿的　小买卖儿　見个开儿　进項儿小去項儿大　半熟儿　抄近儿　繞远儿
摸瞎儿　金橘儿　滴滴金儿(一种象火藥捻子的烟火)　賈桂儿(法門寺)　时迁儿(水滸傳)　李多奎儿
(著名老旦)

由此看来,必須在平常多搜罗儿化詞儿,从这些詞儿里統計出儿化音节来。光是照字表挨个儿想是不大容易想出来的。因此也可知,我所統計的儿化音节表是远不够完全的。这不是短时期、一兩个人的力量可以作得完全的。同时,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把帶儿化的复音詞都列出来。这样,讀者难免有不易了解某些字是在什么詞儿里儿化的。

儿化音节表跟非儿化音节表一样,也是每一个音节的地位里,从左往右,陰、陽、上、去、輕声五种声調各占一格。来源不同但是發音相同的,就并列在同一个格子里。不同格子里的,都是不同音的。

表里的字都是可以儿化的。自然,它們有的也可以不儿化,看人、看情况而定。

由于过去对北京話的儿化音节一直沒有搞得很清楚,有很多問題并沒有發現,所以用拼音字母去拼写它們也談不上怎么样正确。現在,根据我的統計,把拼写方法也从新安排了一下。这样的拼写方法恰当不恰当,很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但是应当交代一下:我并不一定要大家这样来拼写儿化音节,因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严格了一点儿。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必要表現北京話里实际情况的时候,我們將来的拼音文字应当能够这样地表現出异同来。

关于發音上的异同,我应当重点地交代一下。可是我不打算申述什么理由。也可以說是沒有什么理由,因为这些异同只是根据北京人的發音。如果哪位对这些發音上的异同怀疑,那好办,找一位老北京,听听他的發音,問題就解决了。

原来不同的音节,儿化以后有的变得相同了。儿化以后变得一样的音节有:

(a) 韵母是 a(ㄚ)、ai(ㄞ)、an(ㄢ)的各音节。

(b) 韵母是 ia(ㄧㄚ)、ian(ㄧㄢ)的各音节。

(c) 韵母是 ua(ㄨㄚ)、uai(ㄨㄞ)、uan(ㄨㄢ)的各音节。

(d) 韵母是 ei(ㄟ)、en(ㄣ)的各音节。

(e) 韵母是 ui(ㄨㄟ)、un(ㄨㄣ)的各音节。

(f) 韵母是 i(ㄧ)、in(ㄧㄣ)的各音节。

(g) 韵母是 i(ㄧ)、in(ㄧㄣ)、ie(ㄧㄝ)的各音节,但是这只限于上、去兩声和某些輕声。

(h) 韵母是 y(ㄩ)、yn(ㄩㄣ)的各音节。

(i) 韵母是 y(ㄩ)、yn(ㄩㄣ)、ye(ㄩㄝ)的各音节,但是这只限于上、去兩声。

(j) zhi(ㄓ)、zhen(ㄓㄣ)。

(k) chi(ㄔ)、chen(ㄔㄣ)。

(l) shi(ㄕ)、shen(ㄕㄣ)。

(m) ri(ㄖ)、ren(ㄖㄣ)。

过去有些同志認为下列各組音节儿化以后,也变得一样了,那是錯誤的,——至少在北京話里不这样。

(a) 韵母是 i(ㄧ)、in(ㄧㄣ)的各音节跟韵母是 ie(ㄧㄝ)的各音节。这里只說陰平、陽平兩声和某些輕声音节。例如,下面一組一組的都并不同音:

jer(ㄧㄝㄦ)靴掖ㄦ　　爷ㄦ
jir(ㄧㄦ)　便衣ㄦ　树陰ㄦ　姨ㄦ

dier(ㄉㄧㄝㄦ)碟ㄦ
dir(ㄉㄧㄦ)　笛ㄦ

tier(ㄊㄧㄝㄦ)鍋貼ㄦ
tir(ㄊㄧㄦ)　楼梯ㄦ

gier(ㄐㄧㄝㄦ)台阶ㄦ　　半截ㄦ
gir(ㄐㄧㄦ)　小鷄ㄦ　今ㄦ　着个急ㄦ

kier(ㄑㄧㄝㄦ)茄ㄦ
kir(ㄑㄧㄦ)　旗ㄦ

hier(ㄒㄧㄝㄦ)木楔ㄦ　　小鞋ㄦ
hir(ㄒㄧㄦ)　心ㄦ　老西ㄦ　涼席ㄦ

(b) 韵母是y(ㄩ)、yn(ㄩㄣ)的各音节跟韵母是ye(ㄩㄝ)的各音节。这里只說陰平、陽平兩声。例如，下面都是不同音的：

gyr(ㄐㄩㄦ)　金橘ㄦ
gyer(ㄐㄩㄝㄦ)木头橛ㄦ

kyr(ㄑㄩㄦ)　小蛆ㄦ
kyer(ㄑㄩㄝㄦ)耍缺ㄦ

(c) 韵母是ei(ㄟ)、en(ㄣ)的各音节，还有zi(ㄗ)、ci(ㄘ)、si(ㄙ)、zhi(ㄓ)、chi(ㄔ)、shi(ㄕ)、ri(ㄖ)跟韵母是e(ㄜ)的各音节。例如，下面每組都是不同音的：

ger(ㄍ(ㄝ)ㄦ)根ㄦ　哏ㄦ
gor(ㄍㄜㄦ)　歌ㄦ　格ㄦ

her(ㄏ(ㄝ)ㄦ)擦黑ㄦ
hor(ㄏㄜㄦ)　吃喝ㄦ

zer(ㄗ(ㄝ)ㄦ)大眼賊ㄦ(一种金魚、有时候指眼睛大的人)
zor(ㄗㄜㄦ)　色則ㄦ(不必要的囉嗦事情)

zher(ㄓ(ㄝ)ㄦ)姪ㄦ　紙ㄦ
zhor(ㄓㄜㄦ)　摺ㄦ　褶ㄦ

cher(ㄔ(ㄝ)ㄦ)吃ㄦ
chor(ㄔㄜㄦ)　車ㄦ

sher(ㄕ(ㄝ)ㄦ)打食ㄦ　出神ㄦ
shor(ㄕㄜㄦ)　咬舌ㄦ

rer(ㄖ(ㄝ)ㄦ)刀刃ㄦ
ror(ㄖㄜㄦ)　趁热ㄦ

另外，“二、案ㄦ”应当拼写成ar`(ㄚㄦ`)，是“把ㄦ、盼ㄦ、飯ㄦ、袋ㄦ、那ㄦ、爛ㄦ、盖ㄦ、菜ㄦ、这ㄦ、岔ㄦ、扇ㄦ”等的韵母，跟“兒、耳”并不同音，这也是听了北京人的念法就可以明白的事。不过我的調查結果指出，“二”字有一小部分人是念er`(“兒”的去声)的。

五

有一部分音节，北京人的發音，陰平、陽平跟上、去兩声不同。比如，韵母是ei(ㄟ)、ui(ㄨㄟ)、ou(ㄡ)、iu(ㄧㄡ)的非ㄦ化音节，念陰平、陽平的时候，口形比較紧；念上、去兩声的时候，口形比較松。这些音节的上声和去声如果音調变成陰平或陽平(参看第三节)，这陰平或陽平还保留了較松的口形，結果跟本来的陰平、陽平音节并不同音。例如：

“悔改”的“悔”(口形松)跟“往回改”的“回”(口形紧)，都是陽平調(hui´)，可是不同音。

“肥手”的“肥”(口形紧)跟“匪首”的“匪”(口形松)都是陽平調(fei´)，可是不同音。

对小孩ㄦ說話，“手手”的第二个“手”(口形松)和“收收”的“收”(口形紧)都念陰平調(shou¯)，可是不同音。

上面說过，北京人在叫人的时候，語音有的要起一些变化。“嫂子、聾子、小子”等的“子”在叫人的时候常常念zei¯(ㄗㄟ¯)。这个zei¯(ㄗㄟ¯)(口形松)的音跟“賊(zei´，ㄗㄟ´)”(口形紧)的音来比較，可以听出显著的不同来。

用某人以前說过的話反駁某人的时候，某人常說：“有dei¯，这ㄦ等着我哪！”京剧《玉堂春》里就有这句对白。这个“dei¯”(口形松)跟“逮”(dei¯口形紧)的音也有同样的差别。类似的例子还有許多。

以上这些發音上的差别，并沒有列在“非ㄦ化音节表”里，因为这些差别可以忽略，至少是沒有必要在拼音文字里表現出来。但是这样交代一下是有必要的。

其次，在ㄦ化音节里也有相似的情形。比如，韵母是er(ㄝㄦ)、uer(ㄨㄝㄦ)、our(ㄡㄦ)、iur

(ㄧㄡㄦ)的各音节；可是这些差别同样沒有什么重要性，所以“ㄦ化音节表”里沒有列进去。不过韵母是 ir(ㄧㄦ)、yr(ㄩㄦ)的各音节是值得注意的：这兩类音节的陰、陽兩声跟韵母是ier(ㄧㄝㄦ)和yer(ㄩㄝㄦ)的各音节幷不同音，但是在上、去兩声，它們会变得相同。

ir(ㄧㄦ)跟 ier(ㄧㄝㄦ)、yr(ㄩㄦ)跟 yer(ㄩㄝㄦ) 在陰、陽兩声保持着發音的差別，这在第四节已經举了一些例子說明了。这里再举一些說明它們在上、去兩声变得發音相同的例子：

玩艺ㄦ、脚印ㄦ、树叶ㄦ } ier`(ㄧㄝㄦ`)　壺底ㄦ、蝴蝶ㄦ } dierˇ(ㄉㄧㄝㄦˇ)　米粒ㄦ、干裂ㄦ } lier`(ㄌㄧㄝㄦ`)

初几ㄦ、姐ㄦ們 } gierˇ(ㄐㄧㄝㄦˇ)　四塊玉ㄦ、月月ㄦ } yer`(ㄩㄝㄦ`)　小女婿ㄦ、骨血ㄦ } hyer°(ㄒㄩㄝㄦ°)

这些發音上的异同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分別列在“ㄦ化音节表”里了。

同一音节，陰、陽兩声跟上、去兩声發音不同的情形，根据我的調查，是很显著的，这个規律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我的調查記录指出，个别的音节請个别的人念出来，有时候也有混乱。自自然然說話的跟想了一下咬准了念出来的音常常有一些出入。有这种情形：某一位在說話的时候这样地發音，但是当我請他再重复一遍的时候，就完全跟半分鐘以前不一样了。

六

上面我已經把我調查統計北京話里的音节所定的范圍、所用的原則、方法等等交代过了。絕大部分北京話的音节都列在“非ㄦ化音节表”和“ㄦ化音节表”里了。音节的数目見右附表。

			A类（不包括右面四类的）	B类（現代北京話里不說的）	C类（拟声的、語气的）	D类（拼合而成的，包括表外的11个）	E类（由其它声調的音节变来的）	共計（左面五类相加）
非ㄦ化音节	不分声調		409	2	19	11	—	441
	分声調	陰平	329	9	27	4	17	386
		陽平	257	11	11	3	101	383
		上声	317	17	5	5	—	344
		去声	353	16	19	8	—	396
		輕声	385	—	14	3	—	402
		共計	1641	53	76	23	118	1911
ㄦ化音节	不分声調		284	—	3	—	3	290
	分声調	陰平	185	—	13	—	16	214
		陽平	156	—	—	—	79	235
		上声	173	—	1	—	—	174
		去声	191	—	—	—	—	191
		輕声	176	—	2	—	—	178
		共計	881	—	16	—	95	992
非ㄦ化音节和ㄦ化音节不分	不分声調		693	2	22	11	3	731
	分声調	陰平	514	9	40	4	33	600
		陽平	413	11	11	3	180	618
		上声	490	17	6	5	—	518
		去声	544	16	19	8	—	587
		輕声	561	—	16	3	—	580
		共計	2522	53	92	23	213	2903

从这些統計数字可以看出来，即使按照过去的統計方法——不算輕声、不算ㄦ化音节、不算D类和E类的——北京話里也要有432个(不分声調)或1376个(分声調)音节。这个数字大大地超过了大家一向引用的。这說明过去的材料是不够完全的。

按照我个人很不成熟的看法，只要是北京話里清清楚楚說的、固定地在北京話里存在着的音节，都应当算作正式的音节。B类是不說的，它們的資格都应当取消。要是这样，根据我这份比过去完全一些而实际上还幷不太完全的統計，

北京話里的音节数目应当是729个(不分声調)或2350个(分声調)。自然,这里的个位数字是談不到正确的、沒有什么意义的；十位数字也只是作参考的近似值。我們說北京話里大約有730个(不分声調)或2800多个(分声調)音节比較恰当。

本文的更正和补充

非ㄦ化音节表

ban	般E板半拌
chua	CE抓顗抓
diau	刁 屌
gu	姑骨古固骨
ha	哈蛤哈哈哈
liau	撩聊了料料
nai	奶E奶奈奶
nyan	
nye	虐
rang	嚷瓤壤讓嚷
ri	日 日日
she	賒舌舍社捨
tung	通同統痛通
zhuan	專E轉賺轉

ㄦ化音节表

(chanr)	攙E饞顫攙
gangr	缸E崗杠杠
gungr	工E拱供訟
hiar	瞎匣 下下
hiur	休E宿袖袖
jaur	腰窑舀藥搖
kingr	清情請磬請
kiur	啾球 球
(ker)	科壳可客壳
kungr	空 空控
(kyanr)	圈 圈圈
liur	溜刘綹溜榴
mur	E母目目
niaur	CE鳥尿C
paur	泡袍跑泡泡
(pionr)	片 片片
piaur	漂瓢 票飄
shaur	梢杓少哨杓
(wair)	歪

对《江苏人怎样学習北京語音》的意見

編者按：本刊1956年6月号發表了張拱貴先生的《江苏人怎样学習北京語音》一文后，我們先后收到了高志用、徐鉄生兩同志对这篇文章提出意見的来信，现在把这些意見跟張拱貴先生的答复(見第48面)摘要刊載如下(原文标音符号沒有更动)。

一

(1)原文第三节說"江苏普遍有尖团音的分别",实际上苏北的如皋、海安、如东、南通一帶的方音跟北京音一样不分尖团音。

(2)原文第五节說"声母n、l不分是'下江官話'的特点",据調查,南通、如皋、如东等县跟北京一样能区分。

(3)原文第六节說"方言的ㄫ在北京音里一部分改为ㄋ、ㄖ、ㄦ、一部分改为ㄧ和ㄩ起头"。我們細查了这五类字，苏北方音跟北京音一样,只"仰"字例外。

(4)原文第七节說"不分ㄣ、ㄧㄣ和ㄥ、ㄧㄥ是江苏方言的一般情况",我們同意这种說法。应該請注意的是,"奔崩、盆朋、門蒙、分風"等組字在南通、如皋一帶都能分。

(5)ㄢ、ㄤ跟ㄧㄢ、ㄧㄝ兩組在如皋、泰县、海安、南通一帶也分得比較清楚。(高志用)

二

南通方音是否应划到江淮音系值得商榷。本来划分方言区的标准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为最重要是应該以古濁音声母的演变方式为依据。如果是这样的話，我想把南通方音拿来跟客家方音作比較或許更恰当些。因为同一音系內的方音之間，發音应該基本上接近，至少交談应該不發生太大困难。事实上說南通音系方言的人，不但听不懂揚州專区、鹽城專区、徐州專区的話，連南通專区內的方言都听不懂。因此，把南通方音划入江淮音系是否合适就需要考虑了。

如皋、海安的方音中沒有ti、thi兩音，分别变为tɕi、tɕhi,有点象俄文дз、тз的發音。

我認为泰兴并不把"徵、舌"等字念成tɕh、ɕ音,而是念成如俄文的ч、ш一样。

有一点还应該提到,就是講通东方音的一小部分人,会把在u、un、uaŋ、uan、ui、uo前的h讀成f或v,但是大部分人讀h或ɦ。如皋、如东、海安、泰兴、泰州等地方把xu一律讀成fu。

再就是，泰州方音不会把江南方音中的濁音讀成送气清音。

揚州并不把"然"讀成ㄌㄢ，而是讀成ㄧㄢ，宝应县則为ㄌㄧㄢ。

关于苏北方音讀ŋ的音沒有江南方音多的問題，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南通以ŋ开头的音就比上海或崇明方音为多。北京音的ai、au、ou、ən和陰平以外的ə，在南通音中都以ŋ为声母，还有ian、iŋ、iau、ia也是。而上海音中就沒有这么多,崇明比上海更少。

除少数地区外,苏北人中很难找到把ㄧㄢ讀ㄧㄝ的。

(徐鉄生)

北京話里的土詞和土音

徐 世 荣

普通話并不等于北京話，作为标准音的北京語音并不包括北京土音。这已經是明确肯定的了。

但是什么是土音，什么不是土音呢？这个問題却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透徹的。首先会使我們感覚二者之間不容易一刀兩斷地分出界限。有一部分北京土音，由历史决定，已具有全民性。在若干年前还是土音，但現在已取得了标准音的資格。而另一部分土音，在今日的"規范化"的要求之下，將和各地的土音一样，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內作为地方的語音而存在。

确定标准音的音节，是語音規范化的一个重要工作。这本来应当从大量詞彙中所表現的語音来归納研究。本文只是把一些北京土音的材料剖析一番，提出个人的一点淺見。一篇短文是划不清这个錯综复杂的語音界限的，但是"抛磚引玉"，希望大家也能注意一下这个問題。

北京的土詞、土語，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像把"看"叫"瞜"(lōu)，叫"瞅"(ɕǒu)；把"跑"叫"撓"(nāu)，叫"顚兒"(diār)；把"說"叫"聊"，叫"扯"；把"脚"叫"丫子"；把"头"叫"腦瓠"，叫"瓢兒"(piáur)；把"女孩子"叫"妞兒"(niūr)，叫"丫头"；形容"小"，說"一丁点兒"、"一丢丢兒"；把"粗大"叫"憨"(hān)，叫"奘"(ʐuǎŋ)。"稍微等一等"有人就說"撂(liàu)脖兒沉一沉兒"；"含笑打招呼"有人就說"遞嘻和兒"("和"念輕声)；"吵鬧不停"有人就說"翻滾不落(làu)架兒"。这些語、詞，很容易辨認。現在書面上——通行全国的書刊、报紙上都不使用这些材料。如果指出这是"土"的，大概沒有什么爭辯。

可是土音就复杂了。其中一部分伴隨土詞而存在的特別少見的音，也还容易确定。另外，有些音和普通話語音比起来，是依稀仿佛，似是而非的，所以有必要提出来討論討論，請大家鑒定一下。

現在就把我个人認为是土音的，分成下面几类，举些例子来談談：

（一）土詞里的特別音；

（二）混杂了的外地音；

（三）在个別語詞里的特殊音变；

（四）輕音节里的弱化音；

（五）其他稀有的語音現象。

本文注音主要使用《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拼音字母，必要时酌用国际音标。

（一）土詞里的特別音

既然已經肯定了是土詞，本可以不必提出来。但是为了使大家更認清北京土音的面目，知道北京人的語音中还有这些特别的音存在，不妨稍举几个例子。由这些例子具体地說明，北京語音音系一定要排斥这些东西。所謂"特別音"是很少見的音节（包括声調），例子本来很多，現在只举下面几个：

pǎi 1. 普遍的，所有的。如"pǎi 街的人都罵他"。2. 擠。如"鞋紧了，拿脚 pǎi 一 pǎi 就好了"。

dei 1. 捉。如"dei 耗子"（捕鼠）也念 děi。2. 投中，如"一磚头正 dei 在腦袋上"。

dèn 有人写作"揼"，突然一扯。如"揼他的袖子"。

gái "gáilòu"，就是貪婪地搜括，搶取。如"不論好坏全gáilòu到自己家里"。也說貪吃，如"凉的熱的胡 gáilòu"。

kei 罵人的話，打、揍的意思。

ɕuǎ 抓取。如"ɕuǎ 子兒"，是一种兒童游戏，抓取小石子，拋起，接住。玩时也說 ɕuǎ，如"你先ɕuǎ 兩把"。

ɕuái 有写成"膗"的。肥胖，如說"身体發膗"。

rou 大風卷揚。如"rou 起了北風"。

cèi 打碎。如"把瓶子 cèi 了"。

类似这些音，無疑是土音。它們永远在土詞里出現，而且也就限于在一兩个土詞里使用，并不能用这些音节構成許多土詞。这决不是北京音系里的东西。

（二）混杂了的外地音

有些特别的念法，北京地方本来沒有，是受外来語音的影响而变化的。使用久了，北京人也不覺得了。例如：

"石竹"，一种草花，北京人叫它 ɕíʐoùz，"竹"念 ʐòu，是摹仿了別地的入声。

"木魚兒"，乐器，僧人多用。北京人叫它 mòyér，mò是摹仿了別地的入声。

"工尺字"，旧时音乐乐譜所用的音符。北京人把"尺"念ɕè，摹仿了別地的入声。

"黑豆"的"黑"，一般北京人都把陰平变上声。

"侵略"的"侵"，一部分北京人把陰平变上声。

"室"，有一部分人把去声变上声。

"布衫兒"的"衫兒"，有一部分人把陰平变上声。

"苍子"（苍耳，一种植物）的"苍"，一般北京人都把陰平变上声。

"疏忽"的"疏","約束"的"束","数珠"(僧人等念佛用的)的"数",很多人把 ʂu 变成不同声調的 su。

"择"在"选择"里念 zé,但在"择韭菜""择毛兒"等語詞里所有北京人都念 zái。

"样册兒"(夾刺綉花样子的本子)"册子"(說評書的底本)"册"念 ç̌ǎi。

"橙子"的"橙",ç̌éŋ 变 ç̌én。

以上这些变化,和外地音的影响有关。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語音变化趋势,就是有一部分北京人——特别是妇女,喜欢把 ɥ、q、x 一律都改念 z、c、s。这是受外地"尖音"的影响。但是把外地人也不讀"尖音"的"家、下、界、鉛、輕、希"等字也都念成"尖音",非常混乱。可以把它叫做"新土音"。

这一部分姑且举这几个例。按北京音系严格講求,这一类的混乱是要澄清的。

(三) 在个别語詞里的特殊音变

所謂"特殊",就是还不明白它的变化目的,暂时还找不出它的規律。这种变化在北京土音里特别多。可以分从声母、韵母、声調三方面来說。其中可能也有是受外地語音影响而变的,但一时来不及詳考;也許有是保存古音的,虽然"于古有征",但在現代北京音系中很希見,所以也把它算作非規范的土音。

(1) 声母

甲、不送气变送气

显摆(眩耀,卖弄。"摆" bǎi 变 pǎi)
摆譜兒(奢侈,講排場。pǎipǔr)
袼褙(碎布裱成,制鞋等用。"褙" bèi 变 pèi)
荷包(包 bau 变 pau)
同胞(胞 bau 变 pau) 打扮(扮 bàn 变 pàn)
板凳(凳 dèŋ 变 tèŋ)
熨斗(斗 dǒu 变 tǒu)
蝴蝶兒(蝶兒 diér 变 tiěr)
頂(如"頂好",dǐŋ 变 tǐŋ,也写作"挺")
耳朵(朵 duǒ 变 tuǒ)
簸箕(箕 ɥi 变 qi 輕声) 伙計(計 ɥì 变 qi 輕声)
借光(借 ɥiè 变 qiè)
抽皺(皺 ʐòu 变 ç̌òu)
撞(ʐuàŋ 变 ç̌uàŋ)

乙、送气变不送气

琵琶、枇杷(琶、杷 pá 变 bá)
提溜(提 tí 变 di) 胡塗(塗 tú 变 dú)

丙、其他变化

恐怕(恐kǔŋ 变 pěŋ)
折(ʐ́ó 变 ʂ́ó)
脊梁(梁 liáŋ变 niáŋ)
鑰匙(匙 ç̌í 变 ʂi)
一堆(堆 dui 变 zui)

(2) 韻母

甲、介音变化

(a) i 变 y, y 变 i

雨淋(淋 lín 变 lýn)
陷坑(陷 xiàn 变 xyàn)
些微(些 xie 变 xye)
胆怯(怯 qiè 变 qyè)
监起来(囚禁,监 ɥian 变 ɥyan)
不兴(不允許,兴 xiŋ 变 xyŋ)
尋东西("尋"是索要的意思,不出代价。xýn 变 xín)

(b) u 消失,或增 u

出乱子(乱 luàn 变 làn)
不打頓兒(赶快应对,不迟疑。頓兒 duèr 变 dèr)
豁出去了(舍掉,不顾一切,豁 huo 变 ho)
豁亮(敞亮,豁 huò 变 hè)
悶的慌、累的慌(慌 huàŋ 变 hàŋ 再弱化变 hèŋ)
横兒縱兒(如"你别跟我横兒縱兒的",意思是不服从。縱 zùŋ 变 zèŋ)
搖撼(撼 hàn 变 huàn)

乙、尾音变化

(a) n 变 ŋ、ŋ 变 n

茧子(手足厚皮。ɥiǎn 变 ɥiǎŋ)
囟腦門兒(囟門,囟 xìn 变 xiŋ)
天津(津 ɥin 变 ɥiŋ)
亲家(姻戚,亲 qīn 变 qìŋ)
往北走(往 wǎŋ 变 wàn)

(b) 增减尾音

告訴(訴 sù 变 sùŋ)
多么(么 mé 变 mén)
轟雷閃电(轟 huŋ 变 hu)

(c) 变元音及其他

避雨(避 bì 变 bèi)
理会(理 lǐ 变 lǐ)
胳肢窩(腋下,胳 ge 变 ga),
候脉(候 hòu 变 hàu)
絡子(一种網子)挂絡兒(罣誤,如說"吃挂絡兒",絡 luò 变 làu)
油餜(炸的油条,餜 guǒ 变 guǐ)
大伯子(丈夫之兄,伯 bó变 bǎi)
得苦子(自找其苦,得 dé 变 dǎi)
烙鉄(熨斗,鉄 tiě 变 těi)
后閣,呂祖閣(閣为庙中供神的楼。gé 变 gǎu)
这兒(ʐèr 变 ʐàr)
那么(nàmė 变 nèmė)

(3) 声調

甲、陰平声的变化

变陽平:拉 lá("拉拉",液体拖着流下来或东西連連不断的遺落。如說"油滚拉拉一地","車上的碎煤拉拉一

地"。"拉口子",割破)。拘 ɥý ("拘着",作客,面对生人,拘束,謹守禮貌)。鉤 góu ("鉤着""鉤鉤着",弯曲的样子。如說"鼻子鉤鉤着")。

变上聲: 劈 pǐ ("劈柴",劈成小塊的柴。和一般"用大力撕裂的"劈" pī 的意思不同,它仍然是用刀斧来"劈"pī 开的)。光 guǎŋ (只,仅,如說"不光这一样")。遮 ʐě (掩蓋。如"遮說",用謊言掩飾。"酸能遮辣",用酸味減除辣味)。中 ʐǔŋ ("人中",鼻下唇上部分)。

变去聲: 噴 pèn ("噴香""噴鼻兒香",極香)。發 fà ("發生",旧社会說人發財或做官)。通 tùŋ ("通紅",極紅。"吵了一通兒",一通兒就是一回)。分 fèn (如說"一盆花能分几盆","蚕子分出小蚕来")。夾 ɥià ("夾生",不完全熟。"夾竹桃",一种花)。刷 ʂuà (选擇,如"刷出好的来"。"刷白",形容臉色难看)。窪 wà ("窪心兒",凹。"窪心臉兒",一种面型)。弯 wàn ("拐弯兒" guǎiwàr)。

乙、陽平声的变化

变陰平: 訣 ɥye ("訣竅兒",竅門兒)。余 y ("多余",不必要的,如說"說这話簡直是多余")。

变上聲: 排 pǎi ("排子車",一种平板車。"地里排子",鼹鼠的俗名。"排子"指一种矮或扁的东西)。芦 lǔ ("油葫芦"是一种类似蟋蟀的鳴虫)。前 qiǎn ("跟前兒",面前,切近的地方)。錢 qiǎn ("榆錢兒")。

变去聲: 別 biè ("別管你怎么說,我也不答应")。蝴 hù ("蝴蝶兒")。軸 ʐòu ("压軸子",京戏的最后一出。"一軸兒綫","綫軸兒","軸兒"是繞綫的一段圓木)。沉 ȿèn ("沉底")。如 rù ("你不如他")。瓷 ɕì ("瓷瓦兒",小的碎瓷兒)。

丙、上声的变化

变陰平: 譜 pu ("擺譜兒",講外表排場,奢侈)。梃 tiŋ ("树梃兒",树干)。谷 gu ("谷雨",节气名)。海 hai("人可海了",形容多)。脚 ɥiau ("脚手",建筑用的木架)。雀 qiau("雀子",就是雀班)。指 ʐi ("指甲")。吵 ȿau ("吵嚷")。影 jiŋ ("沒影兒了",看不見了)。

变陽平: 骨 gú ("骨头","骨立"是硬挺的意思,如說"这張紙骨立")。脊 ɥí ("脊梁",指脊背)。矯 ɥiáu ("矯情",狡辯,不講理)。指 ʐí ("手指头")。索 suó ("索性")。

变去聲: 笔 bì("笔直")。鉄 tiè ("鉄雀兒" tiè qiǎur,煎炸加醬汁的麻雀)。擰 nìŋ (坚持己見。如"擰脾气","又犯起擰勁来了")。甲 ɥià ("甲魚")。雪 xyè ("雪白","紫雪",一种菜)。扫 sàu ("扫帚","扫兴")。往 wàŋ (往东,往南)。瓦 wà ("瓦刀")。

丁、去声的变化

变陰平: 定 diŋ("定規",如說 "把日子定規好了")。刻 ke ("刻" 字)。过 guo ("过分",指責人享受或浪費、奢侈太过,如說"这个人用牛奶洗臉,太过分了","过余",过多,不必要。如說"小心無过余")。謝 xie ("謝頂",老人頂上的头髮脫落)。作 zuo ("作揖","自作自受","作精搗怪","这孩子胡吃胡喝,又'作'病哪")。

变陽平: 个 gé ("眞个的",眞实的。如說 "別說这些沒用的話,咱們說眞个的吧!" "眞个的,你昨天为什么走了")。繞 ráu ("繞世界乱跑",就是滿处乱跑)。作 zuó ("作踐")。

变上聲: 壁 bǐ ("隔壁兒" ɥièbiěr,鄰舍。"貼糯餑壁兒")。篾 miě ("細篾兒" xìmiěr,細小的竹、草棍)。嵌 qiǎn ("狐嵌" 一种作衣服用的狐皮,手工补綴小塊狐皮而成)。道 dǎu ("过道兒",住宅的門道或能穿过的路)。个 gě ("自己个兒")。入 rǔ (插入,放进。如說 "把手入到褲兜兒里","写一个紙条,順門縫入进去")。意 jǐ ("得意",生活好轉,工作順利。如說"現在他很得意")。

按声調变化的例子来看,入声字特别多。入声字在北京語音里分別归并到陰、陽、上、去四声里,一般說来,这些單"字"的声調是稳定的。但是在一些个別的語詞里又呈現了不稳定的情况。这是頗可研究的。但因为这些变調畢竟还是少数,只出現在一二个詞里,一般使用的还都有固定的声調。所以也把它們列为特殊音变。

(4) 全变

比(bǐ 变 pǐŋ,如說"这个比那个強")。僻靜(僻 pì 变 bèi)。鼻涕(涕 tì 变 diŋ)。隔断,隔扇,隔子(隔 gé 变 ɥié),隔壁兒(隔 gé 变 ɥiè)。自己(自 zì 变 ɥì)。苦蕒菜(苦kǔ 变 qy̌)。仄歪(將要歪倒,仄 zè 变 ʐai)。扫(sǎu 变 ʂǒu,特指用土木屑等扫溼粘的东西,如說"用爐灰把吐出来的东西扫一扫)。这么(这 ʐè 变 zèn)。

(四) 輕音节里的弱化音

"弱化音" 本是和 "輕声" 連帶而生的一种音变現象。但是北京語音的輕声有时輕得过甚,影响音素,發生变化。有的把声母輔音改变,甚至丟掉。例如:

"当中間兒" 的 "中" ʐuŋ 变成 ʂėŋ,"点心鋪"的"心" xin 变成[ɤin],"底下"的"下" xiȧ 变成 [ɤia],"西紅柿"的"紅" hùŋ 变成[ɤuŋ],"鬧市口"的"市" ʂi 变成[ʅ],"隆福寺"的"福" fù变成[u]。这种由輕声弱化到口齿不清,当然是地道的土音,是不要学習的。

有的把"介音" i 丟掉。例如:

"赶面杖" 变成 gǎnmȧn ʐȧŋ,"眼面前兒" (眼前的,普通的) 变成 jǎn mȧn qiár,"提溜" diliù 变 dilȯu,这也是弱化到口齿不清。这种土音都是容易肯定的。

更有的把韵母丟掉。例如:"咱們"、"你們"、"他們"、"我們"的"們"只剩下 m 的音,成为 zám, nǐm, tam, wǒm。"怎么、"什么"、"这么"、"那么"、"多么"的"么"也只剩下 m,成为 zěm, ʂém, ʐèm, nàm, duóm,"多少"(如說"多少錢?")的"少" ʂǎu 变 ʂ,再变得像 r (有人就写成"多兒")。"横豎" (如說"横豎走不了")的"豎" ʂù 变 ʂ,稍重些,成了 ʂɪ (有人就写成"横是"),这都是弱化过甚,可以不这样輕念。

另外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元音弱化現象,从輕声發音的理論来講,是講得过去的,它的規律是很清楚的。

下面列一个表:

	原韵母	弱化	举例(每个詞第二字讀輕声,元音弱化)
[开]	[A]	[ə]	尾巴 芝麻 头髮 澄沙
	[o]	[ɔ]	蘿卜 餑餑 約摸
	[ɤ]	[ə]	功課 甘蔗
	[u]	[ə]	包袱 豆腐 姐夫 找补(一部分变)
	[y]	[i]	出去 (一部分变)
	[ʅ]	[ə]	隔肢(触痒) 玉石([例]玉石眼的馬)(一部分变)
	[ɿ]	[ə]	兒子 椅子 茅厠(sə)螺絲
	[ai]	[ei]	买卖 出来 打开 利害
	[ɑu]	[ɔʊ]	眉毛 櫻桃 功劳 灯草
	[ou]	[əʊ]	拳头 咳嗽 牌楼 条帚
	[an]	[ən]	算盤 麻煩 牡丹 舒坦
	[ɑŋ]	[eŋ]	街坊 稳当 房上 米湯
[齐]	[ia]	[iɛ]	人家 放下 指甲 庄稼(大部分变)
	[iɑu]	[iɔu]	漂摇 材料 脊梁 犄角
	[iou]	[iəu]	朋友 彆扭 滑溜 泥鳅
	[iɛn]	[iən]	去年 看見 打点 新鮮
	[iɑŋ]	[iəŋ]	姑娘 清凉 方向 痒痒
	[iŋ]	[iəŋ]	聰明 机伶 蒼蠅 星星
[合]	[ua]	[uə]	棉花 黄瓜 光滑 軟化
	[uo]	[oʊ]	寬綽 調唆 駱駝 拾掇(一部分变)
	[uai]	[uəi]	凉快 妖怪 乖乖
	[uan]	[uən]	喜欢 計算 習慣 叫喚
	[uɑŋ]	[uəŋ]	来往 痔瘡 兴旺 飢荒
[撮]	[yan]	[yən]	長远 埋怨 团圓 家眷
	[yn]	[yən]	均匀 教訓 圍裙
	[yuŋ]	[yəŋ	英雄 心胸 費用

这种弱化,各地人学習起来不易。第一,輕音节很輕,才能引起这种現象。这样輕的程度,各地人学習起来較难。第二,牽动音素,虽然有規律——高元音、低元音弱化后傾向中央元音、多数变成[ə];圓唇变不圓唇,但是变化太复杂,各地人学習不好掌握。这种过分的輕弱,我以为也可以算做北京土音。

(五)其他稀有的語音現象

另外还有一种串連拼合的現象,兩个鄰近音节拼合后丢掉中間一些音素。例如:"甭"béŋ(是由"不用"兩个音节拼合的,如說:"甭去了"),还有念成 bíŋ 的。"是不是啊?""是啊"兩个音节拼合成 ʂa。"四个"合成 sè,"五个"合成 wŏ。"六个"变 liù wò。"九个"变 ɥiŭ wò,"二十个","三十个"合成 èrʂè, sanʂè,"兒子","老爷子"的"子",有念 za 的,有念 zei 的,是和"啊""嘿"等語气詞拼合的。这也要置于土音之列。

"言語"变成 yánji(如說"要吃什么,請你言語!"),是一种韵母交替的音变現象。"埋怨"变成 mányàn,是一种"远同化""逆同化"的音变現象。虽然在發音的理論上能够解釋,但是竟究不可以使它成为規范的語音。

"兒化韵"是北京語音中常用的,現在我們已經肯定它在語言中能起分辨語意、詞性的作用,是有用的东西,在普通話标准音里可以有这样的音节,所以不能算是土音。

我覺得上面所談到的几大类,都可以算是北京土音。虽然里面包括着一部分音变現象,但这些音变現象,还不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更普通的一些音变現象,如"关門"嘴里变成 guāmmén,"散开"口里变成 sàŋkāi,"喇叭"的 b 变濁音,"我的"的 d 变濁音,"美滿""雨伞"等(兩个上声音节相連)前一个上声变陽平;"好心""老实"等(上声与非上声音节相連)的前一个上声变"半上","慢慢兒""快快兒"的叠字形容詞后一字变陰平声等,是北京語音中的一般規律,不能算是土音。

談到最后,我以为要划清标准音和北京土音的界限,便于大家学習,应該确定一个标准音的"音节(包括声調)表"。这样的表,过去虽然有过,但是并不一定合乎現在所提出来的語音規范,可以再重新修訂一下。另外,就是編定一个标准音的"常用詞表",把一些日常用詞的标准音讀确定下来。比如前面举例中的"手指头"(ʂŏu zí tòu),就有人主張在这个詞里仍保持"指"zí 的音,并不一定改为 zĭ。像这一类的問題是要好好研究,快些决定的。

在解决这种問題的时候,我想提出一个淺薄的主張,就是:稀見的音节,特殊的变化,能不保留就不保留;顧到普通話的推广——确实推得广,顧到全国人民的学習——确实学得会,最好使我們的标准音大方一点。

勘誤表

月号	面	欄	行	誤	正
1	11	右	倒14	抽能回	能抽回
1	12	右	7	ʂ、ɕ、ʒ	ʐ、ɕ、ʒ
1	15	右	22	v(丂)	v(万)
1	27	左	倒9	初樂	初叶
1	41	左	12	經济科学	教育科学
2	28	右	10	又支脂虞	又支脂魚虞
2	28	右	12	"仙先"的反切下字	"仙先"的反切上字
2	30	左	1	首卷	起头
2	33	右	9	3426	3406
2	35	右	4—9	垻	垻
2	36	左	12	溫州	溫嶺

更正:1957年2月号32面左欄25行"部"应为"大都",又36面左欄14行[p'ɔʾ]应为[pɔʾ]。

对昆曲語音規范的体会

白云生

語言是戏曲的主要組成部分。戏曲講究唱、念、做、打，这概括了音乐、語言、舞蹈、身段、表演等艺术，可是把唱、念放在第一位。唱、念被称为"肉音乐"，内行所說的"千斤話白四兩唱"，虽然对念白有些夸張，但是有道理。唱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念白沒有音乐，要在字音气氛和疾徐輕重上念起来能够感动人。要能感动人就得首先叫人听得懂。当然，唱也不例外，要講字眼清楚。比如，福建梨园戏来到北京彙报演出时，如果不打字幕，恐怕观众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看看表情和动作。

我国的剧种很多，每个剧种的語言又是以当地方言为基础的。方言分歧是我国历史上处于交通不便和政治經济非常落后的狀态下造成的。現在我們在政治、經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有了空前的發展，人民的生活和社会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因此作为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戏曲所用的語言，也不能再停留在原有的狀态中，应該根据新的要求逐漸提高和改进。

我是一个戏曲工作者，几十年来戏曲中的語言問題使我感到困难和痛苦。我早年做昆曲演員时曾因唱不好南曲的入声字而煩惱。所以現在从昆曲語音的規范方面来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昆曲是我国历史傳統上的一个古老剧种，曾風行全国几百年，至今大多数的剧种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四川川昆、湖南湘昆、广东粤剧、山西梆子、上党梆子(有昆曲«長生殿»)、汉剧、楚剧，尤其是京剧所受的影响最深。按說昆曲唱念的語言各地应該統一，但是自南宋、金、元以来，咱們的戏曲就形成了南北兩派。并不是北方人唱的就一定是北曲，南方人唱的就一定是南曲，南方北方的演員都可以兼唱南北曲。昆曲剧本繼承这个历史傳統，也是南北曲兼用，演員不能把它單独分开来演唱。

大家都知道，昆曲有这么一段来源：

明嘉靖年間，昆山人魏良輔曾拜北方的王友山学北曲，但是由于語言的困难而被辞退。魏良輔回到家里，刻苦鑽研，在南北曲的基础上吸收弋陽腔、海鹽腔、余姚調、迓鼓調、山歌等創造了昆腔。在乐器腔調板眼方面都有所改革。在唱、念的語言上，北曲宗中州韵，南曲宗«洪武正韵»。从此在戏曲中的語言，南北兩大地区有了初步的規模。但是南北曲在音乐、唱、念、語言方面仍有严格的区别：在語言方面如"落"和"乐"，北曲念 lau，南曲念 lo；音乐的"乐"，北曲念 jau，南曲念 ye；"玉"和"欲"，北曲念 y，南曲念 ye；"觉"和"脚"，北曲念 giau，南曲念 gye；"国"字，北曲念 guei，南曲念 guo；"柏"和"白"，北曲念 bai，南曲念 bo；"宿"字北曲念 xiu，有时也念 xy，南曲念 su；"曲"字，北曲念 qy，南曲念 qye；"芍藥"，北曲念 shaujau，南曲念 suoye；"德"字北曲念 de；"賊"字，南曲念 ze；"肉"字，南曲念 ru，北曲念 rou 去声；不必列举。

昆曲在唱、念、語言、字音上既有这样复杂的区别，作为一个昆曲演員，就得下苦工夫去鑽研。1935 年，我在南京演出时，我曾向吳梅教授請教南曲唱、念、字音的运用方法，怎样才能同南方人唱的南曲字音一样。当时他回答說："將来懂国語（北方語）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現在大公司的售貨員都要会国語，学校更是用国語講課；因此唱南曲不必一定全和南方語音一样，只要把南曲的入声字掌握'出字必断'就可以了。元代沈和創造了南北合套，魏良輔也承襲了这个方法，这都是对的。«長生殿»中'小宴惊变'、«白蛇傳»中'水斗'，都是一支南曲緊接一支北曲，像这种南北合套的戏，完全可以按北方字音唱，知音者也不能說是錯誤。这說明昆曲唱法能够改革，必須用一种大江南北都听得懂的語言来唱、念。現在你們北方的昆曲班社能在南方各大都市演唱二年之久，就証明南方人是听得懂的。"我听了这話，得到很大的啓發。后来我在昆曲中所用的語言再不受南北严格区别的拘束，并且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戏曲唱、念是傳达感情的，主要是使人听懂听清，因此随着剧情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在語彙上作了适当的改动。如«風箏誤»中"惊丑"一出，丑小姐出場用的苏白："那歇辰光还勿見来拉介？"有的北方人听了就笑，以为是中国人說外国話。我們在苏州演出时，演員刘福芳扮演丑小姐，念这句苏白时，台下观众也笑。因为他是北方人，念苏白不好听；可是我就把这句話改成北京話来念："呎，什么时候还不見来呀？"結果使南北的听众都听懂了。"山門"的酒保念苏白，我以为更不合理。"山門"是北曲，为什么不用北方話来念呢？論故事地点是五台山，也不当用苏白。为此我曾請教吳梅教授，他說："山門"是«虎囊彈»里的一出，作者丘园是吳县人，可能他不了解北方語言而用苏白，这是不合昆曲規律的。曲論之类的書里有不少批判这种写作方法的，甚至花臉戏

也有用苏白，不但不合南北曲的規律，而且也損坏剧中人的性格、气概。«曲藻»說："在造語方面用天下通語"，就指全国人都能了解的語言。李笠翁在«閑情偶寄»里也說："在写作曲詞慎用上声，少塡入韵，少用方言…。"

以上这些，就說明过去的剧作家都要求在戏曲語言上要尽量使广大地区群众听得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向我就大胆地在昆曲念、唱中多用北方話。（可是，戏剧界中有人不贊成我这样做，甚至有的人諷刺我，給我起外号叫"白大胆"、"伏地聖人"。）所得到的效果在大江南北都很好。这里可以举一个有力的証明：浙江昆苏剧团来北京演«十五貫»，不但轟动首都，而且轟动全国。在头兩場演出，观众并不太多，因为有些北方人向来認为昆曲詞深，不容易听懂，以为又是南方人演唱，一定更听不懂。可是实际演出結果并不是以前那种唱念法，語言是大部分接近北方的，詞句又改为淺近文言，一般人都听得懂。王傳淞同志演"婁阿鼠"，一向用苏白，这次也改得向北方話接近，因此在"测字"一場，"婁阿鼠"的念白就沒有用字幕。

这次昆苏剧团演出的所以成功，不但是由于剧本改得好，演員的艺术好，也由于在語言改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剧中查出賭具时的"骰子"的"骰"字，南方人念 douz，这样念法北方人本不好懂，再念成入声，出音短促更听不懂了。因为北方人是念 shǎiz，讀上声，南方人起初改变，很难掌握，但是因为我和他們是老朋友，經常給他們講北方話口型的用力和舌头的运用，他們改得都很快。南方的戏曲演員，因为他們有唱、念的功夫，所以学北方話很容易。

我还有一个感覺，各地方戏的名演員的唱、念，大部分詞句都听得懂，就是因为他們用的語言已經跟他們的方言有了不同，已經有了戏詞学的韵白做基础。我問过他們，他們說是凡演历史剧都是用大韵白即中州韵。在戏曲語言統一方面，中州韵已經給我們作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們是有条件进行改革的。不过在改的时候要愼重，使文义和音韵調和，不生硬，合乎風格。还有許多字音要講究，如："暴露"念 pulu，"滑稽"念 gugi，"駕盟"念 yanming，"日西斜"念 rixixia，"臉"念 gian 等。这些念法是对的，可是只能作为学术問題来研究，如果用在演出上，是会脫离群众的。当然我們不反对講究，可是講究要根据客观环境和需要。

尖团字的作用是帮助字音清晰和随着情节气氛增加力量的表現，許多方言在尖团音上有分歧。如："三山"念成 sansan；"似是"念成 sisi 等，这就使人听不清楚。分清尖团，在戏曲的唱、念上很重要。所以在旧社会里，演員如果念錯尖团音，观众就会喊倒好。我的看法是，可以灵活运用，如：«西廂記»里的秦、晉，想、像，都是兩个尖音字相連，必須把一个字改念团音，这样旣有力，又好听、好念。

上面談的是戏曲語言規范化的必要。可是有人对于这一点發生怀疑，認为这样改了是不是会失去了某些剧种的風格。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評剧以前用河北唐山一帶的方言，現在用京韵；李桂云的河北梆子也用京韵，并沒有人感覺到这个剧种的風格变了，而在唱、念的艺术上更有显著的提高。还有人顧虑到：戏曲唱、念如果完全規范化，用北京标准音，可能在表現剧中人物性格和情节气氛上有些字音要發生困难。我以为这是不能免的，但是只要演員掌握了語言上的技巧，这些困难是可以逐步克服的。戏曲上的語言与現实生活不同，可以随人物性格和环境情节發展的需要而变化，例如："呀"字是陰平声，可以按不同的情节念成不同的四声：戏中"郊外一游，呀，好天气也"，"呀"字音舒長，有喜悅之意，平声；如听妻子被人搶去时的"呀"字声猛烈而短，含怒意，这个"呀"字就讀上声；如听說不学無术之徒得第，"呀"字声銳而揚，含不滿之意，讀为去声；如营中失火，乘船遇風，行路遇雨时的"呀"字声短促有惊駭意，讀为入声。在唱、念中可以有兩个上声字相連。如果三个上声字相連，就不好念，須要一改二頓，如："武松打虎"中獵戶說："你怎样將猛虎打死？""猛"字改念 mèng，"虎"字頓住，再連着念"打死"。如"豈有此理"是四个上声字相連，須改为"其又此理"。但有的演員將"走遭"念成"走走"，"走去"念成"走气"，"老夫"念成"老父"，这样是將字念倒了，是不对的。

字的归韵，如«長生殿»"小宴惊变"中，唐明皇唱北石榴花："不劳恁玉纖纖高捧礼仪繁。""纖纖"二字按音韵学是閉口音。但唐明皇帶着髯口，連着張口閉口，髯口就容易掉了，用手扶又破坏剧情表演，就得用舌抵上顎收音归韵。舞台上的艺术要随着客观环境而灵活运用，但是也应該从發展看問題，服从大道理。

«汉語知識講話»將陆續出版

上海新知識出版社現开始出版«汉語知識講話»。这是一套比較有系統的汉語知識的参考讀物。这套小叢書是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級中学課本«汉語»选題的，分为緒論、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詞六个部分。緒論部分有«語言»、«汉語»（以上兩册已出）、«文字»等五种；語音部分有«發音基础知識»、«方音辨正»等四种；文字部分有«汉字»（已出）、«汉字改革»兩种；詞匯部分有«普通話詞义»（已出）、«普通話詞匯»等四种；語法部分有«詞类区分»、«句子»、«联合詞組和联合复句»、«偏正复句»、«紧縮句»、«長句分析»、«标点符号»等二十二种。除修詞部分种数和書名还未确定外，共計有37种，將在今、明兩年內陆續出版。

这套«汉語知識講話»是供給中学汉語教师和一般讀者閱讀的，国內著名語言学者多人参加了这套叢書的編著工作。

怎样正确地認識同音詞問題

張世祿

同音詞的問題，不是拼音文字里的問題，而是語言本身的問題；它也不是汉語里的一个特殊的問題，而是一般語言里的一个普遍性的問題。这是在原則上首先应該肯定的。

本刊1956年11月号載有刘冠群先生的《論同音詞》一文，我讀了之后，認为他的如下的一段話是不正确的：

> 某些同音詞由汉字書写是可以从字形上分辨的，而在拼音文字里就看不出不同了。这是現实，那怕这种情形不多，我們也必須正視它。拼音文字比汉字优越得多，我們当然要拥护。正因为如此，我們要更好地研究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中如何解决。不正視和不重視这一問題，一口咬定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中并不比在方塊字中多，这不仅不能說服反对拼音化的人，并且会使人忽視同音詞的研究，增加拼音化的阻力，那就是本欲爱之，实則害之了。(22頁)

刘先生想"要更好地研究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中如何解决"，我却認为同音詞問題根本不应該在拼音文字中去求解决。因为拼音文字的功用，是在代表語言，記录語言，不是为了給語言做注解。要給語言做注解，还是要由語言自己来做，不是拼音文字所能为力的。如果一定要用拼音文字的字形来区别同音詞，那势必至于使这种文字回复到表意文字的范圍里去，势必至于使它丧失了一些拼音文字的性質和作用。想要在拼音文字中去区别同音詞，那是倒退的想法，不是前进的想法，那是眞正地"增加拼音化的阻力"，"本欲爱之，实則害之了"。

刘先生的文章，在同一頁里說："同音詞是任何一种語言都有的普遍現象，不單是汉語如此。"又說："同音詞的产生是任何一种語言都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这才是眞正的現实。我們旣然認定了这样的現实，那末为什么不想一想一般拼音文字当中是怎样来对待同音詞問題的呢？就我所知，一般拼音文字里，总是認为同音的"同形詞"(例如俄語里表示"鐮刀"、"辮子"、"砂灘嘴"三个不同意义的同音詞，書写形式同是коса；英語里表示"好"和"井"兩个意义的同音詞，書写形式同是well等)沒有在写法上区别的必要，倒是对于那些同音而不同字形的，(例如英語的no和know，write和right等)認为是一种不合理的事情，应該成为"拼法改革"的一种对象。一般拼音文字里，那些同音詞而不同字形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于实际語音和文字的書写形式兩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結果。一般拼音文字当中所謂"拼法改革"，就是要想把这些历史上形成的語音和文字形式不一致的現象糾正一下。我們現在进行文字改革，初次拟定拼音文字的时候，更不应該想要利用字形来区别同音詞，来故意地造出語音和文字形式不一致的現象。

我們說同音詞問題不应該在拼音文字中去求解决，并不是"不正視和不重視这一問題"。这一問題是語言本身上的問題，应該从語言本身当中去自然地获得解决。几年前，陈文彬先生在本刊發表过一篇《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的初步研究》①，他的初步整理的結果，"北京普通話"里，"在2,196个同音同調詞中被認为应加区别的只有246个詞"。他又說："我們再进一步，曾經把这246个詞征求过一些語文工作者的意見，請他們具体判定其中必須区别和不必区别的詞。我們所得到的結果，被判定为必須区别的，仅有二十多个詞而已。"如果仅仅为了几十个到二百多个这样少数的認为必須区别的同音詞，就要在拼音文字里定出一套特別写法的原則和系統，那末正像陈先生当时所說，如分尖团，或利用广东、福建等方言中还保留着的韵尾輔音m、p、t、k或重叠韵母的办法…，那簡直是自找麻煩，不但無此必要，而且根据过去的經驗，可以断定是行不通的。所以同音詞問題必須要从語言本身上去自然地获得解决。

一般語言对于同音詞的区别的問題，主要是从語言环境当中自然地得到解决。在口头談話当中，有了特定的情景来帮助相互了解的，这里可以不討論。我們来討論書面語里的情况，上下文以及詞和詞之間的配搭关系，是書面語里区别同音詞的重要因素。刘先生的文章，在同一頁里举出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論》里的兩个例子：

> "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实現人民权力…"(《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版，659頁)。
>
> "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上書，646頁)。

刘先生說是这里的"权力"很容易跟"权利"相混，这里的"形式"也很容易跟"形势"相混，就用这兩个例

---

① 《中国語文》1953年2月号，7—10頁

子来証明“某些同音詞由汉字書写是可以从字形上分辨的，而在拼音文字里就看不出不同了”。其实，“权利”不会和“实現”这个动詞相配搭，只有和“获得”“享受”等相配搭。“形势”也不会和“不可移易的必要的”这样的定語相配搭；又如果讀了《新民主主义論》本段的原文，看到上文“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苏联式的”，“統治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等等的詞、句，当然不可能把这里的“形式”誤認做“形势”了。一个詞，在書面語里不会是孤零零的，一个句子也很少是孤立的，必定有它的上下文的联系；因此，上面举出的这兩个例子，并不足以証明拼音文字里必定有同音詞相混的現象，而恰恰足以証明同音詞的区别問題，在語言环境当中，在上下文和詞跟詞的相互配搭的关系当中，自然地可以得到解决。

此外，一般語言上，还有多种多样的避免同音詞相混的方法，如“更換詞素”、“增加詞素”、“增加音节”、“化成詞組”等等。例如：“期中”和“期終”是同音詞，很多人已經把“期終”說成“期末”或“学期終了”；“初診”和“出診”是同音詞，很多人也把“初診”說成“初次診”；“初版”和“出版”是同音詞，很多人也把“初版”說成“第一版”、“新出版”；“时式”和“时事”、“时势”等是同音詞，很多人也把“时式”說成“新式”，把“时势”說成“时代趋势”；“粤劇”和“越劇”是同音詞，很多人也把它們說成“广东戏”、“紹兴戏”了。当一个詞的意义在語言环境里还不够清楚的时候，語言本身自然地会运用这些方法来避免同音相混的弊病，并且使得意义表示得更清楚，来發揮語言交际的功能。至于拼音文字，只能根据实际語言的变化来拟出一个个比較固定的書写形式；它不能脫离实际的声音形式而另外定出一整套区别意义的标記来。

我們說同音詞問題是一般語言上的一个普遍性的問題，并不等于說汉語里的同音詞沒有特殊的現象。文字的性質是和書面語有直接关系的，而書面語又对于口头語發生了很大的反影响作用。汉語里有許多特殊的現象，是由于汉字的特性而产生的。由于汉字的表意文字的性質和單音节的制度，語言里，尤其显著的是一般書面語里，常常产生了复音詞的节縮現象，引进了許多文言的成分，而且有很多是使用汉字造出来的詞。陈文彬先生曾經說过：“北京普通話的同音詞的来源，主要的有兩个。一个是因为語音变化的結果，…另外一个来源是因为任意使用汉字作为詞根造詞的关系。”① 又說：“使用汉字造詞的人，很少考虑到造出来的詞，在口头上怎么讀，讀起来会不会和其他的詞混淆不清。因此，这样造出来的詞就有許多不用眼睛看只用耳朵听是不能一下子弄清楚的。”② 同时也因为使用汉字的緣故，很多人并不講究在普通話里的实际語音，常常根据各自的方音来閱讀应用汉字所写的書面語，并不把有些普通話里的同音詞認为是同音。例如，“酒茶”和“韮菜”，“权力”和“权利”，“出版”和“初版”等，在某些方言区域里并不認为是同音詞。这种情形更促使許多人应用汉字来造詞。因此，汉語里同音詞众多的現象似乎覺得很突出的了。

可是，我們进行拼音化工作的，万万不要被这种現象吓昏了。汉語里有許多同音詞，既然是由于汉字特性对于語言的反影响而产生出来的，那末，随着拼音化的范圍的扩大，汉字对于語言的这种影响逐漸地消失，这許多同音詞也自然而然地有大部分要归于分化和淘汰。例如“达官”和“达观”，“猛醒”和“猛省”等，在文字拼音化之后，很可能要归于淘汰。又如“异性”和“异姓”，“文人”和“聞人”等，在拼音文字通行之后，也可能自然地趋于分化。由此可見，精确、适用的拼音文字对于語言發生反影响，可以促使語言趋向于意义表达的明确化，使語言自然而然地会克服許多同音詞相混的弊病。所謂精确、适用的拼音文字，是直接根据着口头的說話拟定出来的，是为着反映当时的口头語的，而不是用来“翻造”和“复制”原有的一些应用汉字所写而直接受了汉字性質影响的書面語。文字拼音化的过程，应該是新文字和旧文字逐漸交替的过程，也是汉字特性对于原来汉語所發生的一些反影响作用逐漸地消失的过程。如果我們把現在語言里的許多同音詞在拼音文字的形式上加以区别，那就不免要把原来汉字对于語言的这种影响在拼音文字当中固定下来了。那使得文字要丧失一些拼音文字的性質和作用，又使得語言的發展要受到限制和束縛。那是倒退的，还是前进的呢？

我們应該反对利用拼音文字的字形来区别同音詞的办法。我們应該弄清楚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中是不是解决得了。我們必須把这一个問題归到語言本身上来，这是在原則上首先应該决定的。

其次，我們再来談一談汉字書写是不是可以从字形上来分辨同音詞。我曾經說过：“汉字虽然說是表意文字，实际沒有把許多同音而不同义的詞在書写形式上分别出来，…認为汉字里可以对同音詞加以分别，而在拼音文字里就要發生同音詞的問題，这都是由于对汉字的錯覺而發生的誤会。”③ 这里主要地是根据下列兩方面的事实来說的：

一方面，一般熟習汉字的人，往往不注意应用汉字所写的書面語里有大量的“同形詞”的存在。所謂“同形詞”，就是在文字的書写形式上沒有分别的同音詞，

---

① ② 《中国語文》1953年2月号，8頁。

③ 《同音詞和同义詞的产生》，《語文知識》48期，33頁。

例如"紅花"的"花"和"花錢"的"花"，"把手"的"把"和"把工作做好"的"把"，"怪样子"的"怪"和"怪好看"的"怪"等。这种事实，有加以强調說明的必要，因为認識了这种事实，就不会一口咬定同音詞在汉字里有分別，到了拼音文字里就要發生問題，并且借此来反对拼音化。

另一方面，汉字，从甲骨、金石文字所記載的文献起一直到現在用簡体字所写的文章，沒有不应用"同音通假"和"依声托事"的方法的。汉字的構造，虽然是表意文字的性質，而在实际应用当中已經有很显著的标音的傾向。汉字的演化，是在它的構造和应用兩相矛盾当中进行的，一面产生了許多"分別文""累增字"①，一面仍是沿用假借方法来节制"常用字"的增多。例如"变化"的"化"并不用"匕"(原来是倒轉来的"人"字)来代表，"宗旨"的"旨"也并不用"恉"来代表，"采色"的"采"和"采擇"的"采"，原来也不一定要写做"彩"和"採"。現在我們把"并"和"並"，"小丑"和"小醜"等一一地混同起来，并沒有覺得不方便。(在拼音文字里，要想把"在"和"再"等加以区別，实在是多余的。)汉字里从古以来通行的假借方法，就是在字形上不把同音詞分別出来的一种用字的原則。这种事实，目前在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也有加以强調說明的必要。

至于刘冠群先生所謂"某些同音詞由汉字書写是可以从字形上分辨的"，像"权力"和"权利"，"形式"和"形势"等的例子，实在是历史上形成的，原来是不同音而变成同音的，是語音变化的結果，正可以跟一般拼音文字里"write"和"right"、"bear"和"bare"等的例子来相比拟。从辨別意义的功能上看来，这种現象是很不規則的，也是很不可靠的。

認为汉字字形可以对于同音詞有分別，这种錯覚之所以發生，有許多种原因。主要的是：第一，一般人对于汉字的認識，往往注重各个字的構造，而不注重它在实际方面的运用。第二，一般人对于汉字的运用，又往往以为一个个的字就是代表着一个个的詞，而沒有注意到实际語言里占着多数的复音詞。第三，对于汉字熟習的人，还沒有熟習拼音文字，就把同音詞問題看做拼音化的一重障碍。关于这种情况，刘澤先先生分析得很好。他說：

> 对于方塊字不熟習的人，看方塊字的文章的时候，也要猜着看。对拼音文字不熟習的人看拼音文字的文章，即使有的地方要猜，可是猜个一兩回，就必然可以猜出来，而且猜得对；对于方塊字不熟的人看方塊字的文章，有时候怎么猜也猜不出来，猜出来的也未必对。②

这是因为汉字一方面常常用不同的字来代表同一个詞，另一方面又常常用同一个字来代表几个不同的詞。有时候，音同而字不同；有时候，字同而音不同。汉字本身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不熟習汉字的人对于文章里詞語的辨別和認識，特別感到困难。所以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当中究竟是不是比在方塊字中要多，必須要从整个文字体系里对于詞語辨別和認識的便利的程度上来比較，不能單从同音詞在字形上有沒有区別的某些个別的例子来断定。

汉字給我們汉民族保存着無比丰富的历史資料和文化遺产，这是汉字的巨大功績之一。可是，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我們对于文章里的詞語不容易辨別和認識，历来的学者在傳授、整理这些資料和遺产的过程当中，不知道遭到了多少的困难。对于許多古代文献当中的詞句，历来最熟習方塊字的学者常常有紛歧的解釋。这里举出几个簡單的例子：

>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濫矣。"(論語，衛灵公篇)
>
> 这里的"固"字有兩种不同的解釋：一种是作为"固然"来講，說"固穷"是"固有穷时"；一种是作为"固守"来講，說"固穷"是"固守其穷"。
>
>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子魚論战)
>
> 这里的"固"字也有兩种不同的解釋：一种是作为人名来講，就是指当时一位大司馬"公孙固"；一种是作为"堅決"的意思来講，說"固諫"是"強諫"，大司馬是"子魚"。
>
> "夫樹国固必相疑之势。"(汉書，賈誼傳，治安策)
>
> 这里的"固"字也有兩种不同的解釋：一种是作为"堅強、稳固"来講，一种是作为"固然"来講。

这几个例子里的"固"字，都有紛歧的解釋。这样有紛歧的解釋的字，叫做"歧义字"。歧义字之所以产生，是語言上的原因，也是語言上的問題。当語言环境不能帮助明确詞义的时候，实行复音化和詞組化，自然可以避免或減少歧义字的發生。"字"的歧义現象，也就是"詞"的音混現象。由此可見，同音詞問題决不能从汉字書写的字形上去解决的。

总起来說，汉字虽然是表意文字，实际并沒有把許多同音詞在書写形式上分別出来。这种事实的說明，对于目前文字改革的进行，确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我們把一般人对汉字的这种錯覚糾正过来，一方面使得一些人不至于为了同音詞問題而对拼音化文字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們进行拼音化文字工作的，不会再向着利用字形来区別同音詞的那条行不通的路上走。我們总还不免感到同音詞問題是个拼音文字上的棘手問題，就是由于对汉字的这种錯覚在那兒作祟。我們要把同音詞問題归到語言本身上来考虑，使它在語言規范化的工作中得到解决。因此，我認为，像刘冠群先生那样主張，以为汉字字形可以分辨同音詞而想研究同音詞問題在拼音文字中如何解决，那是不正确的。　　(1956年12月，于上海)

---

① 参看王筠《說文釋例》卷八。

② 《同音詞的問題不大》，見《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19頁。

語 言 学 簡 史

——語言学講話之二——

彭楚南

1 語言研究的萌芽

語言的研究，跟世界上其他許多学問的研究一样，是在古代的文化搖籃——印度、中国和希臘开始的。但是由于語言情况不同，古代中国的語言研究不同于印度和希臘；由于历史情况不同，印度的語言研究和希臘又有不同的結果——現代的科学的語言学是繼承希臘的傳統而發展起来的。

促成語言研究的开端，要有三个条件：

（一）体系完整的文字；

（二）文献历史相当長，長到足以使某个时期的口語离开了古文献中的語言，以致当时的人不能了解或不容易了解古文献中的若干部分；

（三）对于語法研究来說，語言要有比較丰富和明显的形态；对于語音研究来說，文字要有起碼的拼音制度。

古人开始研究語言往往是出于無意的。最初大概是因为語言向前發展了，發生了变化，而一向被視为神聖的古書（尤其是宗教經典）有些地方讀不懂了，解釋不下去了，文字發音跟口語有距离了，于是就出現一批为古書加注釋的人——最初的語言研究者。我們所熟悉的最早的語言研究者或著作——印度的波弥尼，中国的«尔雅»，希臘的狄奥尼修斯等就是这些工作的总其成的人物或著作。

汉語的語法研究从前集中在虛字上面，有系統的虛字研究也开始得比較晚（如«經傳釋詞»），而且科学的完整的語法学著作要到19世紀末在西洋語法学的影响下才产生。这是因为汉語里形态比較少或者比較不显著。汉字沒有能够把汉語的形态表現出来，也是原因之一。汉語語音的系統研究也是在印度的影响下才开始的①，这是因为在这以前汉字沒有起碼的拼音制度。

当然这不是說汉語的語法沒有可以研究的，更不是說汉語沒有語法。到了今天，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可以交流，上述条件都变成不必要了。对于沒有文字的語言，也可以直接进行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的研究，不管这种語言的形态是丰富的还是隐晦的。我們明白了这一些历史事实，就会重視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交流，努力从各方面吸取自已所缺少的方法和工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話对于語言学是有特別重要意义的。

研究語言学的历史，还可以帮助我們認識这門学問过去的成就，避免在我們的研究中走弯路。任何人的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的。抛弃前人的基础，一个人的研究一定不可能超出前人的总的成果。斯大林批評馬尔主义者說，“听了馬尔的說法，特别是他的‘門徒們’的說法以后，会使人認为在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語言学，語言学只是以馬尔的‘新学說’出現以后才开始。”②从这里可以看出研究語言学史的重要性。

2 古代印度

語言科学在欧洲人發現梵語以后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巧得很，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語言的比較全面的研究也是从梵語开始的。

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紀的吠陀时代，印度就已經創立了自己独特的語言研究体系。到了吠陀时代末期，这一研究区分出三个方面：語音、語法和詞源的研究。詞彙学是后来發展的。这些研究都跟«吠陀 Veda»的研究联系着。婆罗門教把«吠陀»看成神聖的經典，因而很重視文学語言的规范化，語言的各种研究就应运而生。

古代印度最偉大的語法学家（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位語言学家）波弥尼（Pāṇini，公元前四世紀）写了一部8卷的«文字义理 Sabdanusasana»，用四千多条簡潔的規則全面地描写了梵語語音学，形态学，構詞学和結構学（句法）。他分析出詞类，也分析出詞的各种成分：詞根、詞干、詞头、詞尾。他給詞头、詞尾的功能下了定义。他將梵語跟吠陀語比較，替比較法开了个头。他分析了各种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他使用了一套严整的术語。所有这些，对于兩千多年以后的欧洲語言学还發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可見他的方法的严謹，体系的周密和理論的科学性了。当然，上面已經說过，在他以前已經有許多人研究了語言，写下若干著作，只是沒有流傳下来而已。

波弥尼的規則太簡單扼要，后来的人不容易讀懂，于是就有許多人出来为他的著作做注釋。其中著名的注釋家有伽迭衍那（Kātyāyana，公元前三世紀），波膩闍梨（Patañjāli，公元前二世紀）等。③

① 請参閱張建木«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

②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32—33頁。

③ 关于印度的語言学史，請参閱 A.A.Macdonnell«印度文化史»，1927。龙章譯，1948，中华，112—9頁。

印度的語言研究后来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沒有成为科学的語言学，这是因为，研究者大都把自己局限于注釋上，局限于書面語言和古代語言上，更重要的，是很少超出印度語族以外进行比較研究。

3 古代中国

中国的語言研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語法方面除了在个別地方有片断的記載以外，沒有發展成为系統的研究。古人的語法和修辞的概念隐藏在訓詁学和詩評文評里面。文字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比方，«公羊»庄公28年傳注："伐人者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为主，讀伐短言之。"如果文字能够表示出語音的不同，也許这一段話就可以說明当时語言里这个动詞（因而可以推想到另外一些动詞）有主动、被动的分别，而以元音的長短或声調的变化为其形态。

古代中国的語言研究是跟汉字的特点密切联系着的。表意文字的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求特别注意字形的研究，文字学因此占了中心地位。中国文字学比外国早了兩千年，因为在外国，文字学現在才开始建立起来。

字义的变迁引起了語义学的研究——古代叫做訓詁。跟訓詁有关的是对字义的地域分歧的研究——方言詞彙的搜集。語音的研究是較晚才开始的。

楊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方言»13卷(公元1世紀) 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的比較詞彙。楊雄注意民間口語，实地調查，是方言調查的先驅者。郭璞(276—324)替这本書作了有益的注釋。«尔雅»（公元前三世紀？)是第一部按意义排列的字彙。刘熙(公元二世紀)的«釋名»是研究語义学的名著，按意义分类。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文字学的經典，按部首排列。«方言»«尔雅»«釋名»«說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語言研究的著作。这些書証明詞彙、語义、方言和文字的研究在古代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①。以后的一千多年間，出了許多注釋家，模仿这类書写出了許多类似的作品，但是一般都沒有越出这几部書的范圍。

公元三世紀，在梵語的影响下發明了反切法，接着出現了韵書和等韵圖。保存下来最古的是陆法言«切韵»(601)的唐写本。后来重要的著作有«广韵»(1007)，«集韵»（1039），«中原音韵»（1324）和«洪武正韵»(1375)等。在中国發展了对于声韵調的独特的研究傳統。这一傳統对于汉藏語言和其他声調語言的語音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4 古代希臘

古代希臘学者对于語言現象喜欢作哲学上的辯論。比方，詞和声音之間的关系是按性質还是按習慣决定的，語言是怎样起源的，等等。

在語法上，柏拉圖(公元前427—347) 認出靜詞和动詞是語言的兩个基本要素；亞理斯多德（公元前348—322)加上連詞和冠詞，奠下詞类的学說基础，区分出数目和变格 (ptôsis)的語法范疇。第一部系統的希臘語語法是狄奧尼修斯(Dionysios Thrax，約公元前二世紀)的，他在他的老师阿里斯塔赫（Aristarchos，約公元前217—145，被認为是西洋第一个划分詞类的人)之后繼續研究八种詞类的学說（靜詞、动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詞)，并且奠下了結構学的理論基础。他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拉丁語語法大都是沿襲他的体系。今天的許多語法术語都是源出于希臘語或者通过拉丁語借自希臘語。

亞历山大学派的狄斯科勒（Diskolos，公元二世紀)以研究結構学著名，他給結構学(句法)下的定义是"关于詞組的学問"。著有«結構学»。

希臘人在語音学方面区分出元音和輔音，半元音和啞音。为了希臘語的需要，把沒有元音字母的腓尼基系統的字母表添加了元音字母，是一种偉大的貢献。希臘人对自己的方言也有研究，Strabon 分出四种方言：Ionia，Attika，Doria 和 Eolia。在詞彙方面，拜占廷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約公元前257—180)是西洋詞典学的創始人。

5 古代罗馬

第一个講拉丁語語法的是斯提罗(Stilo)，以后著名的有瓦罗(Marcus Ter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27)，等。瓦罗著有«拉丁語研究 De lingua Latina»25卷。第一卷緒論，第2—7卷詞源学，第8—13卷变格、变位，第14—25卷結構学。現在只存第5—10卷。詩人盧西留斯(Lucilius) 曾在詩集第9卷中討論到正字法改革問題。凱撒（Julius Caeser) 在高盧战役前后写了一部語法«論类比 De analogia»，在其中他創造了"夺格"(ablativus)一个术語。

四世紀的大語法修辞学家多納特(Aelius Donatus)写了一部«語法艺术 Ars grammatica»（約350)，分長短兩編。長編有語音、字母、拼音、詩律、重音等，短編有問答和八种詞类(跟希臘語的比較，沒有冠詞，加上感歎詞)。六世紀出了著名的語法学家普里斯千(Priscianus)的語法(約500)。

6 中古欧洲

古代的希臘語語法或拉丁語語法只是为了解釋古代文献，帮助作校勘工作，所以叫做文献語法或語文学的語法。中世紀欧洲的許多語法著作(主要是拉丁語的)只是多納特或普里斯千的著作的翻版。这一时期的重要貢献

---

① 請参閱«中国語文»1956年5月起連載的中国語言学史話。又請参閱罗常培«中国語言学»，«科学通报»1953年4期。又請参閱胡樸安«中国文字学史»(1937)和«中国訓詁学史»(1939)，商务。

在于大量語言材料和标本的搜集。

基督教促使各族使用自己的文字翻譯«聖經»«主禱文»之类的宗教書籍。Theodoro Bibliandro 的«De ratione communi omnium linguarum et litterarum commentarius»(1548)最初搜集了14种語言，Rocha 的«Bibliotheca apostolia Vaticana»(1591)使增加到26种，Megiserus 的«Specimen 40 linguarum et dialectorum ab Hieronymo Megisero à diversis auctoribus collectarum quibus oratio dominica est expressa»(1592)增加到40种，同作者的«Oratio 50 diversis linguis»(1593)又增加到50种。

在这个基础上，逐漸产生語言的初步比較研究。其中有：Perion 的«法語和希腊語亲屬論 Dialogorum de linguae Gallicae origine ejusque cum Graecâ cognatione»(1544，巴黎)；Henri Estienne 的«論法語和希臘語的相似性»(1566)；Guichard 的«詞源的和諧»(1606)；Scaliger 的«欧洲語言分布論»(1610)；Duret 的«世界語言史宝庫»(1619)；Mĕnage 的«詞源»(1650)等。

这些初步的比較，当然难免錯誤。例如，Bibliandro 把波斯語列入閃語系，把塞尔維亞語和格魯吉亞語当做希臘語的方言，等等。

17世紀，法国笛卡兒(Descartes)的信徒們在波若耶尔(Port Royal)修道院研究出一种所謂理性語法。他們認为思想和語言有內部的联系，因此邏輯和語法也应該有內部的联系。邏輯只有一种，因此語法也应該只有一种。他們把語言看成不变的范疇，不明白不同的語言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这种語法在科学上沒有什么价值。

这个时期的語法研究有兩个特点：

(1)編写民族語言的語法要模仿拉丁語，把沒有变格的語言也勉强列出变格表。

(2)語法教育就是語言教育的全部內容，崇尙客厅語言、宮庭語言，排除方言俚語，維持語言的"純潔性"。語法的定义成了 ars bene dicendi et bene scribendi(說得正确写得正确的艺术)，或者 grammatici unus finis est recte loqui(語法的唯一目的是說得正确——法国 Scaliger 語)。語文学研究以目治为主。

7 近代欧洲

18世紀的欧洲，在語言学的方法論上还沒有达到科学水平，但是却替后来的科学的語言学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成就有兩点：(1)語言哲学的研究，(2)語言标本的繼續搜集。

坎狄拉克(Candillac)在«認識起源論»(1746)中談到語言的起源，主張呼声說。盧梭根据他的«民約論»的原理提出語言起源于契約。經济学家亞当·斯密斯在«論語言的起源»中主張动詞先产生。德国人赫尔德尔(J. G. Herder)的«語言的起源»(1772)提出拟声說。

另一个有兴趣的討論題目是什么是理想的語言。德国人耶尼施(D. Jenisch)認为理想的語言有四个条件：一丰富，二有力，三清楚，四銳耳。他認为德語最不合理，喜欢法語。

跟理想語言有关系的是人造語的尝試。英国人 Wilkin 主教提出用2600个符号的人造語方案(1618)，称为"哲学語言"，用来翻譯了«Aeneid»150行。在他以后，人造語越来越多，这种企圖一直到現在还有。作者之中有無名的人物，也有著名的語言学家，比方甲貝連孜(Galelentz)，索緒耳，叶斯丕遜。比較著名的方案有 Schleyer 的 Volapük(1852)，柴門霍夫(Zamenhoff)的 Esperanto(1887)，Beaufront 的 Ido(1907)等。

語言标本的搜集者哲学家萊布尼茲(Leibnitz 1646—1716)的«Miscellanea Berlinensis»(1710)已經区分出印欧語言(他称为雅弗語言)和閃語。俄国女皇迦德鄰二世对語言学很感兴趣，俄国駐外大使們、德国学者和美国总統华盛頓都为她提供了許多材料，在帕拉斯(Pallas)主編下，她出版了«全世界語言的比較詞彙 Glossarium comparativum linguarum totius orbis»(1787)。其中285个詞每个詞有200种語言的样品。再版时(1790—91)增加到280种。西班牙人艾尔巴斯(Lorenzo Hervas y Panduro 1735—1809)的«已知的各国語言目录 Catâlogo de las Lenguas de las naciones conocidas»(6卷，1800—05)也很著名。其中包括300种語言，还有初步的語法比較。他首次認出汉藏語系、芬蘭-烏戈尔語系和南島語系。德国人阿德龙(J. Ch. Adelung 1732—1806)的«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4卷1806—07)也使他享有盛名。

8 比較語言学的建立

1702年，盧多夫(J. Ludolf)首先比較了各种閃語，因为这些語言的相似性很显著。1769年，伊热(Ihre)比較了瑞典語和哥德語。1799年，嘉馬提(Gyármarthi)从語法上証明了匈牙利語和芬蘭語的亲屬关系。

但是眞正的科学的比較研究是从19世紀初开始的。英国人瓊斯(W. Jones 1746—94)指出了梵語跟欧洲語言的近似。德国人F. 施来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在1808年發表了他的名著«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他第一次使用"比較語法学"的術語。他發現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的亲屬关系。他又把語言按形态学原則分为有机的、有形态变

化的語言和無机的、無形态变化的語言兩大类。

丹麦人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1787—1832）在1814年写成《論古北欧語或冰島語的起源》（1818年才印行），第一次提出科学的比較方法。他認为决定亲屬关系的关鍵在語法，“語法的一致性是亲屬性或原始相同性的更可靠的証据”。他也注意音变的比較，發現了日耳曼語的輔音轉換原則（后来的格林定律）。

德国人博普（Franz Bopp，1791—1867）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另一奠基人。他的《論梵語的变位系統 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e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1816，英譯1820）首次用变位系統比較了重要的印欧語言。后来他把研究結晶写成《梵語、曾德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哥德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学 Vergleichende Grammatik》（1833—52，注譯1866—74）。

德国人雅各·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的名著《德意志語語法 Deutsche Grammatik》（4卷，1819—37）使他获得比較語言学新方法創造者的荣誉。这書的第一版只談形态学，看到拉斯克1818年的著作以后才于1822年再版时增加了关于語音的研究。格林的新方法是“輔音轉換原則”，就是所謂“格林定律”。①格林定律已經由拉斯克發現，格林不过是加以公式化，更詳尽地說明而已。格林定律本身也还有許多缺点。

俄国人沃斯托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Востоков，1781—1864）的《斯拉夫語言論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лавянском языке》（1820）用斯拉夫諸語言的材料独立地討論了語法、历史語音学等問題。

德国人頗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2—87）确定了印欧語言的許多严格的語音对应規律，《印欧語言詞源研究》（2卷，1833—36）确定了詞彙比較的基础。

德国人A.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1821—68）的《印欧語言比較語言学綱要》（1861—2，四版1876）提出了所謂構拟問題，就是說，推測出未見于文献的原始語言的面貌，这是比較方法的一个發展。構拟的功用有三点：(1)表示出各种語言后来的变化，(2)証明沒有一种活的語言是“母語”，(3)表示出語音發展的細节。施莱赫尔过分迷恋于構拟，濫用了它。这表現在他利用構拟的印欧“母語”写的一篇寓言上（載在《比較語言学叢刊》第5期，1868）。欧洲的語音学在声調方面的知識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有学者Kurschat指出立陶宛語有声調，施莱赫尔还不能了解，就可以証明这一点。

德国人庫尔秋斯（Georg Curtius，1820—85）推翻了格林关于古日耳曼語只有 a i u 三个元音的說法，加上一个e。他把音变分为規則的和不規則的兩类。他的青年語法学派的学生們否認后一种音变的存在。

在詞彙比較方面，有費克（A. Fick，1833—1916）的《民族分裂前印度日耳曼基础語詞典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 in ihrem Bestande vor der Völkertennung》（1868）。这本書显然是受了施莱赫尔構拟理論的影响。后来各版改名为《印度日尔曼語比較詞典 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为了發表研究的成果，庫恩（A. Kuhn）主編的《比較語言学学报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于1852年創刊。1858年庫恩又跟施莱赫尔合編《比較語言学叢刊 Beiträge zu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到1876年兩刊物合并。

9 比較語言学的新时期

顎音定律的發現是比較語言学进入新时期的标志。从前学者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印欧語的 k，在梵語一会兒是k，一会兒是c，一会兒又是ś，在希臘語可以变成k，p，t。經过湯姆生（V. Thomsen）、佛尔納（見下）、索緒耳（F. de Saussure）、柯立茲（H. Collitz）、施米特（J. Schmidt）等人的研究，終于用顎音定律加以解釋了。

丹麦人佛尔納（Karl Verner，1846—96）用重音現象对格林的日耳曼語第一音变的例外給予了科学的解釋②，是所謂佛尔納定律。佛尔納这一發現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它証明語音定律并沒有例外，一切例外都另有定律支配着。

布盧格曼（Karl Brugmann，1849—1919）研究了印欧語言的元音和介音系統（1876）。索緒尔研究了印欧母語的元音系統（1878）。保罗（Hermann Paul，1846—1921）的代表作《語言史原則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1880）特別强調語言中的类比。布盧格曼和德尔布吕克（Bertold Delbrück，1842—1922）合著的《印欧語言比較語法大綱 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5卷，1886—1900）集中了印欧語言研究的成果，包括了几乎全部印欧語言，方面也涉及形态学、語音学和結構学。德尔布吕克是比較結構学的奠基人。意大利的阿斯科利（G. I. Ascoli，1829—1907）提出基層（substratum）理論。这理論將語言中

① 关于定律的內容，后面再談。

② «Eine Ausnahme des ersten Lautverschiebung»，«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1877，bd 23，H. 2.

的变化原因解釋为由于某地区居民吸收异族語言并将它适应于自己語言規范而引起的語言混合。

这一时期的許多学者有一些共同的傾向，形成一个新的学派——青年語法学派（die Junggrammatiker）。它的成員有丹麦的佛尔納、德国的布盧克曼、保罗、德尔布吕克、鄂斯托夫、（H. Osthoff, 1784—1909）、西佛斯（E. Sievers）、勒斯琴（A. Leskien, 1840—1916）。还有意大利的阿斯科利、瑞士的索緒耳（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法国的布列尔（M. Bréal, 1832—1915）、美国的魏特尼（W.D. Whitney, 1827—1894）、俄国的福尔圖納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4）等也接近这一学派。

布盧克曼和鄂斯托夫于1878年創办«形态学研究 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卷首的發刊詞成了青年語法学派的宣言。青年語法学派推翻了前人把語法了解为有机体等等的自然主义，也推翻了語言發展兩个时期（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有不同規律的理論。他們相信語音定律不容許例外，或者說例外也一定有它的定律，問題是要去發現它。他們創立了好些研究音变和对应規律的方法。

刊物方面还有1871年創刊的«印歐語言研究叢刊 Beiträge zur Kund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1891年布盧克曼和斯特萊堡（W. Streitberg）創刊的«印歐語言研究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連同上述的学报和«形态学研究»，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研究的材料逐渐枯竭。«Beiträge» 出到30期又跟出到40期的学报合并。

10 普通語言学的建立

普通語言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洪堡特（Wilhelm Humboldt, 1767—1855）。他研究許多不同系統的語言（梵語、汉語、馬來語、印第安語、巴斯克語），用比較法解决一般的語言現象的問題，走上綜合研究的道路。他的代表作«爪哇島卡維語研究 Über die Kawisprach auf der Insel Jawa»（3卷1836—39），使比較語言学超出了印歐語的框框。在本書的序言«論人类語言結構的差异和它对人种智力發展的影响»中，他宣布說他建立了普通語言学。他認为語言是动的，不是靜的，語言不是工程（ergon）而是行动（energia）。他認为語言沒有优劣之分，簡單的有它的威严，复杂的有它的明晰；他想建立語法的共通原理，反对純演譯的研究；他把世界的語言分为四种形态学类型：孤立語、膠着語、屈折語和編插語。

施萊赫尔和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繼洪堡特之后替普通語言学做了許多准备工作。施萊赫尔写了«語言比較的研究»（1848—50），«語言的意义»（1865），把实踐工作提高到理論來。他們的共同錯誤是把語言看成是自然增長的有机体，把語言学看成是自然科学。他們形成了自然主义学派。

俄国的庫尔太納（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845—1929）是卡桑学派的創始人。他的音位理論比西歐語言学家早了三四十年（1868年起）。他把語言現象列入“心理-社会”的領域。在民族問題上他扞衛了少数民族的平权。波鉄布尼亞（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Потебня, 1835—91）和沙赫馬托夫（А.А.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也是俄国的著名語言学家，他們对苏联的語言学影响很大。

以索緒耳（1857—1913）和梅耶（A. Meillet, 1866—1936）为代表的心理社会学学派对現代普通語言学影响最大。現代許多語言学家都承認索緒耳为現代普通語言学的奠基人。索緒耳的主張写在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中。他認为語言是社会現象，在研究方法上分清了断代的研究和历代的研究，認为語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音变和类比。他認为語言是一种符号系統，这种系統把概念和声音联系起来。符号和符号之間的关系就構成語言科学的特殊的研究对象。他这种符号系統理論是結構主义理論的基础。

梅耶在«历史語言学和普通語言学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quistique générale»（1921—36）和«历史語言学的比較法 La me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1925）里总結了印歐語言比較法的成果。他的观点接近索緒耳。他否認完全構拟母語的可能性。他利用語言地理学的方法，提出了印歐母語的方言問題。

索緒耳的学生巴里（Bally）和塞舍額（Sechehaye）在日內瓦繼承索緒耳的衣鉢，称为日內瓦学派。

王德利叶斯（Josef Vendryes, 1875-）的主張接近社会学学派，他企圖在«語言 Le langage»（1921）中联系語言史和社会史。

本溫尼斯特（E. Benveniste, 1902-）在«印歐語言靜詞構成的起源»（1935）中企圖構拟比前人所做过的更早阶段的共同印歐語形式。

特魯別茲科伊（N. Trubetzkoy, 1890—1938）从索緒耳和庫尔太納那里取得音位学的理論，建立了所謂結構主义語言学，以布拉格为活动中心①（1929起）。丹麦的布倫达尔（Viggo Brøndal）和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1899—）繼承特魯別茲科伊的学說，并加以發展，形成哥本哈根的結構主义学派②，以«語言学报

---

① 綱領性著作是 Trubetskoy,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1939。

② 綱領性著作是 Brøndal,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語言学报» 1939; L.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1943。

Acta Linguistica» 为机关刊物(1935起)。叶尔姆斯列夫認为語言的眞实單位是語音、語义和形式之間的相互关系，它們構成語言的內部体系和特征，他建立一种所謂語言單位論(glossematics)，这是純粹結構上的語言研究。

傅阿斯(Franz Boas)是美国描写語言学学派的創始人，由于研究印第安語言，發現印歐語言的許多概念如格、时間、式等不适用。他主張对某一阶段的語言进行平面的描写，不承認詞和詞素之間有原則性的区別。他把主要力量放在詞素的研究上。他的主張写在«美洲語言手册 Handbook of American languages» (1911)中。他的学生沙皮尔(Edward Sapir, 1884—1939)的«語言 Language» (1921)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的«語言 Language»(1933)都繼承了描写語言学的理論，并且逐漸向欧洲的結構主义靠攏。

此外，結構学派在意大利还有佛罗棱斯小組(1945年成立)。

叶斯丕遜(Otto Jespersen 1860—1943)研究英語，«語法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1924)是他的名著。他的三品說对中国語法研究有过很大影响。

琼斯(D. Jones)、巴西(P. Passy)以研究普通語音学著名。

现代語言学的特点有二:(1)研究的語言范圍越来越深广，学者注意發掘以前很少研究的語言，比方荷蘭兴尼肯(van Ginneken)和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都研究了高加索諸語言。这方面的巨作有梅叶和科昂的«世界的語言 Les langues du monde»(1924, 1952再版)等等。(2)注意結構的分析研究，并且从数理邏輯、統計数学、控制論等方面吸取新的方法。到了20世紀中叶，自动化翻譯的發明标志着語言学新的發展方向。

11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語言学产生于馬克思主义产生年代的前后。历史比較語言学比馬克思主义早出生了二三十年，是屬于馬克思以前的时期的。由于它的科学性，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承認了它，并且在他們的著作里引用了它的材料来証明历史問題。①可見，历史比較法在原則上是合乎馬克思主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于語言学都是很有兴趣的，尤其是恩格斯。他們都精通許多外国語。恩格斯曾經專門研究过語言学，写了一篇語言学的論文«佛蘭克方言»。在論文里他批評了青年語法学派的W. Braune (1850—1926)关于佛蘭克方言的錯誤見解。

普通語言学正式建立起来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去世了。他們来不及給这門学問一个評价。企圖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普通語言学的第一个人是馬尔。可是，馬尔(Н. Я. Марр,1865—1934)在建立所謂唯物主义的語言学时，完全否定过去語言学的成就，因而犯了許多原則性的錯誤，这些錯誤已于1950年受到公正的批判。在苏維埃时期，有很長的一段时間語言学受到馬尔学派的歪曲，因此妨碍了苏联語言学的正常發展。这个时期的著名語言学家有謝尔巴(Л. В. Щерба, 1880—1944)，維諾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895—)等。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0)总結了苏維埃語言学的成果，是一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綱領性的著作。

在資本主义国家，用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語言学的著名学者有法国的科昂(Marcel Cohen)，他著有«語言 Le langage»和«文字 L'écriture»等書。

12 語言学在中国

上面說过，語言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清代，出了許多有名的学者，对汉語(主要是古汉語)語音、語义和語法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获得一定的成果。比方，顧炎武(1613—1682)研究音变的历史，特別着重每一种音韵現象最早出現的时候；錢大昕(1728—1804)首先証明古音沒有輕唇音(f, v)；段玉裁(1735—1815)首先指出同一个声符的諧声字在«詩經»用韵里是可以通押的；这些研究方法和結論比之同时期欧洲的語言研究也無遜色。但是，中国的語言研究畢竟沒有發展成为現代水平的严格的科学，原因主要有下列兩点:

(1)缺少比較观摩的机会。欧洲的語言学可以說开始于梵語的發現，換句話說，就是比較了較远的亲屬語言。中国过去的語言研究范圍很窄，材料只有一种——汉語，而且偏重于古語和書面語，一般不注意口語和現代語。文献上可能利用的材料逐漸利用完了，有許多旧問題仍不能解決。一种語言的現象总是比較有限的，不足以扩大眼界。有时，一种語言的某一現象在这种語言里不够显著，在另一語言里却可以得到啓發。总之，沒有比較的研究，不能建立起普通語言学。

(2)缺少科学的标音法。語言学的大部分研究是形式的科学(語音、語法)。要發現形式，就必須有完善的工具——音标，这正是兩千年来中国語言研究所缺少的。反切是不完善的工具。要靠这些工具来說明古音很費劲。要用汉字来記录口語，要靠汉字来發現全部語法形式，也是有困难的。

現代的中国語言学是从西洋輸入的。1898年，馬建忠發表«馬氏文通»，这是我国第一部用西洋語言原理来探討古汉語語法的著作。虽然大家責备他套用了

① 請参閱 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恩格斯和語言学»，苏联科学院院报(文学和語言学部)，1941年第一分册。

拉丁文文法，但是他还有一些創見，比方創立助字一类。后来發表了許多語法体系，大都是受西洋語言学理論的影响而成立的。①

在普通語言学方面，第一本介紹的著作是胡以魯的《国語学草創》(1913，商务)。其后有黎錦熙的《国語学講义》(1919，商务)，乐嗣炳的《語言学大意》(1923，中华)，王古魯的《言語学通論》(1930，世界，这本書是安藤正次的書的譯述)，沈步洲的《言語学概論》(1931，商务)，雷通群譯日本安藤正次的《言語学大綱》(1931，商务)，張世祿的《語言学原理》(1933，商务)，《語言学概論》(1934，中华)，孙伯坚譯苏联 Spiridovich 的《言語学与国际語》(1935，辛垦)，林柷敔的《語言学史》(1943，世界)等著作。大概說来，1923年以前的書，內容比較貧乏，1931年以前介紹的，大都通过日文。因为日本在学習欧洲語言学方面比中国先走了一步。

解放后，翻譯了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0)，契科巴瓦的《語言学概論》第一編(1954—55)，布达哥夫的《語言学概論》(1956)。出版了高名凱的《普通語言学》(上下，1954—55)。

这几十年来，在語法学和个别專題上研究比較多，成績比較大。在普通語言学上，除了翻譯或譯述之外，独創的著作几乎沒有。因此，在語法研究上，在解放前只好借用叶斯丕遜、布龙菲尔德、王德利叶斯等人的理論。解放后，各方面的語言研究迅速展开，为提高我国普通語言学理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參考書

林柷敔編譯，《語言学史》，1943，世界書局。

Holgar Pedersen (1867—1953)，«Sprogvidenskaben;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 Methoder og Resultater»(十九世紀的語言学。方法和成就)，1927，哥本哈根。英譯本1931。汉譯本將出版。

O. Jespersen，«Language»，1922，第一章。

L. H. Gray，«Foundations of Language»，1939，第13章。

Vilhelm Thomsen，«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語言学史)，1902，哥本哈根。1927德譯。1938俄节譯本«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XIX века»，莫斯科。

Р. Шор《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紀末的語言学史綱要》，附在上述一書的俄譯文后面，1938，莫斯科。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編，«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19—20世紀語言学史文选)，1956，莫斯科。

① 关于汉語語法的研究史，請參閱胡附、文煉《現代汉語語法探索》，东方，159頁。

朝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

1956年10月6日朝鮮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召开朝鮮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成立会議。參加会議的有朝鮮最高人民会議常任委員会金枓奉委員長、朝鮮語文学界的專家和大学教师。

在会議上，朝鮮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金炳济所長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叙述了朝鮮固有文字的优点和缺点以后，特别指出，現在在朝鮮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深切关怀下，朝鮮的文字改革工作必須对下列的問題积極地进行研究：第一，关于每个字母的新的形式問題，第二，关于新的詞兒連写規則問題，第三，关于字母的印刷体和書写体的問題等等。这些問題研究完成以后，朝鮮就能够和一般先进国家一样使用打字机和排鑄机，而这將給印刷界帶来重大的技术革新。因此，目前就十分迫切地要求成立一个專門研究这些問題的研究机構。

报告結束以后，許多学者們进行了討論。李克魯、申龟鉉、朴时亨、朴相畯、金壽俊、李起仁、郑烈模等在自己發言中都一致地指出进行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表示同意和支持成立研究委員会。

最后，金枓奉委員長發言。他首先談到中国、越南、蒙古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并强調說：在我們的国家里当然应該繼承和綜合过去先人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們还应該广泛地和誠誠恳恳地对許多問題进行研究。他特别指出，为了以后使我們的文字看起来更加容易，我們要特别努力。我們也应該研究类似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字母草案。这样，我們就要在几个草案当中采用一个最妥当的草案。至于字母数目的問題，我認为字母太多了不好，太少了也不好，字母的数目应該是能够最正确地記录出本民族的語音。接着他强調說：語音并不是不变的，因此，不能認为字母的数目是固定不变的。

(周时龙节譯自《朝鮮語文》1956年第6期)

怎样使用《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

金 有 景

《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附有一張簡要的說明，全文如下：

(1)这套卡片共 2186 張，是为整理《汉語方言調查簡表》①的單字音用的，所以叫做《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①

(2)这套卡片所收的字和《調查簡表》語音部分（包括"声母、韵母"兩項的例字）的字数完全相同，排列次第也完全相同。每張卡片上所編的号碼也和表上每条所編的号碼是一致的。

(3)为比較方音和北京音的异同，每張卡片上部注明北京音。北京音的拼法根据 1956 年 2 月 12 日發表的"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同时还用寬式国际音标标出音值，外加 [ ] 号。声調符号一律采用"汉語拼音方案(草案)"所拟定的。

(4)这套卡片必須同《汉語方言調查簡表》联系起来使用。怎样先用《簡表》記音，怎样把記的音过录到相当的卡片上，《簡表》前面已經詳細說明，这里就不重复了。

(5)有了这套單字音卡片，在研究本地音系上，在研究本地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上，就有許許多多的便利。关于詳細的具体的工作步驟，整理方法，参看《方言調查手冊》。②

(6)每張卡片的左边要填上調查地点，調查时間，發音人和配音人和記音人的姓名。最好能把这几項合刻在一个戳子上，每張一蓋，比較省事。

以上是卡片說明的全文，卡片匣中所附的說明有些錯字，以本文所載为准。下面大略說一下使用这套卡片的具体步驟、方法以及其他应該注意的地方。一共分成三項来說：一是如何登記字音，就是卡片的写法，二是卡片的排列整理，三是卡片的功用。卡片要和《簡表》配合使用。卡片和《簡表》都有錯字，为讀者方便計，末了附有卡片和《簡表》的勘誤表。工作开始之前，請先改正錯字。

一　卡片的写法

(1)記音和过录——全部卡片可以分为兩大部分：540 号以前是音系基础字(包括声母和韵母例字)，541 号以后是單字表。一般說来，前一部分必須先在《簡表》上記音，然后再把字音往卡片上过录。后一部分可以先記《簡表》，記完了再往卡片上过录，也可以直接在卡片上記音，省去一道过录手續。看起来，似乎后一种做法更簡便些。不过，在实际工作中，究竟采取前一种做法还是采取后一种做法，还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記的是自己的音(發音人就是記音人)，音系輪廓已經求出，541 号以后就可以直接記到卡片上去。如果記的是別人的音(發音人不是記音人)，最好先記《簡表》上全部單字，記完了再往卡片上过录。用《簡表》記音有时候可以不必記整个字音。相連的字同音，前头的字当然要記音，后头的字可以划个等号表示与前一字同音。相連兩字声韵相同声調不同，后头的字可以省去声韵不記，專記声調。例如河南获嘉：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湖糊狐葫葫盧*壺翳=[煳]=核(榍)棗核兒*互ʾ=*戶
꜀xu

相連的韵母不同，后头的字可以光記声母声調，在声母后加短横表示韵母。例如获嘉：

1459　1460
紐扭　溜
ᶜȵiou　ᶜl-

直接在卡片上記音的时候，每張卡片都要記整个字音(声韵調)。对記音人来說，多記一次《簡表》費事不多，發音人时間有限，先記《簡表》可以节省發音人的时間，(調查方言的时候处处要照顧發音合作人)。至于不十分熟練的工作人員，更加以先記《簡表》然后过录为妥。

(2)字音的位置——为了工作便利，字音应該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且这个固定的地方最好是卡片上印着北京音注音的下边，和北京音的方括弧 [ ] 对齐，如下圖：

1897 kàŋ [k'àŋ]		
抗炕	k'aŋʾ	获嘉

圖的右下角是地名，如上圖"获嘉"兩字表示这張卡片記的是获嘉音，下同。

有的卡片字数比較多，如 1758 号，这种卡片的字音仍应和北京音的方括弧对齐，如下圖(不要把字音写到單字的后头去)：

---

* 这是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义的一部分。

① 新华書店發行，买不到請和北京新华書店發行科联系。

② 在印刷中。

1758 kěn [k‘ǒn]	
恳(懇)垦(墾)啃(齦)	
‘k‘ən	狭嘉

字音最好尽量往上写，不要和卡片上印的北京音距离过大。

(3)标調法——我們記录一个方言的字調，可以用五度制声調符号記調值，如北京四声是：陰平˥陽平˧˥上声˨˩˦去声˥˩。

卡片上北京音的字調在元音上加"ˉ、ˊ、ˇ、ˋ"表示，可以說是五度制声調符号[˥、˧˥、˨˩˦、˥˩、]的簡化。我們一定要記得"ˉ、ˊ、ˇ、ˋ"分别表示陰陽上去。

在写卡片时，方言調类調值都已經求出来，所以卡片上方言的字調用發圈法标注比用五度法标注簡便。而且我們求声調規律时，比較的主要是調类而不是調值。如果用五度法标調，在比較兩地調类时，就需要把調值折合成調类。用發圈法标調就要省事得多。

(4)兩个以上讀音的卡片——一張卡片有好几个字，这几个字方言里有时不同音。例如1647号卡片，上头有三个字："鹽簷閻"。浙江嵊县"鹽簷"讀[꜀ie]，"閻"讀[꜀ȵie]。这样一張卡片就有兩个讀音。还有，汉語里有很多方言一个字有文白兩讀，例如675号卡片的"破"字，浙江义烏有文言[p‘oᵓ]、白話[p‘aᵓ]兩讀，这个卡片也会有兩个讀音。卡片的特点是一張卡片一个讀音，只有这样才灵活，便于排比。一張卡片有兩个讀音，必須增添一个空白卡片，分出一个讀音来。我們姑且管这工作叫"分片"。"分片"一般以边抄边分为宜。要是541号以后單字直接在卡片上头記音，那就先往下記，記完再回过头来"分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分片的卡片最好分开来擱，不和别的卡片混在一起，免得再費时間去翻檢。

"分片"有兩种情况。一是一張卡片上不止一个字，而这些字又不同音，如嵊县的"鹽簷閻"。一是一个字有兩个讀音，如义烏的"破"。"分片"的目的是要做到一張卡片一个讀音。这样，1647号卡片"分片"时，新的卡片写上"閻[꜀ȵie]"，就把原来卡片上的"閻"删去。一字兩讀"分片"的手續稍有不同，一張以文言音为主，把白話音放在圓括弧里，表示有此异讀；另一張相反，以白話音为主，把文言音放在圓括弧里。排卡片的时候不管圓括弧里的讀音。例如：

675 pò [p‘ò]		
破	p‘oᵓ	
	(p‘aᵓ)	义烏

675 pò [p‘ò]		
破	p‘aᵓ	
	(p‘oᵓ)	义烏

圖中下加單綫"－"的是白話音，下加双綫"＝"的是文言音。这样兩音并列便于比較文白讀音。

(5)用不上的字——記音的时候会發現一些用不上的字。方言里不用的字就删去，例如有的方言不用"薅"字，那末1354号卡片"蒿蓬蒿薅除田草"里头的"薅"字就要圈去。發音人不認識或者認不清的字也要圈去。卡片上的字，哪个用不着，就把哪个圈去。如果全用不着，就把那張卡片剔除。要是覺得沒有必要保存这些卡片，則可改作别用。

《簡表》和卡片都有六对重复的：(一)"15道，1306稻道"。(二)"84增，1982曾姓增"。(三)"129靴，765靴"。(四)"116蛇，637蛇"。(五)"133舌，638舌"。(六)"140日，846日"。方言里头"稻道"同音，"曾姓增"同音，就把15号和84号兩張卡片剔除。要是"稻道"不同音，"曾姓增"不同音，就把1306号卡片上"稻"字圈去，1982号卡片上"曾姓"字圈去。765，637，638，846这四張卡片应該一律撤去。

(6)卡片的放法——这是个小問題，可是不注意也会教你浪費工夫。写完了一張卡片，放的时候卡片有字那一面要朝桌面，一張一張挨次放下去，末了再倒过来，次序是順的。要是把卡片有字那面朝上放，結果次序是倒的，如果抄一千張卡片，第1000号在上头，第一号在最底下，用起来不方便，倒一遍又很費工夫。

二 卡片的排列整理

(1)准备工作——排卡片是一件麻煩費事的工作。把兩千多卡片系統的分成若干类，不是很簡單容易的，必須注意工作方法。事实証明，排兩千多个卡片，工作方法对头的只消几个小时，工作方法不对头的忙了几个晚上，弄得精疲力竭还排不好。此外，在哪兒排也是很要紧的。最好把桌子上的东西全搬走，把桌面擦干淨。并且把窗戶关起来，不然大風一来，卡片全刮跑了。沒有合适的桌子或桌子不够大，可以搭几塊板，也可以把床鋪收拾一下，把卡片放在床上排。另外，排卡片前必須准备一些必要的輔助用品。如卡片头(也叫导片)，空白卡片、曲别針，橡皮筋等等。卡片头要准备多少要看方言的声韵調的数目的多寡而定。空白卡片要看需要"分片"的卡片数目多寡而定。一般情况下有一百張空白卡片就够用了。卡片头的用途和作法見下，空白卡片可以买白紙自己裁，也可以买現成的，不过要注意尺寸相同。曲别針、橡皮筋不是非有不可，略备一点是有益無害的。

(2)工作方法——底下分条列举排卡片的方法以及工作中应該注意的地方。

1)排卡片时声韵要有一定的次序和位置，如[p、p‘、m、f]排在同一横行，[t、t‘、n、l]放在[p、p‘、m、

门底下。其他可以类推。不能把［p］擱在桌子的左边儿，［p'］擱在桌子的右边儿，［m］擱在桌子的中央。全部声韵母还要有一定的組別次序。只有声韵都有一定的次序和位置，排起卡片来，才不会拿着一張卡片找了半天还不知道应該放在哪儿。韵母也要有一定次序，比方同一竪行主要元音相同（如［a, ia, ua］同一竪行），同一横行开齐合撮相同。

2）排卡片时，排韵母就專管韵母，排声母就專管声母，不要同时兼顧，欲速不达。有必要时，排好韵母之后，每韵按声母排；或者排好声母之后，同声母的字再按韵母排。分成兩步走，不仅排得快，并且少出錯誤。

3）排卡片时，不要一張一張的往桌上擱。在按韵母排时，擱在一起的（即号碼連着的）三五張甚至十来張卡片同屬一韵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一張張往下翻，要往桌上擱的卡片先留在手里，等同一类的卡片再沒有了，才把这一疊卡片往桌上放。这样也可以省些时間。

4）卡片按一种次序排好，用过之后，不要还原。第二次重分就根据第一次用过的次序来排。有人排卡片，按韵排的排好了，也用过了，再按声母排时，先把全部卡片照号碼还原。这是白費工夫。

5）卡片排列整理好了以后，放在盒里头，看不出所分的声韵的次第。因此每类前头必須用卡片头（即导片）标明类别。卡片头和普通卡片大小一样，只是上头凸出一塊来。凸出部分約一公分高，兩公分長。每类前头放一張卡片头，就在凸出来的地方标上声母或韵母，用起来就方便了。卡片头买不到就自己做。方法很簡單，在空白卡片上粘一塊大小合式的紙片就行。用卡片时，只把要用的那一韵（或声）拿出，卡片头留着不动，等用完了，要放回原来卡片头的后面去。

三　卡片的功用

《簡表》的"說明"写道："和这一部分（按指語音部分）語音調查相輔而行的有一套《汉語方言查調字音整理卡片》，是为整理方言的語音系統，为便利同北京語音作比較用的。"这就是卡片的功用。卡片的功用可以分成三項：

（一）利用卡片求出一个方言的音系輪廓，

（二）利用卡片編制同音字表，

（三）利用卡片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这三項工作，不用卡片当然也都能作，不过作起来慢些。利用卡片，可以提高工作的速度。求音系輪廓，虽然所費时間不多，使用卡片，也可以节省一些工夫。利用卡片編同音字表，可以省去許多翻檢核对的工作，少走許多弯路。把卡片理好再編同音字表就只等于抄写一遍。利用卡片求对应規律，容易看出分合条件，少碰些釘子。卡片上已經印好北京音，北京音不十分熟悉的人可以免去老查字典的麻煩。就是比較熟練的工作人員，利用卡片也可以节省許多机械的劳动。

卡片整理好了，就可以用来求音系輪廓，編同音字表，求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这里只說使用卡片的手續，至于原則和实例，請参看以前本刊發表的几篇討論方言調查方法的文章。

首先是求音系的輪廓。記完声調、声母、韵母和音系基础字之后，把声母以下的例字过录到卡片1—540号上去。先根据声調表把声調写下来，一般的說，方言的声調根据声調表就可以一目了然。把声母例字的卡片（1—113号）依声母排一下，就得出方言的声母表。把韵母例字的卡片（114—220号）依韵母排一下，就得出方言的韵母表。再把1—540卡片全部依韵母排一下，韵母相同的卡片以声母为序，声韵都相同的以声調为序。注意是否有新的声母或韵母，要是有的話，就把它补充到声母表韵母表里去。这时候就可以油印一些空白的同音字表。把这540張卡片的字按音分別填到表里去，就得出方言同音字表的輪廓。①

其次是編同音字表。填完同音字表的輪廓，再記541号以后單字。全部單字記完以后，把这些單字音也登到卡片上去。卡片按韵按声按調排列，排好后抄到同音字表上去。抄完了就是一分同音字表。

把"卡片"上的字往同音字表上填的时候，不要把卡片号碼也过录上去。这个毫無用处。卡片上單字的小注，也不必全部过录到同音字表上去。卡片上有很多單字的小注是为記音方便之用的，登到同音字表上完全沒有必要，登上去反而累贅。例如"1956 旺兴旺，火燒旺"，"2064 鸚鸚鵡櫻櫻桃"，等等，里头的小注在同音字表上应該統統省去。單字的小注只有在必要时才登到同音字表上去。如"1673 傳傳記"，"1675 傳傳达椽"；"1192 会会計"，"1260 会开会，会不会"，等等。另有一种情况，如"下"字，有的方言"下山"的"下"念上声，"上下"的"下"念去声，我們"卡片"也把"下"字列成兩条："599 下下山"，"600 下上下"。要是我們所記的方言这兩个"下"字同音，則小注省去，只写一个"下"字也未始不可，但仍以写上为好。可以写作"下下山，上下"，不要写作"下下山下上下"。小注中的本字可以用符号代替，如"下～山，上～"但是不能省去，有些人写成"下山，上"就不成話了。

① 比較熟練的工作人員，写声母表和韵母表的时候，可以直接根据《簡表》，不一定使用卡片。等到全部卡片（1—2136）都写好了，先按韵母分；同韵母的再按声母分；声韵相同再按声調分。接下去就填同音字表，求对应規律。这样作可以省去第一批卡片（1—540）和第二批卡片（541—2136）合并排列的手續。

同音字表編好之后，要把第一批(1—540)卡片和第二批(541—2136)卡片合起来。按一个次序順好，先分韵，后分声母、声調。

最后是求对应規律，分韵母、声母、声調三步走。全部卡片都是按韵排的，所以先求韵母的对应規律。一韵一韵的檢查，看方言一个韵母北京是一个韵母还是几个韵母。要是方言一个韵母北京也是一个韵母，对应規律就出来了。例如广州 [u]韵北京也是[u]韵。要是方言一个韵相当于北京兩韵或者更多的韵，就利用卡片看看分化有無条件。比方广州[in]韵相当于北京[ian]、[an] 兩韵。利用卡片可以很快求出分化条件，得出对应規律。广州[in]韵逢[ts、ts‘、s、〇] 四声母相当于北京[ian]韵或[an]韵，广州[in]韵逢其他声母北京一律是[ian]。

求韵母对应規律的时候，势必要把好些韵母的卡片拿来反复排比，注意不要把这一韵的卡片和那一韵的卡片混了。韵母的对应規律求出之后，卡片按韵母的次序放好，然后一韵一韵的拿来依声母分。这样分出来的卡片，基本是按声母分的，可是每个声母的卡片，又是依照韵母的次序排的，对于求声母对应規律特別方便。檢查每一个声母，看看相当于北京一个声母还是几个声母。要是方言一个声母相当于北京几个声母，就得注意有沒有分化的条件。

求声調对应規律的手續略有不同。先看《簡表》的声調表，从表上可以看出方言和北京音声調对应的大致情况。比方說我們現在排的汉口的卡片。从《簡表》声調表可以看出汉口的陰平北京也是陰平，汉口的上声北京也是上声，汉口的去声北京也是去声，就是汉口的陽平北京陰陽上去四声都有。在依声調分卡片的时候就注意汉口陰平北京讀陰平有沒有例外，有例外就記下来。上声去声也一样。只有陽平是需要多費些工夫仔細排比的。

卡片还有別的功用。每个卡片上都有方音和北京音，可以任意排比分类，供我們使用。比方說，我們也可以用来求北京和方音的对应关系，就是从北京音看北京一个韵母相当于方言几个韵母等等。

其实，使用卡片求对应規律，这件工作本身就是練習。哪怕你已經从别的書上已經知道一个方言和北京話的語音对应关系，自己作一遍也能增加認識（这个道理和中学的物理化学也要学生自己实驗一样）。据說有些地方中学汉語教师教語音編多少有点困难，尤其是方音辨正不容易結合实际。要是中学語文教师能利用《簡表》記一下本地方言，再用这一套卡片求一次对应規律，可以提出其中特別清楚的規律来教学生。这样作不單为普查全国汉語方言出了一分力量，也解决了語音編教学的問題。这里帶便提出这項意見，供各地中学語文教师和教育行政当局参考。

《汉語方言調查簡表》勘誤表

單字号碼	誤	正
(1)170—171	170 171 醜一母	170 171 醜 母
(2)409	409 丟	409 [丟]
(3)593	593 卡	593 [卡]
(4)980	980 *不	980 [不]
(5)1061	1061 黍	1061 黍暑
(6)1328	1328 扫(掃)扫地*嫂	1328 *扫(掃)扫地* 嫂
(7)1485	1485 *班斑頒板	1485 *班斑頒扳
(8)1506 (誤为1806)	1806 丹*單單独	1506 丹*單單独
(9)1527 (誤为1257)	1257 *暫	1527 *暫
(10)1596	1596 *鐮帘(簾)	1596 *鐮簾帘
(11)1631	1631 *仙	1631 *仙鮮新鮮
(12)1632	1632 鮮新鮮	1632 掀
(13)1633	1633 掀	1633 鹹
(14)1961	1961 棒	1961 捧
(15)1962	1962 *碰	1962 [碰]
(16)4079	醬	醬油

附注：〔7〕、(14) 兩条第二次印刷本已改正。《簡表》單字有重复的，見第 41 面第一节“(5)用不上的字”条。

《汉語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勘誤表

卡片号	誤	正
103“約”	yè [yè]	yē [yē]
398“浮”	fóu [fóu]	fú [fú], foú [fóu]
474“准”	ʐǔn [tʂ‘uən]	ʐǔn [tʂuən]
799“値植”	ʐí [tʂʅ̄]	ʐí [tʂʅ́]
802“紙”	ʐǐ [tʂʅ̌]	ʐǐ [tʂʅ̌]
1011“杜”	dù [dù]	dù [tù]
1312“撓阻撓”	náu [uáu]	náu [náu]
1446“柔揉”	róu [ʐóu]	róu [ʐóu]
1449“彀…”	g`u[k`u]	gòu [kòu]
1454“候”	hòu [xòn]	hòu [xòu]
1625“鉛”	qiān [tɕiān]	qiān [tɕ‘iān]
1631	*仙	*仙鮮新鮮
1632	鮮新鮮	掀
1633	掀 xiān[ɕiān]	鹹 xián[ɕián]
1907	將獎	蔣獎
2006“更更改羹”	gēŋ [kōŋ]	gēŋ[kōŋ]
2067“蝇(蠅)”	iíŋ [íŋ]	jíŋ[íŋ]
2108“冲(衝)”	ςūŋ [tʂ‘uŋ]	ςūŋ [tʂ‘ūŋ]

附注：卡片有重复的，見第41面第一节“(5)用不上的字”条。

悼念赵卓同志

赵卓同志是坚强的革命战士，是勤奋的語言科学工作者，不幸于 1957 年 2 月 10 日下午因腦溢血症在北京逝世。这是我們的重大损失。

赵卓同志 1913 年出生于安徽怀宁，19 岁以前在学校讀書。1933 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4 年参加上海世界語者协会，編世界語刊物《中国怒吼》。1937 年去延安工作，1938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1939 年曾做地下革命工作。1940 年到抗日战爭胜利期間曾先后担任新四軍江北游击縱队連長、指导員，仪征报社社長，华中局政策研究組組員，山东大学（解放区）教授兼預科部主任等职务。1948 年以后曾先后担任华东軍区長江支队淮河大队大队委、副政委，豫皖苏建国学院教务長，南京市軍管会文委会大專部部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副教育長，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处長。1955 年 8 月調來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員，去年語言所成立詞典編輯室，他担任这个室的主任。



赵卓同志二十年来一直以頑强奋斗的精神不倦地战斗、工作和学習。他早年自学了世界語、法文、英文、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抗日战爭期間，他挤出时間又自学了俄文和日文。他学这些文字总是与政治任务相結合的，例如他学西班牙等国文字时，正是弗朗哥向西班牙人民大屠杀的年代。他解放后在南京不辞辛劳地負起中苏友好协会所組織的俄語班的教課任务，亲自动手編教材。这份教材最后編成《俄文語根速成識字讀本》（俄文說文解字讀本）正續兩巨册，于 1955 年和 1956 年先后出版。赵卓同志当初感到，在学習俄文的高潮中，群众自發地利用了語言学的原理來达到速成的目的，其中最显著的一項就是詞素分析。詞素之中，詞根的数量最大，派生力最强。掌握了一个詞根，就容易了解一系列的同根派生詞。赵卓同志就根据这个原理編成了这部讀本。書中正文部分是按意义归类的俄文生字的解釋和例句。意义一共有 586 組，每一組里列举了俄語語根，有时还有希臘、拉丁、英語、德語等語根，后者是从外来語中分析出来的。在每一組的各种形式的語根下面就是由这些語根所派生的詞。在某种意义上說，这本書是屬于語言学上所謂"語源詞典"的一类。这書对俄語教学的作用很大，同时对我們的詞源学研究和詞源詞典的編纂工作也有很多啓發。赵卓同志編这部書是在参考書十分缺乏、在旁的工作十分紧張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辛勤的劳动和費尽心力的推敲可以想見。赵卓同志到語言研究所以后，想把这部詞典徹底改編一下，但是因为旁的事情忙，只能晚上抽点时間去做。直到病發的当夜，还攤开資料在进行这項工作。

赵卓同志几年来血压很高。医院累次劝他休息，他因为工作忙沒有按照医院的要求做。去年科学院决定請他九月間到外地去疗养一个时期，他同意了。可是因为八月間本社去青島举行汉語語法問題座談会，又有許多会后的事要做，他就一直堅持工作，沒有去疗养。赵卓同志是本刊的常务編委之一。怎样使本刊为提高我国語言科学的水平尽到最大的責任，怎样通过这个刊物鼓动語言学界的新生力量和發揮一切积極因素，对这些問題，赵卓同志經常在动腦筋，想办法，亲自处理一些最难处理的稿件。

赵卓同志为人民事業从来不吝惜劳力。例如，在語言研究所期間，他是研究人員，行政上沒有什么名义；但是对領导上要求他做的任何一件行政上的事情，或是同志們希望他做的有益事情，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并且严肃認眞地堅决地去完成它。还有一些誰也沒有要求他做，但是在他看来需要做，做了于党于人民有利，他也都毫不迟疑地主动去做。他去年为詞典編輯室的成立和長远規划以至詞典編輯的發凡起例工作付出了高度的劳力。他准备今年三月为青年同志开办一个世界語講習班，还打算講俄語構詞法，指导中初級研究人員进修外国語。

赵卓同志自己的生活很儉朴刻苦，但对同志們却非常关心和爱护。在延安的时候，为了准备去敌后打游击，堅持鍛鍊身体，在严寒的天气里經常赤着脚去爬山。在他担任地下工作时期，掩护了許多革命同志安全地轉移到根据地。有的同志受了伤，沒有医疗条件，他就把他們托給自己在上海的家人照料。赵卓同志平日質朴坦率的談吐和誠懇謙虛的态度叫人感到非常亲切。他認为了解人关心人是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品德，他从自己的工作中处处体現了这一点。

我們沉痛地悼念赵卓同志，要学習赵卓同志热爱語言科学、刻苦鑽研的精神和謙虛朴素、忘我劳动的作風。

语文短评

編者按：本期專評新聞、广告、文章、課文的标題。新聞和广告的标題往往受一定字数的限制，但是也不能过于削足适履，以辞害意。評改的时候，我們斟酌情形，尽可能不增減原来的字数。

155 鞍鋼第一煉鋼厂煉出二千多爐快速煉鋼（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5日第2版新聞标題）

"快速煉鋼"不是一种鋼，而是一种煉鋼法，因此它不能受"二千多爐"的修飾，也不能作"煉出"的宾語。应該改作"…用快速煉鋼法煉出二千多爐鋼"。要是照顧字数，可以改作"鞍鋼第一煉鋼厂快速煉鋼煉出二千多爐"。（李巴）

156 燕谷米是最营养最經济的食粮（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日第3版文章标題）

（一）"营养"是名詞，不是形容詞，因此只能說"最有营养"，不能說"最营养"。（二）在各种食粮里面，燕谷米不見得比杂粮还經济，因此只能說"比較經济"，不能說"最經济"。全句应改作"燕谷米是比較經济而最有营养的食粮"。（李巴）

157 緬甸撣邦官員在芒市同云南边境官員会見/并参观了芒市为两国边境人民举办的展覽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6日第1版新聞标題）

展覽館是建筑物，只能"建立"，不能"举办"。举办的是"展覽会"。（魯揚）

158 祝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七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2月13日第1版新聞副标題）

"条約七周年"不好講，应在"条約"后面加上"签訂"两字。（魯揚）

159 国务院六办邀集有关部門負責人举行会議（光明日报1956年9月6日新聞标題）

"六办"是"第六办公厅"的簡称。濫用簡称会使人摸不着头腦，这里应該用全称。照顧字数，寧可删去"負責人"。（李学金）

160 做好在职干部学習新学期的准备工作（光明日报1957年1月11日社論标題）

詞序不妥；不是"在职干部学習新学期"而是"新学期的在职干部学習"。（潘鼎）

161 帮助新教师提高新教师（教师报1956年10月26日欄名）

作者似乎有意重复"新教师"借以組成匀称的結構来加强修辞效果。但是"提高新教师"情理上講不通，究屬不足为訓。应改作"帮助新教师提高業务水平"。（加合）

162 男方的文化程度低可以相爱嗎？（工人日报1956年9月1日第2版文章标題）

（一）用問句做标題，如果意思在于肯定，应該从反面問。（参看本刊1956年8月号短評第4条。）（二）"相"字兼指双方的时候居多，而这里是問女方爱不爱男方，是偏指一方。全句应改作"男方文化程度低就不值得爱了嗎？"（攸　川）

163 水上飞船將在伏尔加河上（中国青年报1956年10月26日第4版新聞标題）

这里的"在"字只能看作介詞，因此缺少个动詞。应該在"在"字前或"河上"后添上"出現"。照顧字数，也可以改成"伏尔加河上將有飞船出現"。（陈天福）

164 协助社制止紅薯腐爛（中国青年报1956年11月30日第2版新聞标題）

（一）"制止"一詞，《国語辞典》釋作"謂以权力禁止之"，一般是对人的行为說的。新聞內容是說"防止紅薯腐爛"，标題也应該用"防止"。（二）"协助社"是"协助合作社"的簡称，这里还是用全称比較明白。（艾木）

165 和全国青年比一比，看誰养猪养的多，肥的快，死的少（中国青年报1956年12月28日第1版文章标題）

（一）全国青年并不都养猪，因此比是比不来的。（二）"养猪养的多"是合于固有的語法格式的，"养猪肥的快"和"养猪死的少"就有点別扭了。可改为"和全国养猪青年比一比，看誰的猪养的多，肥的快，死的少"。（潘繼森）

166 大家来节約儲蓄（大公报1957年1月26日社論标題）

按編者的本意，"节約"和"儲蓄"是联合結構，但是連起来写，就很容易誤会成动宾結構，变成把"儲蓄"給"节約"了。可改为"大家来节約，大家来儲蓄"，至少应該在"节約"和"儲蓄"中間加个頓号。（潘印桂）

167 平均年齡65岁的工作机構（大公报1957年2月10日第2版文章标題）

試問讀者："机構"能有"平均年齡"嗎？讀者一定回答："不能"。那么这个标題怎么講呢？請看正文："…有一个机構，里面的專职工作人員平均年齡在六十五岁以上。"原来"平均年齡65岁的"是"專职工作人員"。像这种容易誤解的标題是万万要不得的。可改为"工作人員平均65岁的机構"，并不增减一个字。（蓄相瑶）

168 岁尾年終，捷报紛傳（北京日报1956年12月16日第1版新聞标題）

"岁尾"就是"年終"，"年終"就是"岁尾"。"岁尾年头"是句成語，編者打算套用一下成語，反而鬧了个叠床架屋。（程好問）

169 欢迎从江西回来的垦荒群众回到江西去（解放日报1956年7月13日文章标題）

文章是說一部分从上海到江西去垦荒的群众回到上海来了，因此要动員他們再到江西去。（一）一句話里有兩个"回"字，回来回去，究竟用哪个地方做"起点"，（二）动員他們离开，不能用"欢迎"。全句应改作"希望…再到江西去"。（白芳）

170 "花木蘭"主演常香玉和观众見面（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日第2版新聞标題）

"主演"是动詞，不能当作名詞詞組"主要演員"的簡称。照顧字数，可以改成"主角"。（胡謹承）

171 本市医务界和文艺編輯工作者/开会座談百家爭鳴方針（長江日报1956年8月6日第1版新聞标題）

只看标題，以为是医务界和文艺編輯工作者一起开会。参看新聞內容，副标題应改作"分別座談百家爭鳴方針"。（白芳）

172 48个实習学生3个月內成熟練电焊工和鉚工（長江日报1956年8月8日第2版新聞标題）

"成"字單用，不合習慣，讀起来也不順口。应改作"变成"或"成为"。照顧字数，"电"字倒可以删去，因为"焊工"一般是指"电焊工"。（茵菱）

173 实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本市在汉陽区进行試点（長江日报1956年8月24日第1版新聞标題）

"进行"后面应該用动詞，而"試点"是名詞，搭不攏。新聞正文說："从今年秋季开始，本市將以汉陽区为試点区，实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可見还沒有"进行"。摘出加点的十个字做副标題豈不現成？（茵菱）

174 省委召开的县委書記以上干部会議在大会討論中深刻揭發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河南日报1956年11月3日第2版新聞标題）

（一）"深刻"只能修飾"批判"，不能修飾"揭發"，顧此失彼。应改作"徹底"。（二）"揭發"和"批判"中間的"和"字不能省。（三）这个标題太不簡練，至少可以删去"的"字和"在大会討論中"。（賈双虎）

175 若干地区發生排斥老幼濫宰耕牛現象（农村大众1956年9月25日新聞标題）

單說"老幼"是指人，这里用来指耕畜，不合習慣。正文中說："發生了老弱耕畜無人要和濫宰耕畜的現象。"标題应該尽可能符合正文，說成"…排斥老弱耕畜和濫宰耕畜現象"。（凱鳴）

176 四川大学为我校农学院独立建院啓事（人民日报1956年9月1日第8版广告标題）

啓事本文可以用第一人称，称"我校"。但是标題一般都用第三人称，現在插进一个"我校"，指什么学校反而費解。正文說："四川大学农学院迁往雅安独立建校，定名为雅安农学院。""我校"应改作"所屬"。（廷穆）

177 名义变更啓事（人民日报1956年9月24日广告标題）

这是一个工厂更改厂名的啓事。"名义变更"費解，不如直捷了当說成"更改厂名啓事"。（艾木）

178 第一批按国家标准金笔即將出厂！（工人日报1956年10月14日第4版广告标題）

"按国家标准"后面缺少动詞。改法：1）在"标准"后面添上"制造的"或"生产的"；2）"按"字改作"符合"，"标准"后加"的"字。如果字数只許少，不許多，甯可删去"按"字。（流水）

179 魯迅与茅盾起草給紅軍長征胜利賀电（中国青年1956年第18期插頁标題）

把"祝賀長征胜利的电文"緊縮成"長征胜利电文"，不妥。应改作"魯迅与茅盾起草祝賀紅軍長征胜利电文"。（陈天福）

180 拖拉机工地的一个"野姑娘"（新观察1956年第23期第35頁文章标題）

"拖拉机工地"是不是"拖拉机耕作地点"？請看正文第一句"在拖拉机厂工地上…"，便知不是。"拖拉机"不等于"拖拉机厂"，可是标題的作者似乎不在乎这点兒分別。（末頁目录中也無"厂"字，可知非排校之誤。）（程好問）

181 为什么允許唯心主义可以有宣傳的自由？（学習1956年11月号文章标題）

"允許"本身含有可能的意义，說允許怎么样就等于說可以怎么样，所以"允許"后面一般不再用表示可能的詞語。因此这里的"允許"和"可能"应該去掉一个。（黄德賢）

182 对作家介紹課文的教学的意見（語文学習1956年11号第16頁）

"作家介紹課文"似乎是个"主——动——宾"結構，看了正文才知道不是。正文中說："初中課本《文学》从第三册开始編了一些作家傳記作为独立的課文"。那末标題何不就写作"对作家傳記課文的教学的意見"？（李巴）

183 植物細菌病害的重要性（朱慧貞譯《农業植物病害》章节标題）

"重要性"一詞習慣上总是指有利的一面。应改作"植物細菌病害的严重性"或"防治植物細菌病害的重要性"。（吕超海）

书刊评介

《方言校箋及通檢》，周祖謨校，吳曉鈴編。科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一版。16开，249頁，定价道林紙本5.00元，报紙本3.50元。

《方言》是中国第一部記录口語的專書，它用比較方言詞彙的方法如实地反映了兩千年前汉語的面貌。它在語言文字学里的价值应当和《尔雅》、《説文》相等，可是它被重視的程度長期間比不上《尔雅》、《説文》，只有晋代的郭璞为它作了很好的注。从此以后，因为輾轉傳鈔、翻刻，舛訛很多，可是沒有人肯为这部書做些疏証或整理的工作，《方言》就成了一部很難讀懂的書，相对地降低了它的作用。一直到清朝的戴震，在考証校勘之学盛行的風气下，才根据《永乐大典》的《方言》开始和明本校勘，进一步更搜集古書引文和郭注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參訂，正譌补漏，逐条疏証，《方言》才有了一个可讀的善本。过后盧文弨又有《重校方言》，也很精当。戴、盧兩家之后又有刘台拱的《方言补校》和錢繹的《方言箋疏》。王念孙也有《方言疏証补》一卷（收入《高邮王氏遺書》中），常常有很精到的見解。由此可見，《方言》这部書到了清代开始被重視了，为它作校勘疏証的人很多；然而一直沒有人把这些学者的工作总結一下。周祖謨先生这部《方言校箋》是拿現存的最早的刻本宋李孟傳本（卽《四部叢刊》本）作底本，參証清代戴震以下各家的本子，論其是非，加以刊定的。書中旁征的論著达33种，其中的原本《玉篇》殘卷、《玉燭宝典》、慧琳《一切經音义》、《倭名类聚鈔》、王仁昫《切韵》、《唐韵》殘卷等都是清人沒有見到的。这个本子非但刊定了前人的是非，而且把那些前人沒有注意到的錯誤，或虽注意到了但是还改得不正确的地方，都指点出来，信而有据地加以辨正，"实在不愧是'后出轉精'的定本"（罗序）。有了这个本子，我們就可以不必再为校刊文字多費功夫，可以对《方言》这部書"照顧到語言的整体来作全面的研究"了（自序）。

吳曉鈴先生为《方言校箋》編的《通檢》，占全書的分量五分之三，是兼用"引得"和"堪靠灯"（comcordance）兩法，对本文和郭璞注都逐字、逐詞、逐句細加分析，發凡起例，排比成書的。这个繁重的工作里面貫穿了研究的功力和細致的匠心。这部《通檢》比起一般的"通檢""引得"来有显然不同的特色，它能在編制上充分体現《方言》全書的复杂体例，又富于統計性，使利用《方言》的人非但能免去許多翻檢、統計的麻煩，而且能啓發問題，引起研究的兴趣。例如《通檢》对于方域的分析就根据《方言》本書的体例立下六种不同的表現方法（凡例6），使人一查就立刻知道某个方言区域的名称在本書一共出現过多少次，每次所举方言的內容，常与哪些方言区連称，連称的次数等等。同样，对于《方言》中的常用术語和郭注音釋都立下很細密的通檢条例，使人容易看出《方言》的义法和若干术語彼此之間的关系，便于把郭注所能表現的語音現象集中起來研究。至于《通檢》前面所附的俄、法、英三种拼音系統的檢字表，对于不習慣用笔画檢字的人另开了方便之門，除了这个用处，还能从这里体会出那些怪僻字的現代讀音。

本書前面有罗常培先生的一篇序文，虽然只三千多字，可是扼要地論述了《方言》这部書的作者問題和它的性質、价值以及旧日其他的方言著述的优劣高下，这是一篇值得讀一讀的序。

在向科学进軍的号召下，許多祖国的文化遺产需要利用，这首先得做許多整理、編纂、和解釋以至总結工作，語言学当然不在例外。我們希望《方言校箋及通檢》的出版能够对祖国語言学遺产的整理工作起到"拥彗清道"（校箋自序）的范例作用。（張其华）

《怎样教学普通話》，乐嗣炳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一版。25开，202頁，定价0.82元。

本書是由《中国語文》、《語文学習》、《語文知識》和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等刊物上發表过的一些單篇文章彙集而成的。內容着重介紹教学普通話的方法和經驗。这些方法和經驗大都是各地普通話語音訓練班的教师从实际工作中总結出来的。虽然本書的刊行目的只在供給各地語音訓練班的教师和学員參考，可是从內容来看，像張拱貴的《怎样教学北京語音》（18頁）、《江苏省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語文教师語音訓練班工作总結（初稿）》（80頁）、徐世荣的《我在教学普通話中的經驗和教訓》（46頁）、郑天錫的《我怎样学習用普通話教学的》（187頁）以及藴光的等《記忆常用字标准音的一种方法》这些文章，都写得淺显易懂，叙述教学方法和經驗也很生动、具体，对一般自学普通話的讀者还是有帮助的。

我們对本書提出兩点参考性的意見。

（一）卽使只从供給各地語音訓練班教师和学員參考这一目的来說，本書刊載各地語音訓練班的工作总結数量上似乎多了一些（約占全書60%以上的篇幅）。介紹办理訓練班的經驗和教学方法材料选用三五篇比較写得全面、有代表性的就可以了，每篇收进来大可不必。因为語音訓練班的学員畢竟是本書的主要对象，要他們去閱讀所有內容、格式都大致相同的文章，頗值得考虑。如果說刊載所有的总結还可供各地訓練班作資料，最好把总結另印單行本，發行几千本就足够了，用不着在本書里占这許多篇幅。在紙張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能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二）在第41頁《北京語音声母韵母拼合表》中的倒10行里沒有列出ㄇ跟ㄧㄡ拼音的"謬"，倒13行里沒有ㄌ跟ㄧㄚ拼音的"倆"。很显然，如果不要"謬"和"倆"，那么表中ㄟ行的"摳"和ㄩㄣ行的"淋"也可以不要；如果既保留"淋"和"摳"，也应当保留"謬"和"倆"才說得过去。这也許由于作者的疏忽，而不是有意舍弃。（何秋輝）

《語言》，濮之珍著。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32开，51頁，定价0.16元。

这本叙述得很有系統，是以淺易的材料貫穿着理論的小書，可以使讀者明确有关語言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例如：在什么是語言，它的本質是什么，它的發展又是怎样等問題上都講得有条有理。作者还結合着汉語实例，分析并批判了資产阶級語言学对这些問題的錯誤观点，从而說明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对中国語言学工作起了怎样的一些指导作用。

作者在談到語言的内部發展規律时，只是分別举例說明了什么是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而沒有着重說明它們之間的关系，这会使讀者对語言發展内部規律的認識不够全面。

按照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理論，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关系是極为密切的。一般規律是由各种具体語言如汉語、俄語、英語等里面抽象概括出来的。离开了世界上各种具体語言的研究、抽象和概括，一般規律就成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个別的具体語言是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基础；另一方面，一般規律也只能通过各种語言的特殊規律具体地、历史地体現出来。比方說，語言發展不平衡性的規律，即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具有稳固性，而語言的一般詞彙又是处在經常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条語言的一般規律，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現出来，这就是个別語言的特殊規律，也就是語言一般規律的特殊表現。

其次在文学語言部分，作者似乎应該強調一下文学語言和口語的密切关系。文学語言是加过工的，它可以是口头形式，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既是口头也是書面形式。例如，民族共同語的文学語言就非兩种形式并存不可。但重点是文学語言和口語的关系，文学語言一旦脫离口語就会停止發展，不能作为全民的交际工具。如梵語、古典拉丁語。汉語过去某些阶段的文学語言因为脫离了口語就停止發展了，但所謂"白話"形成了以后，就一直是汉民族共同語的文学語言。这也說明了文学語言对口語的关系。同时，也說明了我們现在为什么要大力进行現代汉語的規范工作。（郑达、楊定、賈紹閣）

《怎样学好語文》，周本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32开，50頁，定价0.13元。

这一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介紹学習語文的方法的。作者針对目前中等学校汉語、文学教学上存在的問題，結合自己的教学經驗，用实际的例証来指导讀者怎样学好語文。这本書对中等学校的学生和自学語文的一般青年都有参考的价值。

本書談到学習汉語的部分共分"語音"、"詞彙"、"語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六节，一般都能注意到学習中容易疏忽的地方。譬如指出对詞义了解得不够，特别是对詞的感情色彩注意得不够，在習作中就会出現"志願軍瘋狂地抵抗"之类的病句；不掌握成語的意义，就会把"实事求是"誤写做"事是求实"。不認識形声字的構成方法就容易把近似的偏旁（如礻、衤）写錯。以上这些都是不無可取的。

談到学習文学的部分共分"現代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論和文学史的基本知識"三节，对于預習、分析、朗誦、联系实际的方法都有一些淺显的說明，并且指出分析作品的时候必須避免不管作品具体内容、不管人物形象的偏向。

除此而外，作者也說明了課外学習的方式和意义。

这本書的缺点是消極的方面談得比較多，积極的方面談得比較少，而在"語音"和"修辞"兩节中更显得空洞而抽象。

另外，作者說吳語方言（以苏州为代表）中沒有ㄓ、ㄔ、ㄕ声母，这是与事实不很相符的。（茅开）

对高志用徐鉄生兩同志的答复

（高、徐兩同志来信見23面）

（1）"苏北一般不分尖音、团音，同北京"。——我的修正稿中有这么一句話（看《普通話發音讀本》附录，64頁）。

（2）如皋是否有ㄫ，我不敢肯定。能分別"泥、离"…的，不見得就是ㄋ—ㄌ之别，也可能是ㄫ、ㄌ或ㄫ—ㄋ之别。

（3）"取消万、ㄬ、ㄫ"这一条，主要是就吳語方言說的。我的修正稿中有这么一句："下面的例字主要就吳語方言說的"（参看《普通話發音讀本》68頁）。

（4）ㄣ、ㄥ混的方言，不見得沒有ㄨㄥ。吳語方言和苏北方言一般有ㄨㄥ。但南京ㄨㄣ—ㄨㄥ往往不分。苏州乡下沒有ㄥ。原文应交代这一点。

（5）如皋能分别ㄢ、ㄬ，我的原文沒有把如皋列入不分ㄢ、ㄬ的方言中。苏北能分ㄧㄢ、ㄧㄝ，可是ㄧㄢ不一定是鼻声随，可能是半鼻音。不过如皋是鼻声随。原文是就一般情况說的。

* * *

（1）南通市的方言应屬江淮方言还是自成系統，我所掌握的材料很不够，目下很难判定。誠如徐同志所說，南通市的方言很特別，揚州專区、鹽城專区、淮陰專区的人听不懂。据我們初步的了解，南通市方音有这些特点：1.古濁塞音、濁塞擦音仄声字，南通市讀送气音。2.無尖、团之分，但iŋ（in、iŋ不分）韵声母都念尖音（这一点，徐同志已經指出）。3.沒有tʂ、t'ʂ、ʂ，也沒有ʐ，鄰县如皋、如东也沒有tʂ、t'ʂ、ʂ，但仍保留ʐ（日、热等念为以i起头的音）。在南通市，北京念tʂ、t'ʂ、ʂ的字，很多变为tɕ、t'ɕ、ɕ，韵母也相应地变为齐、撮呼（另一部分变ts、t's、s）。北京ʐ在南通市讀i起头的零声母或l。4.有ŋ、ȵ、v。5.北京的ei、ou都念ɛ（北京的uei拼k組念uɛ，拼tʂ、ts組念yɛ）。6.北京的en变ɛ。7.北京的an分化为ã和ɵ、on。8.北京的ɑŋ念oŋ，iaŋ念ie。9.北京的eŋ分化为ɑŋ、ɛ。10.北京的uŋ念ɑŋ，yŋ念iɑŋ。11.声調有七个，包括兩个去声，兩个入声。

上面几点只是举例性質，不全面，也不很准确。不过由此可見南通市的方音跟吳語和江淮話都不相同，值得注意。

（2）据我們知道的，如东把北京的ti、t'i念为tɕi、t'ɕi，如皋仍念ti、t'i，海安兩讀（但入声字不变）。

（3）"撤、澈"泰州市、泰兴、高邮、宝应念t'ɕi，泰县、兴化念(t'si（入声）。"設、舌"泰州市、泰兴、高邮、宝应念ɕi，泰县、兴化念si（入声）。

（4）北京的xu，方音念fu，据我們所知道的，苏北只泰兴如此，泰州兩讀，說話音念fu，讀書音仍念xu。

（5）泰州方言，的确把古濁塞音字（仄声）讀送气清音，不过限于說話音，例如"被"，讀書音是pei，說話音"被打"是péi，"被單"是p'i。他如"伴、步、豆、蛋…"也是这样。

（6）揚州、高邮、宝应、兴化把北京的ʐ混入l或n。泰州市、泰县把ʐ念作z，泰兴、如皋仍保留ʐ。"热、然、染、仍"等字揚州念为零声母，以i开头。

（7）苏北讀ŋ的字沒有吳語多，是就一般情形而論。某些字南通念ŋ，海門，启东、崇明念零声母，这种情形是有的，如"哀、爱、袄、欧"。但也有相反的情形，如"岸"，海門等处念ŋ，南通念零声母。吳語里"吳、吾、五、午、魚、月"也可以念ŋ，这是江淮方言所沒有的情况。

（8）北京ian韵字，吳語多念ie；江淮方言多念ien，帶鼻音。我一律作ㄧㄝ，不妥当。

总之，高、徐兩同志的話絕大部分是正确的。承他們指出我的錯誤和缺漏的地方，非常感謝。（張拱貴）



对《中型現代汉語詞典編纂法》的意見

王士襄

《中型現代汉語詞典編纂法》發表后，我反复研讀了几遍，認識到它一方面根据了先进的科学理論，一方面从汉語特点出發，吸取了以往在詞典編纂方面的优良成果，因而更加相信將来的詞典編纂者必能圓滿地完成这个艰巨光荣的任务，編出一部完美适用的詞典来。

对于編纂法所提出的意見，我絕大部分都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認識不一致的地方，现在写出来供参考。

(1)詞素的处理：編纂法規定把一些富有構詞能力的詞素也收进詞典，我很同意。但是我觉得不如索性把所有的詞素都收入詞典(除一些联綿詞專用字外，所有通用汉字都包括在內)。因为現在还使用汉字，詞間并不隔开，人們有不識的字，还是習慣于按字来檢查的。而且了解了字(詞素)的意义，也会更好地了解詞义。如了解了"础"的意义，可以帮助对"基础"一詞的了解。其次，有些字之不能作为詞来單独使用，只是在一般情形下这样，而在某些詞組、成語、諺語中，往往还是單独使用的詞。如"飢、民"兩字在一般情形下，只能作"飢餓、人民"等詞的詞素，但在"半飢半飽"和"官向官，民向民"等成語中則仍然是詞。在文言成語中，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因此我觉得把所有的詞素都收入詞典是有好处的。而且这样做还附帶解决了为了收成語而不得不破格收入詞素的体例方面的問題。

(2)帶"性、化"等詞尾的詞怎样处理沒有提到。我以为对它們应分别处理。加了詞尾后意义沒有改变而只是用法上不同的，如"危險性、臨时性、庸俗化、复杂化"等，不必列为条目，只在"危險"等詞的解釋中說明它有这种性質就行了。但是加上詞尾后有了新的意义的，則必須列为条目，如"人民性、艺术性、工業化、形象化"等。

(3)对方言詞讀音的处理：編纂法規定在普通話里还沒有通行念法的一些詞仍按方音注音的办法，我認为不妥。因为这些詞大都是在方言区用汉字写定的。汉字在方言中的讀音和北京音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为什么不根据这些字音的对应关系改成北京音来讀呢？事实上，一般人接触这些方言詞，大都是通过書面語，很少是通过口头語的，所以用汉字写定的方言詞各地都是按自己的方音来讀(如上海話"折爛汚"，山东讀成"扌乁爛汚")，并不去追究原方言的讀音。所以我認为同是已用汉字写定而將收入詞典的方言詞应一律按北京音来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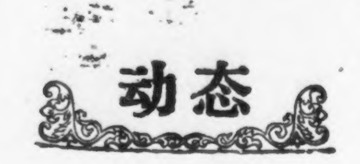
(4)对表示政治或哲学概念的詞的解釋：这类詞中純屬于政治或哲学概念的詞，如"国民、辯証法"等，只征引經典著作中的解釋就够了。但是，我認为有些表示政治或哲学概念的詞同时又是一般的詞，如"战争"这个詞，要是只当作一般的詞而不是当作表示政治或哲学的概念来理解的話，經典著作的定义就不适用。就拿毛主席对"战争"下的定义为例，这定义只是对战争这种社会現象的本質的說明，它是不能代替詞义的解釋的。因此，这类詞仍須首先当作一般的詞来解釋，然后征引經典著作的定义来闡發其本質，这样就使兩种不同的需要都能得到滿足了。

(5)关于引例范圍：編纂法所規定的引例范圍似乎太寬。我認为原則上引例范圍应限于"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教科書因經常改动，除文学課本外似乎也不宜引用。至于报紙杂志上的例子，字典上仅注出"报、刊"等字样，在詞典的編者看起来，固然确鑿可据，并非出于"主观的捏造"，但在讀者看起来，既然根本难于查对，其价值也就同編者"自造"的例相等了。在"簡称表"上列举的作品，我以为張恨水的作品思想性既不高，語言也够不上典范，不宜在詞典中引用。我还想附帶說到一点，編纂法規定了有些詞"不必引例"，我認为这类詞的范圍似乎还应該扩大一些，諸如动植物的名称之类，都可包括进去。

(6)举例和解釋詞义等方面的个别問題：有几处的举例似乎不妥。如等义詞举了"教室"和"課堂"为例，其实它們的意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課堂"除有"教室"的意义外，还有一个意义：教室在上課的时間里称为課堂。一般說到"課堂"都是指这个意义，如"这个作業在課堂上做"，就是在上課的时間內做的意思，不是在教室里做的意思。有些詞的解釋我感到不全面，不符合"詞义的最大概括"的原則。如"兵"解为"拿着武器保衛国家的人"，这就不适用于反动政权的武裝，因为它們的主要任务是鎮压人民，而不是保衛国家，似应改为"拿着武器执行作战任务的人"。"妓女"解釋为"被生活所迫把自己出卖給男子玩弄的妇女"，也似乎片面些，因为妇女变成娼妓的原因是多样的，如有些是被拐卖到妓院的，那就同这里的"被生活所迫""把自己出卖"不符了。"文理"解为"文章的条理"也不全面，因为它除了指文章的条理外，还指語句的組織。如《人民日报》《正确使用祖国語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这篇社論所举"文理不通"的例子，全是語法邏輯方面的錯誤。"正确"解为"符合客观事物的規律或符合預定的要求"也有些不够全面。如某人姓張而有人偏說他姓王，这自然是不正确的，但这却很难說是不"符合客观事物的規律"，我以为改为"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或規律…"似乎好些。另外，"呢"的解釋是"用于問句的末尾：a 特指問 b 选擇問 c 反复問 d 是非問"。按是非問句只能用疑問助詞"嗎"决不用"呢"，这想是由于疏忽而造成的。"斯文"一詞的引例是"吉地(狗)在車上也不斯文"，斯文本来是形容人的，这里用来形容狗，只是一种修辞意义(拟人)，而不是詞彙意义，这类例子，我認为是不宜引用的。

編纂法在某些地方还有文理上的缺点。如第一章2条(2)項："对于詞义和用法上完全相同的兩种詞素顚倒的說法，詞典应加以选擇…"下面平列了三条原則，但第二条却是"兩种說法都相当普遍，語义用法有区别的，詞典应該兼收"。既然"語义用法有区别"，怎能列在"詞义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項下面呢？另外第四章7条同第一章8条也有重复的地方。

关于同字异体的汉字，編纂法只說"照政府公布的《簡化字表》的标准形式書写"，而沒有提到《异体字整理表》，似乎也是疏忽。



中国語文杂志社召开擴大編委会議

本社于1957年2月16日在北京飯店召开扩大編委会議。出席有編輯委員王力、朱德熙、郑之东、陆宗达、陆志韋、呂叔湘、陈剛、杜松寿、吳曉鈴、周定一、周祖謨、張志公、高名凱、馬学良、曹伯韓、魏建功及在京語言学者孙功炎、刘澤先、岑麒祥、陈文彬、周达甫、胡明揚、徐仲华、徐蕭斧、張建木、彭楚南等30余人。由社長韋慤主持。

会議开始前，到会人为新近逝世的編輯委員赵卓同志默哀兩分鐘。会議首先討論并通过了本社1956年的工作总結，接着討論本刊1957年編輯計划。許多人認为本刊今后的重点应該是：帮助語文工作者提高語言学理論水平和实踐能力，帮助青年向語言科学进軍。

結合着本刊的方針任务，大家对怎样理解百家爭鳴和怎样在本刊体現百家爭鳴的精神展开了热烈的討論。許多發言認为，本刊过去虽然也展开过某些重要問題的討論，但是有的討論只是一陣風就过去了，沒有逐步深入下去；有的人参加問題討論不肯虚心考虑別人的意見；有时是各說各的，彼此不能交鋒。我們不应片面地理解"爭鳴"，学术討論必須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才能是健康的，才能談到繁荣学术。因此不能單从"爭"字上去理解"爭鳴"，"爭鳴"不是吵架，像"斗蛐蛐儿"似地瞧着热鬧就算了。

会議在討論爭鳴的問題中，有些人联系到語文工作者的团結和推动語言科学的研究，提議应該迅速組織北京語言学会。这个提議随即得到全体的同意，决定以这次会議的出席人为北京語言学会的基本發起人，随后再分別进行联系，着手筹备工作。

韋慤社長在总結大家發言时特別提到：本刊的讀者对象是明确的，問題是我們过去在刊物內容上沒有很好地滿足对象的需要，以后应該努力改正这个重大的缺点。（劳宁）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2月22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年3月号

总第57期

1957年3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38,845册